

出古入今



寻羌

羌乡田野杂记

王明珂 撰文／摄影



中华书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王明珂 撰文 / 摄影

寻羌

羌乡田野杂记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寻羌:羌乡田野杂记/王明珂撰文/摄影.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5
(出古入今)
ISBN 978-7-101-06715-6

I. 寻… II. 王… III. 羌族-民族文化-中国-文集
IV. K287.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55684号

书 名 寻羌:羌乡田野杂记
撰文/摄影 王明珂
丛 书 名 出古入今
责任编辑 李 静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精彩雅恒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年5月北京第1版
2009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毫米 1/24
印张8¹/₂ 字数140千字
印 数 1-6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6715-6
定 价 30.00元

谨以此羌族古诗悼念所有的汶川地震死难者。

过去有三代人，由三代的神管着。

第一代神所管的人有现代人的九倍高，牙齿有九个手指宽，脚有九拃长。

那代地壳是木头做的。

地火上去，地壳烧毁，天翻地覆，那一代人都死光了。

第二代神所管的人有现代人的三倍高，牙齿有三指宽，脚有三拃长。

那代地壳是铁做的。

铁生锈，地壳稳不住，天翻地覆，那一代人也都死了。

第三代，神是东巴协日，他所管的人就如现代人那样高，牙齿是一指宽，脚如现代人的一拃长。

这时地壳是石头做的。

这样地壳稳住，人类也就生存下来了。



2008年12月的一天，我坐在松潘县城内一家酒店房间内，一边听着两位来自松潘大尔边沟的老人唱《尼萨·开天辟地》这一章，一边为他们的演唱录像录音。这是汶川地震后，为抢救羌族文化我仅能做的一些事。此时我心中除了为川震死难者悲恸外，也百感交集。这个史诗，以两世代的人死于地壳翻覆为开始。民间口传故事中又提及，地壳稳了后，地下还有一只牛，它动一动地面就有大地震。后来神东巴协日怜悯人，就用绳子将那牛紧紧绑了，但忘了绑它的耳朵。所以，后来这牛耳朵动一动地面就还要震。这史诗中有关地震的内容，究竟是本地人古老经验的积累，还是预言？或者经验与预言原来就分不开。

自序

1994夏季，我的学术生涯发生了一个重要转变。对曾是年少轻狂的我来说，在此之前两年得到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又在这一年得到驰名国际学界之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终身聘职，四十岁以后的学术生命中还会有什么可令人振奋的转变？

然而就在这一年，我首次踏上大陆的土地。由北京到西安、西宁，一路上造访各地考古与民族研究机构，到处递出我印着“哈佛大学博士”的名片，卖弄着我在西方苦读有成的学问。直到一天，我来到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汶川，见到我硕士、博士论文中的研究主题，羌族……

我的寻羌之旅便始于这一年，1994年夏季。在西安，陕西考古研究所的朋友领着我到处看西周早期遗址，我遥想，当年姬姓族如何与土著姜姓族合作开拓此基业。而后，我由西安搭上往西宁的火车。在穿越陇山时我望着车窗外，依稀看见两千多年前西

戎中的秦人吞并邻近诸戎部落，残余的戎人扶老携幼逾过汧水、陇山往西迁徙的景象。火车进入湟水河谷，当年一个神话般的戎人，无弋爰剑，受秦人追捕逃到此地，是什么样的神奇让他以及他的后世子孙成为羌人的领袖豪酋？在西宁、湟中、湟源等地，我望着河谷上大片大片金黄色的油菜花田，仿佛见到汉代羌人各大部落彼此争夺这些美好河谷，以及，后来当这些河谷成为汉军屯驻的田地后，他们卑微地请求汉军允许他们在没有人耕作的河谷放牧。由西宁返回西安后，我乘火车穿越秦岭。在自古号称难行的山崖蜀道上仍可见一截截残存的巨木栈道，我想着，古羌人是否便是由此穿过秦岭天堑，一波波地进入川西北成为两汉魏晋时的白狼、白马等羌部？

如此我一路跟随文献记载中的历史记忆，追寻羌人来到汶川。然而便是在此，突然，前面那些历史臆想以及我二十年来的羌族研究成为一场空幻梦境。面对真真实实的羌族，我觉得自己对人、社会、民族、历史等等的知识贫乏得可笑。于是此后到2003年，这十年间（除了1999年我身在美国），我每年都在羌族地区住上一两个月，在真实的“人”与“社会”面前从头做一个学生，重新寻找古代羌人与今之羌族。2003年，我以羌族为主题的著作《羌在汉藏之间》出版。此后我的研究田野转移到川西的大渡河流域，与红原、若尔盖等川西北草原地区。经常从马尔康或

红原回成都，我都要刻意经过松潘、茂县、汶川等地，探探老朋友们。

发生在2008年5月间的汶川大地震，羌族人民的生命、财产、文化受到极严重的损失。而所有这一切的根基，环境生态，更受到难以恢复的破坏。悲伤之余，我的一些羌族朋友甚至有出于激愤的宿命观，他们说，这毁灭性的自然灾害似乎是针对着羌族而来。我不认为这是什么神秘的宿命，它只是一种历史与地理环境二者叠合造成的结果。汶川地震发生在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两大高低地理板块间的断层带上，在长程历史发展下，两大地理板块分别为藏、汉所占有，而羌族正处在汉藏之间，因此也在此两大板块之间。

目前灾后羌族社会文化复建陆续开展，羌族社会将有一番新面貌，文化也会有改变创新——这是1980年代以来持续发生的变化，地震破坏及灾后重建只是让它突然加速而已。我以这本配合照片的田野杂记，来呈现过去我的寻羌之旅中所见、所闻，介绍各地羌村民众生活与沟中的文化、传说。这不只为了纪念一些骤然消逝的过去，而更希望借着它来呈现羌族独特之处——他们并无奇风异俗，只是有如一面诚实的镜子，映照出人们难以察觉的自我本相。



茂县往迭溪路边的老石桥

目 录

001 岷江上游

一元钱的命/002

在川藏之间/004

015 松潘

与世隔绝的村寨? /016

沟中的世界/018

杜杰的家人/024

高山草场/033

山神与地盘神/038

松潘城/045

黎光明/054

060 北川

荞麦的故事/061

白马将军与走马将军/070

汉番边界/072

胡耀邦赠送的藏袍 /073

禹里羌乡/079

086 茂县

周老师与毛老师/087

老童与寨子里的酒/091

永和河坝/096

毒药猫/102

翻越史家山梁子/109

水磨坪与巴卓沟/111

射蟒英雄的故事/116





三龙沟/117

三龙诺窝寨/121

黑虎五族/124

黑虎将军/128

黑虎沟的老端公/129

牛尾巴寨“人过年”/133

沙朗与尼萨/141

146 汶川

周仓背石塞雁门/149

瓦寺土司/150

马端公/154

释比经文：羌戈大战/157

孝子与孽龙/159

161 理县

尔玛尼（黑羌族）/163

弟兄祖先故事/168

170 黑水

大黑水/173

苏永和/177

小黑水的獐猓子/182

185 后记

岷江上游



由茂县太平附近山上的牛尾巴塞俯瞰岷江；目前此村寨已迁至山下

一元钱的命

1994年夏季，我首次来到汶川，在此我认识了几位威州师范学校的老师。认得这几位朋友，对往后十年我在本地的田野行旅十分关键，但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却是我在威州大桥头的一段经历。

那是一天中午，我独自在街上闲逛。走到威州大桥头，见许多人围着一位算命先生，听他说人的过去未来，围观者不时发出哄笑或赞叹。我伫足看了一会儿，后来也忍不住坐上算命先生跟前的矮凳，让他把我的命运摊在众人之前。他问了我的生辰八字后，略为掐指算了算，便以浓浊的川西乡音念着：四十三岁……四十五岁……五十岁……当时我对四川话的领受力还很差，除了几岁几岁外，我隐约只听得“走南走北、走东走西，无往不利”，接着便是作为结束的“十全十美”。

我从口袋中掏出两块钱递给他。正要起身，他嘴里咕哝着，我依然只听懂最后几个字，“……十全十美”。我有点茫然不知所措。这时我身边一个身着羌族服装的小姑娘说：“他是要你给十块钱！”围观的人皆乐得大笑。我窘迫地又掏些钱出来递给算命先生，急急离开。我起身后，那小姑娘坐上了矮凳子。我在街上逛了一会儿，回头又遇到那小姑娘，站在路边一个花椒麻袋边发呆。我跟她买花椒，随口开玩笑地问她：“你的命怎么样？”她摇头不答。在找零钱给我时她才苦笑着说：

“他只收我一块钱！”

这十多年来，我虽然并非无往不利，但也应着那算命先生所说“走南走北、走东走西”——我的学术旅程由四川、云南到内蒙古、新疆，由台北到洛杉矶、波士顿。我经常想到那算命的先生、那算命只需一块钱的女孩，以及我“走南走北、走东走西”的命。特别是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之后，我想，那算命先生当时是否知道十四年后羌族要遭此劫？

由茂县太平附近山上的牛尾巴寨俯瞰岷江；目前此村寨已迁至山下





松潘埃期沟山景



埃期沟山上远眺格日曩措神山

在川藏之间

1995年7月，我第二度造访羌族地区。我租了一辆车，先花上七天时间在整个羌族地区走一遭——由成都经汶川到茂县，往北到松潘小姓沟，再回头经茂县、土门到北川，由北川返回成都。这一旅程是为了选择、安排往后进行田野考察的据点，但也让我见识到此地山之峻、谷之深、道路之险。

事实上这个探勘之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严肃，因听说我要包辆车到羌族地区游历，我成都的朋友带着爱人、孩子同行，驾车的师傅也将他的女朋友带上，一车老弱妇孺都成了我的田野探勘队员。此一勘察之旅结束后，在成都休息一天，我再度前往汶川及松潘小姓沟进行考察

访问。

1995年8月8日，我由松潘小姓沟回茂县。当时还都是土路，夏天路上灰尘大。为了不要跟在别的车后头吃灰，我们在清晨六点多便出发。十点车刚过迭溪海子不远，便见到前面车子排着长龙缓缓前进。如此时走时停，当过一个崖湾时，我们询问路边几位满面倦容正在休息着的解放军，才知道昨日傍晚一辆班车坠入数百米深的岷江河谷，四十余乘客无人生还。这样的场景，在那几年发生过两三回。

这是青藏高原东部边缘与川西平原相接的地方，在地理上呈现一“皱折”带。它的东面是海拔约五百米的成都平原，西边是海拔



茂县与松潘间的岷江高山深谷



汶川绵虬附近的羌族村寨

三千六百米以上的高原。而这“皱折”地带本身则是一道南北向的高山纵谷，岷江、大渡河、雅砻江等江河流经其间。山巅常在海拔四千五至五千米，溪河流经的谷底则约在海拔一千五百至两千米之间。这是亿万年前青藏高原抬升并向东挤压造成的地理现象。羌族的家园便在此“皱折”带的岷江上游——汶川、理县、茂县、松潘，以及东边岷江流域的北川、平武。

出成都西门，经过郫县到都江堰市。都江堰市旧称灌县，许多汶川一带的羌族认为灌县至少有一部分曾是羌族的地方，或说是羌、汉接界的地方。跨越青城大桥后沿着岷江进入山区，漩口到映秀是过去经常堵车的路段，紫坪铺水库大坝就建在此。映秀古称娘子关，在羌族历史记忆中此地过去也是羌族地盘。然而由明代到民国，这儿都是瓦寺土司领



古烽燧遗址：左图为军营遗址，右图为烽台遗迹

地，羌民是被统治者。据瓦寺土司家谱记载，此家族在明代受朝廷之召率兵来此平乱，后来就在此立寨定居。因此直到民国时期，这儿有“土民”（土司带来兵丁的后代）的村寨，主要在映秀附近的三江口、耿达一带，也有羌民村寨。后来土民成为藏族，羌民成为羌族，更多的土民、羌民成了汉族。此次汶川大地震的震中，几乎正是过去瓦寺土司辖地。

清代的汶川（威州）县城在绵虬，由此北上到汶川还有二十分钟车程。这儿的羌锋村是目前最南方的羌族村寨。瓦寺土司的官署在羌锋附近的“涂禹山”上，对面山上有“剝儿坪”——这些都是与大禹有关的古迹。汶川羌族认为大禹出生在绵虬。威州师范学校后的山上，有一道绵延山脊的小型长城。当地人说，这是三国时姜维所建“姜维城”。离姜维城不远有个“点将台”，这显然是个古代中原帝国边防军的烽燧遗址。距此不远还有守烽燧驻军的军营遗迹，留下三段夯土边墙。这些遗迹在地震后可能都不存在了。城北不远便是雁门关。岷江大道沿线有许多的“关”、“堡”，如娘子关、雁门关、松鸡堡、镇江关等等，表示过去这儿是旧帝国的边防线所在。

汶川是羌族的文教与行政中心，许多政府机构与学校都在此。威州师范学校的几位老师，当时曾参与羌族文字创作及教育推广。他们热衷于采集、研究羌族文化，因此那几年我们成了工作伙伴。每年我到羌



我的羌族老师朋友们（摄于威州师范学校内）



龙溪大桥前遇上泥石流

区作田野考察的第一步，几乎都是先到汶川与他们会合，然后几个人同行。威州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分配到各沟各村寨教书，因此我与威州师范学校的老师们一同下乡有意想不到的优势——在村寨做客时，我的身份是“老师的老师带来的朋友”，自然备得尊敬与热情接待。

汶川也是杂谷脑河汇入岷江之处。过威州大桥沿杂谷脑河西行，逐渐进入理县地区。沿途有许多小溪流，从大山中流入杂谷脑河。这些小溪流造成的山谷，如龙溪沟、蒲溪沟，许多羌族与嘉绒藏族村寨坐落其中。由龙溪大桥到理县，经过多个泥石流易发地点。1995年8月我由松潘回到汶川后，想到理县去看看，结果我乘的班车在龙溪大桥前受阻于泥石流。当时车外下着滂沱大雨，窗子紧闭的班车内约有四十余乘客，其中至少三十人点起烟来。当时我已戒烟多年，忍不住呛，只好站在车外淋了半个小时的雨。后来看着雨愈下愈大、车愈堵愈多，我回头走了里许路，找家小铺买包红塔山香烟回到烟雾弥漫的车中。从此，在进行田野考察时，抽烟成了我的习惯。

由汶川沿岷江大道往北，车行约半小时便到了茂县。茂县旧称茂汶。这是另一个羌族地区大镇与文教中心。茂县旧县城所在的凤仪镇也有大禹遗迹，附近一个村落便叫作禹乡村。茂县附近山高谷深，有许多深沟中的羌族村寨——岷江东岸有永和沟、水磨沟，西岸有黑虎沟。黑水河由西汇入岷江，由下游往上溯，有三龙、洼底、曲谷、亚都、维城



飞砂乱石自山上滑滚而下的场面

等羌族聚居的山沟。亚都、维城等地是羌族分布的西界，由此逾越瓦钵梁子，便是黑水藏族分布的黑水河中上游地区。

过了茂县两河口，今日往松潘的路蜿蜒而上，过去大路是贴近岷江岸走的。我在羌族地区活动的最初几年，仍然走的是这些沿江的险路。有一回，我坐班车到黑水，遇上一处落石崩坡。司机下车探勘一番，然后上车，摇了摇头，将车往后倒，我心想，这下子去不成了。倒了约十余米，司机将车停下来，突然踩足油门往前冲。车在乱石中颠簸弹跳，几度斜向岷江崖边，最后终于过了崩坡。这时车上的乘客纷纷夸师傅开车技术好，开车的师傅也得意地吹着：“要是别人遇上这样的崩坡，慢慢梭过去，那就要着（遭殃）。”如此惊心动魄的场面，那几年在我旅



春节前的茂县街景：各沟的羌藏村民都来到县城购年货，或在此出售药材、野鸡等山产。右图中羽毛多彩亮丽的是金鸡

途中是常见的事。

迭溪城是过去旧帝国的驻军点。1933年一次七点五级的大地震，震塌了几座山，造成迭溪海子堰塞湖，也淹没了大半的村寨与迭溪城。过了迭溪，沿岷江的公路进入茂县最北端的较场与太平乡。较场，听说是唐朝女将樊梨花校兵、练兵的地方。附近还有一个“点将台”——可能是烽燧遗址——据说这是唐朝皇帝封樊梨花为将军的地方。太平乡的杨柳沟、牛尾巴，以及岷江西岸的松坪沟，都有许多羌族村寨。过去派驻迭溪营的朝廷军士，主要防范的对象便是他们。

过了太平便进入松潘地界。车行不远，有一地称“龙湾”。后来这儿炸山开路，果然在山壁上出现一条“石龙”，这是由上而下蜿蜒如龙的一条带状岩层，高约二十米。我每经过此地，常惊叹造成此地景的地壳运动何其猛烈。松潘南部的镇江关，过去也是沿岷江的军事重镇，目前只是过路长途车师傅们打尖休息的街市。本地人说，镇江关便是薛仁贵、薛丁山征西时的“寒江关”。热务河由西来，在镇江关流入岷江。热务河谷下游段称作小姓沟，上游段称热务沟。小姓沟内的小溪谷如大尔边沟、埃期沟等等，是羌族聚落分布的西北极限，与此相邻的热务沟便都是藏族了。热务有红色的土壤。镇江关的人说，唐代征西大将薛仁贵在路边睡觉，现出他的本尊——一只大白虎。他儿子薛丁山不晓得，拉弓射杀了这只虎。当时薛仁贵流下的血染红了土地，这就是热务红土的由来。1995年的田野探勘之旅，沿途我只深入一个山沟，住进沟中的村寨，这沟，便是松潘的小姓沟。

在小姓沟的埃期村，我花了五个小时爬上海拔四千多米的高山，在敬山神的塔子（高约一米余的锥形石塔）上插上一根树枝，算是拜了地头。又到一个高山湖泊边撒下一把花草，对海子神致敬。以后十余年我多次到埃期村都平安无事。这一行程证明我还能爬山，这是作羌族田野研究的最基本要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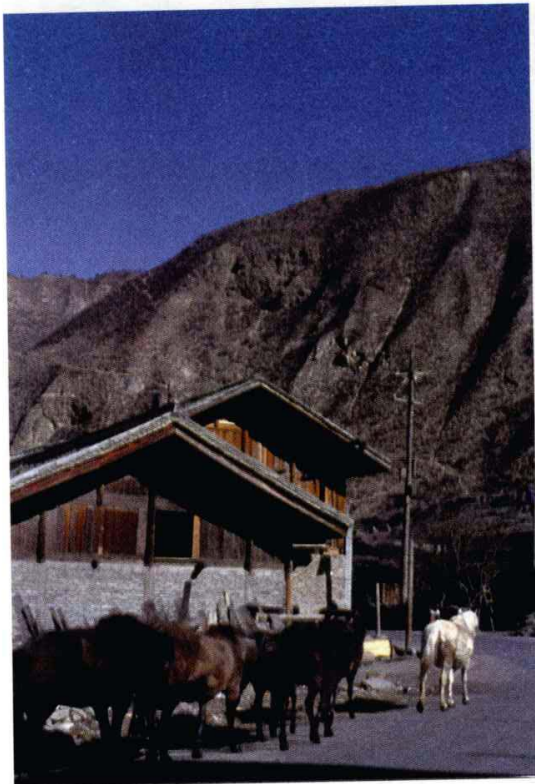


向山壁上的神龙致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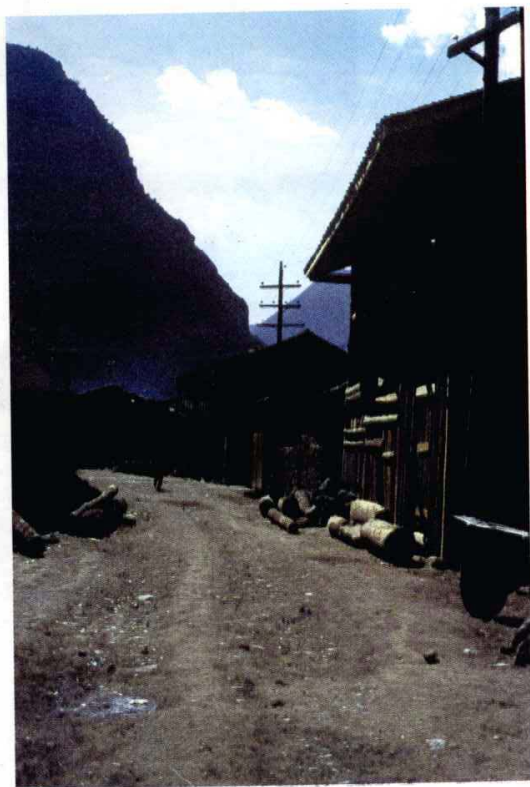


杜杰祭过海子后摄于迭溪海子前

那一年在小姓沟耍了两天后，我们折回到茂县，过土地岭梁子往北川去。由茂县县城到北川的曲山镇，由于路况差我们的车子也破，整整开了五个多小时。北川位于川西北，属绵阳地区，与岷江上游隔着龙门山脉。湔江由西往东流，北方有几条河南流汇入其中。这几条河，由西而东分别是：青片河、白草河、白坭河与都坝河。青片河与白草河流域，便是明代有名的青片羌、白草羌聚居之地。比起岷江上游羌族地区，这儿的山势平缓得多。明清以来许多汉人来此移民开荒，本地成为受官府保护的极西“王化之域”，再往西便是“羌番”之地。如此造成的效果是，由于汉移民大多至此不再西进，北川山间村落密集。田小地贫，又缺乏可利用的山林，本地农民生计比西边松潘、茂县等地务农的藏、羌族还要困苦些。这是我在许多中国西南边疆所见的普遍现象：在生计上，经常是边缘的汉人比少数民族还要艰苦些。



松潘镇江关



镇江关的小街

第一次到北川，当地人的热情便让我难忘。当晚民族宗教事务局陈主任请吃饭，我喝了二十余杯白酒，当看见座上每个人都带着可爱的醉态时，我知道自己的酒量尚可。后来我渐体会，这也是进行羌族田野研究的成功要诀之一——酒精可以快速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让一个最拘谨的人无所不谈。第二天早上，北川朋友们一大早便来邀吃早点，并要我们再“耍”一天，还说已经找人去买娃娃鱼了。我们坚持要走，走了五公里左右，车抛锚。派人返北川求救，陈主任亲率修车师傅来援。修好车，又要我们回北川，我们还是坚持要走。走了十公里左右，车又坏了，下午陈主任又带人来修车……

回想这七天的旅程，几乎便是往后十年我在羌族地区活动的缩影——喝白酒、爬山、接受村寨与城镇羌族朋友的热情招待，与泥石流、山崩、破车、坏路斗争。



埃期沟山上的海子



在此川马能发挥它们卓越的登山能力，坡度太大时，人下马，拉着马尾由马拖着爬上山



松潘



坐落山间犹如世外之境的白花寨（埃期沟）

与世隔绝的村寨？

1995年夏季我的羌族地区勘察之旅，主要目的是了解整个地区的梗概，并设法选个最适合的田野调查点。依据我在美国所习的社会人类学，这最好是个与外隔绝的，由经济生产、社会组织到宗教信仰皆自成体系的一个村落。后来我听说，松潘小姓沟埃期村便是最偏远的的一个羌族山沟村寨。埃期村也是毛老师（克木杰）的家乡，他是我在羌族地区最早认得的几个朋友之一。

埃期村所在的山沟称埃期沟，这是小姓沟的一个支流山沟。里面有三个寨子：洁沙寨、白花寨、背基寨。我首次到埃期村那天，由于一伙人同行，我们到达沟口时天色已暗。先是一行人走错路，到了阳山面的洁沙寨。洁沙寨的人送我们到阴山面白花寨时，已是晚上十一点了。进了门不



背基寨在白花寨之旁，两寨只隔着一个崖湾。根据本地人说的历史，最早有三弟兄来这儿，老大到了阳山面的洁沙寨，老二与老三分别到白花寨与背基寨。老三有点怕，老二便说，那你死了就埋我这儿来。所以过去背基的人死了要埋到白花这儿来



清晨铺上一层薄雪的白花寨

免客气寒暄一番，毛老师的母亲还替我们煮了些东西吃。最后我被安排睡在一个小房间——昏暗的烛光中，我隐约看到房中零乱地堆着些农具、马具，屋角有几坛酒，屋中弥漫着浓浊的烟熏味。这就是寨子里的房子，我终于住进了一个偏远的羌族村寨，可能是从未有外人到访的寨子。虽然床上的旄牛毡有些粗糙，虽然塞着羊毛的被子带着些异味，然而我却在自己的人类学异邦想象中兴奋得许久未能成眠。

第二天早晨醒来，一张开眼，面前的景像却让我愣住了——我见到的是，天花板上贴的台湾青春偶像林志颖的大幅海报。我感到失望、荒谬，又觉得好笑。就在如此的百感交集中，我从典范人类学之梦中惊醒过来。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朗绰的房间，朗绰是毛老师的妹妹，那年只有十二岁，与台湾、大陆、香港许多小女孩一样的崇拜影星偶像。虽然后来埃期沟仍是我经常造访的地方，但更多的时间我由一个沟寻到另一个沟，尝试由多元差异中认识“羌族”。

沟中的世界

埃期沟是个小型的羌族沟谷。青藏高原东缘的“沟”，指的是一条小溪及其两岸高山共同形成的带状河谷。深长的沟，如茂县黑虎沟、理县蒲溪沟，可蜿蜒达数十公里，里面有三五个大村，每一村又有三五个寨子。小型的沟便如埃期沟，只有一个村，三个寨子。羌族寨子大多建在半山上，埃期村三个寨子的海拔高度约在两千七百米左右。坐落在阳山面的洁



清晨铺上一层薄雪的白花寨



埃期沟中放牧的牛羊



草地好放牧，林中可采菌子、捡柴、挖药



骑马上山看顾牛羊

沙寨也称三组。阴山面的白花寨是为二组，背基寨是一组，这两个寨子位置十分接近，所以关系特别密切。在这样的山上，人们在寨子周围开垦山田，种植小麦、青稞、荞麦、马铃薯、玉米等作物，并在山林间的草地放羊，在高山顶坡草场放养马与旄牛。由于地势高寒，植物生长季节短，山田的单位产量很低。

农事主要由妇女负责，男人只在春秋两季农忙的时候下田帮忙。1990年代我所看到的埃期沟，当地农事的特点是，每一家都要种十数种或更多的作物。这样做是为了避免风险；在这儿，生计安全甚于追求最大利润。一年中有些作物可能种失败，但只要几种作物有收成，一家人便可得温饱，这是最重要的考虑。然而，这也让负责农事的妇女在一年大多数时间皆终日辛劳。



毛老师捡到一丛刷把菌



埃期沟中野生菌菇很多，可食的便有十多种

村寨正上方的森林，通常是不能砍伐的神树林，这是对泥石流的恐惧产生的信仰。更高的山林才是人们捡柴、捡菌菇、挖药材与打猎的地方。在林子里或在林间的草地上牧羊、牧猪、捡菌子，这多半是小孩的工作。年轻人在4、5月时入山挖虫草，6、7月入山挖药。经常几个人结伙入山，在山中住上一个月或更久。挖药的青年人带干粮上山，在林子里搭个草篷，晚上就睡在里面。草篷外筑个土窑，有些药材就地烤干才带下山去。过去他们此时也顺便打猎，但现在动物少了很多，枪也缴了，打猎非常的少。夏天在大山林里，采药的人以呼啸声彼此联络，也借此知道哪些地方已经有人在采药，以及这些人是不是本沟本村的人。

沿着沟往深山去，或翻越村寨后的山头进入大山，到处都是成片的森林，大多数为松木林，分布在海拔约三千至四千米间。高山上有些地方长了整片山坡的山杜鹃，当地人称之为“羊角花”。4、5月羊角花开的季节，山上一片片乳白、水红、桃红的羊角花煞是好看。

据老年人说，过去松林密得不见天日，林中是各种兽类、野禽的天下。除了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大熊猫、金丝猴与牛羚外，还有马熊、棕熊、黑熊、土豹子、金钱豹、小熊猫、豹猫、獐子、麂子、鹿、狼、豺狗、野猪、土猪子等。经常可猎得的野禽有野鸡、贝母鸡、石板鸡、聒聒鸡、马鸡、松鸡、金鸡。埃期沟有一位羌族老人，半边脸残缺，这是他年



森林上方的高山草场是埃期沟村民放旄牛与马的地方



一只受伤的贝母鸡，晚上它便进了杜杰家的鸡汤里



放养在山上的旄牛



几家的牛一起放养在高山上，偶尔派人上山察看。这是过去的情形，现在几乎天天都需人手上山护牛

轻时与一头豹子近身搏斗留下的痕迹。由于滥猎、盗猎严重，目前野禽、野兽都十分少。

森林上方接近高山顶的缓坡是高山草原，高度约在海拔三千五百至四千多米间。埃期沟接近松潘高原，愈是这样接近高原的山沟，附近山顶的坡度便愈平缓，也就更适于牧养旄牛。埃期沟村民的马与旄牛，整年都放养在高山上。让它们自己觅食，生养幼畜，抵抗老熊、狼、豺狗的侵

袭，所以这儿的旄牛比牧区藏民的牛要野得多。有生人靠近时，公牛便围成个牛阵来保护母牛与小牛，此习性与野牛无异。春耕时，村民会到山上牵一两头驯良点的牛来耕田。冬季每当大风雪来临前，马主动成群下山，回到较低海拔的村寨主人家中，但旄牛还是留在山上。秋冬时，牵几头牛马下来卖，为村民带来一些收益。过去牛马放在山上不常需要人照顾，几家的牛马养在一起，各家轮流派人隔数周或一个月上山察看一次。1999年长江上游普遍施行退耕还林后，大家对草场争得凶，盗牛盗马的人也多了，所以闲下来的年轻人几乎天天都要上山护牛。2000年我骑马上山时，在许多地方都须下马移开横在路上的栅栏，这是为了保护本地草场的新措施，也是过去从来没有的事。

杜杰的家人



羌族的咂酒，以粮食发酵制造，不蒸馏，喝时以竹竿插入，依主客、长幼、男女轮流吸食，最后两三岁的小孩也轮得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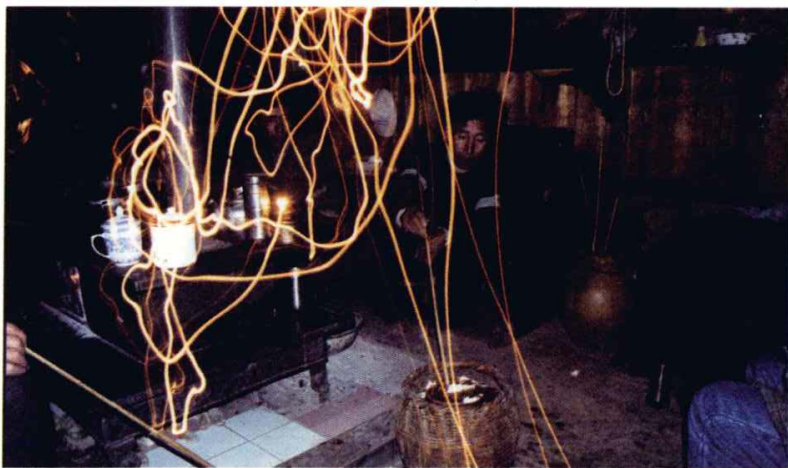
羌族平日很少骑马代步，马大多用来驮粮食

杜杰是毛老师的父亲，我一般称他“阿各”。羌族一般称父亲辈的人“阿各”，也就是叔叔的意思。杜杰的汉话说得不好，有好长一段时间，我都很难听懂他说的话。但我知道他希望了解我这个外地人，就像我了解他一样。常常我们坐卧在火塘边，他手里不时捻着一串佛珠，很感兴趣地听着我与村民们的谈话——所谓田野访谈。

毛老师的妈妈热米他是个独生女，杜杰由邻近热务沟来上门——上门也就是入赘的意思。热务沟的村寨居民都是藏族，像他这样由热务沟来上门的藏族在埃期沟有好几个。我曾经问过他一个笨问题：你是藏族，为什么会到羌族地方来上门？他的回答是，从前他不知道自己是藏族。他的村子属于“羊部落”，许多人病了，他逃出来，逃到这也是“羊部落”的埃期沟白花寨。后来我逐渐了解，我们所关注的“民族”认同与区分，过去在这儿并不存在或并不重要。在这儿，重要的是佛教教派的认同与区分，



羌族正房中的一角是祭神的地方。在较汉化的羌族村寨，这儿放的是“天地君亲师”神位；在埃期沟这样藏化的村寨，放的则是念珠、神符、神箭



杜杰在开酒坛前先敬神。光影线条可能是移动蜡烛造成的



正在喂狗的杜杰与热米他。屋前柴火多且堆积整齐，由此可知主人勤奋且家中人手充足

特别是黑教（本教）与黄教。人们以汉话说的“羊部落”，本地话说就是“察合”，经轮逆时针转，六字真言为“喻麻智么耶萨理嘟”，所以又称“麻智”。“牛部落”本地话称“博合”，经轮顺时针转，六字真言为“喻嘛呢呗咪吽”，又称“嘛尼”。前者是黑教，后者是黄教。

我每次到埃期沟都住在杜杰家。他平日事不多，春季与初夏上山采药，然后到松潘去卖药材，偶然也上山看看放在山上的牛马。在一天或一年中，他做得最多的事可能是敬菩萨。除了早晚膜拜、参加邻近各寺庙的庙会外，走在山上也经常看见他祭拜各个山神。近年来祭本地大山神“革日曩措”，参加的人愈来愈少，且只在村寨外较近的山边祭拜。听毛老师说，今年只有杜杰一个人上到神山底下。

他的妻子，热米他，如同深沟中大多数的村寨妇女，终日屋内屋外忙碌着。尤其是田里的事，多由母亲带着女儿来做。有些老辈村寨妇女，一生中没出过本村寨这条沟，一个极简单的理由便是，每天都有活要做。1990年代我在那儿时，热米他虽去过几趟松潘城，但其它地方也去得少。我听她说，刚结婚时她与杜杰骑马到黑水，到那儿的亲戚家耍了几天，那可能是她此生中少数的几次远行。听她说话，我感到很吃力，原因是她的话中有许多“反转话”。本地汉人称藏族、羌族说的“反转话”，指的是



热米他盛装准备参加邻村人的婚礼



我与杜杰、热米他摄于屋前



勒布策烈在海子边捉到一只贝母鸡



山上猎到的野鸡



骑马上高山草原的路上

将动词放在句子结尾的一种本地四川话。譬如，热米他常说：“你那么大个子，饭只一碗吃呀！”

勒布策烈是杜杰家的老二，年少时在村中以个性粗暴著称。他经常在外打工，很少回家。我第一次到埃期沟时，他正好回到家中。在他面前，毛老师另外两个弟弟显得有些畏缩，可见常吃他的亏。他怀中抱着一只猫，坐在我身边，一边抚着猫背，一边对家人抱怨着：猫这么大了，为什么还不抽懒筋。他把猫尾放在自己口中，我还弄不清是咋回事，一霎间只听得猫发出一声尖惨的哀嚎，从勒布策烈怀中挣脱，似箭般从最近的窗口窜走。勒布策烈从口角边拿下一小截血淋淋的猫尾，后面还拖着几条像沾血的粗棉线般的“猫懒筋”。他拎着“猫懒筋”在我面前晃着，说，猫不抽懒筋就不会抓老鼠。这是勒布策烈给我的第一印象。

勒布策烈有个女儿，那时在家里让母亲热米他带着。小女孩一岁七个



毛老师与父亲杜杰



朗绰与勒布策烈的女儿

月还不能走路，整天在屋内爬来爬去。吃饭时，大人们把一碗面或烤饼放在地上，她就爬过来吃，往往是猫抢先过来吃，女孩爬过来将猫赶开，漆黑的手抓起饼或面便往口里放。有时我与同来的周老师实在看不过去，便跟毛老师说，你们怎么能这样子养小孩。毛老师外号旄牛，长得很魁梧。他笑答道：“我不也是这样长大的！”

1998年春节期间，我与周老师在茂县等着与勒布策烈碰头，一同到他家去。一连三天找不到他，于是我们自己往埃期沟去。转了几道车，我们终于来到埃期沟口。吊桥前的草坪上，朗绰与她表妹牵着马正等着我们。她们说，初三、初四她们都牵马下来在坪坪上等我们，没等到。这一天，初五，杜杰拿念珠算了算，说，勒布策烈不会回来，但王先生、周老师会来。所以两个小女孩又牵马下山，果然接到我们。有了这次神奇的经验后，我总觉得杜杰深不可测。每次我离开他家，送我走到一处崖边时，杜杰都要我止步。然后他先到崖边，手持柏枝上下比划，口中念念有词。毛老师说，阿各为我的旅途祝福。

毛老师最小的弟弟，俄么泽，小时候给我的印象是瘦小畏缩。尤其每

当我到他家时，毛老师自然也陪着我回埃期沟。这时毛老师总要狠狠地骂他，为的都是他书读不好。后来我大约有两年没到埃期沟，再遇到毛老师时，我一一问起他的家人。说到小弟弟，他叹口气说：没办法，不是读书的料，我们只好让他在家帮忙种地，反正爸爸妈妈年纪也大了。2000年我到埃期沟，走到离毛老师家约还有一里路的地方，听得对面山上传来一长声呼啸，远远地似乎见着一个人从高山顶坡往下边奔边滑。我到了毛老师家刚坐下，一个高大粗黑的年青人手持长土枪大步跨入家门。刚由山上奔下来，他一面喘着气一面对着我笑。我真不敢相信，眼前这看来爽朗自信的年轻猎人，便是从前经常为了不喜欢读书而泪汪汪的瘦小孩子。

年年我到羌族地区，都要尽量设法到埃期沟走一遭，即使不能去也要打探一下毛老师的家人是否都安好。山沟中的生活，在我这外地人看来，经常都有些新鲜事。有两年阿各的牛接连遭狼害，于是阿各设陷阱用炸药炸死一只狼。又有一年，阿各在家中与一只入侵偷鸡的豹猫格斗，他抓住那豹猫，把它压在门板上，大声喊人来。毛老师的二弟党他闻声拿了一根木头门闩前来，狠狠地往豹猫头上敲。这时听得阿各一下喊：“打！打！”一下又叫：“莫打！莫打！”弄得大家莫名其妙。原来是那豹猫咬



山里的孩子俄么泽



少年在往土枪里装填火药



晚上下过小雪最宜于追踪猎物的足迹，党他带着狗准备上山打猎



被猎得的不知名动物



背基寨的婚礼。背基寨年轻人先在村前以舞狮欢迎送亲的大尔边村民，然后引着客人进入村寨中

住他的手指头，党他一棒敲下去，将豹猫的牙钉入了阿各的大拇指。这豹猫的皮毛，目前还在我家中珍藏着。

高山草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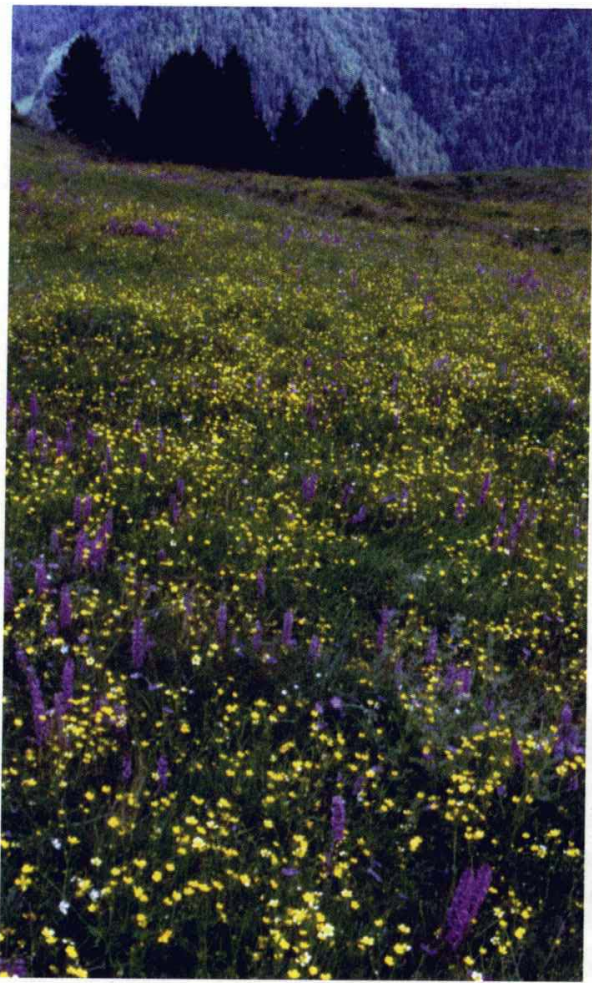
埃期沟中到处景色都很美，但最让我怀念的还是山顶上的高山草原。1995年夏季我便上去了两趟。白花寨大约海拔已有两千七百米，由此往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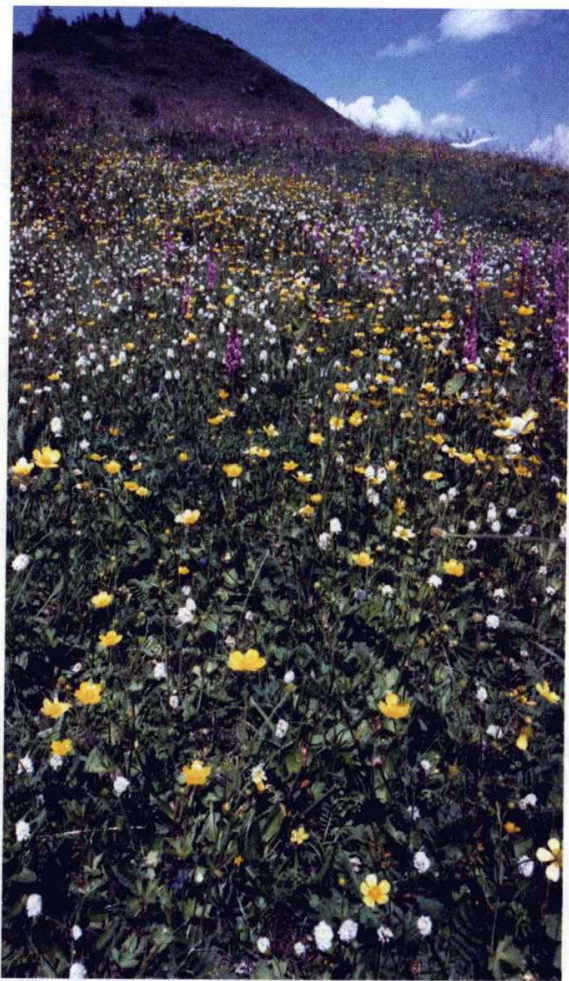
埃期沟的高山顶坡上，夏季开满着各种各色的野花

攀约千余米，山的坡度愈来愈缓，但空气愈来愈薄，所以走来十分吃力。穿过一些松木林后，来到山头上和缓起伏的高山草原。夏季地上铺满了各色的野花，每片山坡都常有一种优势花草，所以从一片山坡到另一片山坡，大地像是变换着各种花色的地毯。由于高山上空气稀薄，每次我都对自己说，年纪不小了，这应是最后一次上来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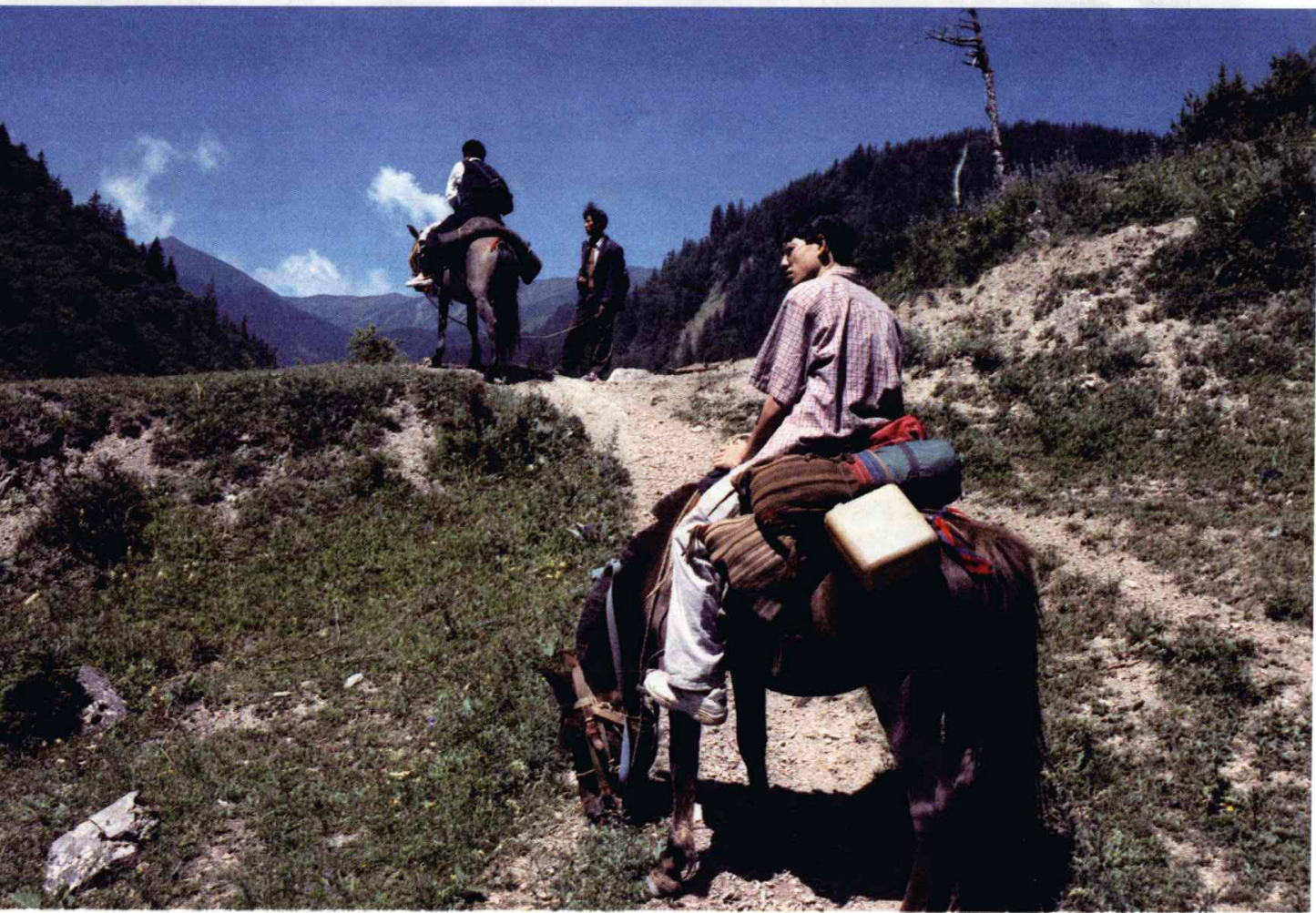
高山草场上有一个海子，本地人用汉话称高山湖泊为海子。第一次上到海子边上，或因为它的美让我态度有些轻佻，或因为我这个外地人出现得太唐突，一片乌云过来就突然下了阵大雨。后来毛老师告诉我，到了海



走过一片花海



越个小坡，眼前又是一片花海



骑着川马上高山草场

子边上，不能嘻笑喧哗，要心存虔敬。许多羌族山沟都有海子，这是本地村寨民众求雨的地方。埃期的人告诉我，在海子上求雨灵验得很，经常仪式还没做完，人就要奔跑躲雨了。还有便是，在海子边上将一把地上采的花草撒在水面上，若花草停在原处或往海子中间漂去便是好的，若花草漂向岸边，便表示人做过坏事，或近期将有祸事临头。

2001年夏季，我与俄么泽、毛老师、周老师等一同骑马上山，带着营帐与炊具。我们刻意绕路，经过一片斤斧未入的森林。林子里古木蔽天，到处是横躺着的巨大倒木，上面覆着深苔，脚下是如厚地毯般的陈年累积败叶枯枝。穿过林子时，俄么泽挖了些中药材，拣了不少菌子。上去高山草场，我们在一小片松林边扎营。夜晚大家在星空下烤腊肉、菌子，喝白酒。清晨天尚微亮，我就被鸟鸣声闹起来。钻出营帐，在微亮的晨曦中，



穿越从未遭砍伐的老林



沿着山谷往高山草原的路上



晨曦中的高山草原



俄么泽与他的狗

山顶草坪的坡边呈现一道微带弧形的地平线，我们的马正在那地平线边悠闲地低头吃草。这两天唯一遗憾的是，俄么泽带了猎枪与狗，我们却什么也没猎到。因为上山时一头公狗跟了上来，追求俄么泽的狗。一路上，我们骑在马上几度看见路边有野兔窜出来，唯有那两只正在谈情说爱的狗什么也没看到。

山神与地盘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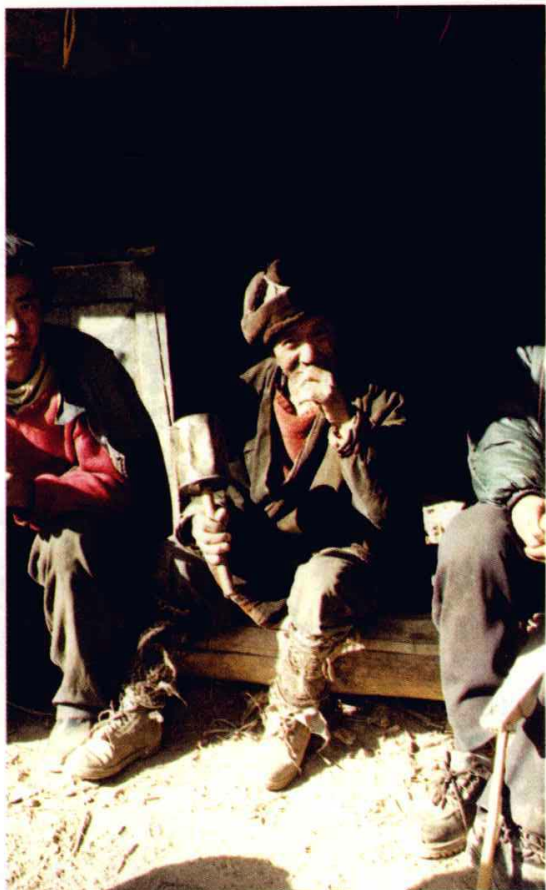
上高山草场，要沿着坡度较缓的山峻往上攀。经常到了一个视野开阔的山脊，便可见到一个乱石砌成的石堆，上面插着一些大小树枝。这是山神的标志，当地称“喇萨”，以汉话称“塔子”。埃期村的人在山上经过“喇萨”，无论是不是本寨的山神，都要插上一根树枝以示敬拜。



管边界的山神也坐落在村寨资源边界上



山神的塔子



手持转经筒的背基寨老人

1995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坐在毛老师家的火塘边，听一位背基寨的老人说“山神”。以下是我根据录音整理的当时他讲的一番话：

山界，我的土地是从那里到那里。山界界长，其它没有什么神秘的东西。祖祖辈辈，几千年几万年留下来，这个不能忘。这个山坡是怎么传下来的？为什么要敬它？敬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地盘。我们一组的是“学都”。大菩萨，那就是一转啰；那便就是两个组的菩萨，学务喇萨。（山神菩萨）保护界线里的人。有近的界线，有远的界线；有近的菩萨，有远的菩萨。塔子有具体的名字。一、二、三组共同的菩萨就是格日囊措。再大的菩萨就是雪宝顶，都如，那是包括所有藏族、羌族整个松潘县的菩萨。敬酒以前都要敬都如，和卓都如。

他是说，一组（背基）的山神是“学都喇萨”，一组与二组合祭的山神是“学务喇萨”，三个组共同祭的更大山神是“格日曩措”，更大、更远方的大山神是整个松潘藏族、羌族都要敬的“都如”（雪宝顶山）。他说，山神保护界线里的人，这是对山神信仰十分精准的解释。在埃期村这样狭小而资源有限的地方，大家“分地盘”是极普遍的事。一个寨子有一个寨子的地盘，一条沟有一条沟的地盘，山神便是这些地盘界线的维护者，便如那老人说的，有近的界线有远的界线，有近的菩萨有远的菩萨。而且，经常山神的标志“喇萨”坐落的山脊，便是她所保护的地盘边界所在。



望着山坡上的白花寨



由白花寨远望格日曩措山神



背基寨。它的对面山上便是阳山面的洁沙寨。
背基寨近景。

祭本寨山神可凝聚群众，并借以强调大家共有的资源领域与界线。一组、二组年轻人说，埃期沟的三个寨子的民众平日相处融洽，但当一组、二组共祭“学务喇萨”时，不知为何，特别容易与前来看热闹的三组年轻人发生冲突。我对此的理解是，因为此时人们的“界线”感十分强烈，因而对界线外的人也就易有敌意。虽然如此，平日人们一般都会尊重他人的山神，在山上经过别人的“喇萨”也要致敬，这表示自己知道并尊重别人的地盘。许多重要仪式开始时，主持仪式的长老要开酒坛请神。此时他们



整个川西的岷江及大渡河上游山区到处都有山神，象征着在这儿各地人群都须知道自己的传统“地盘”并尊重他人的地盘



白花寨与背基寨共同的山神“学务喇萨”

要念开坛词，将本地附近与远方所有的山神都请来共享。这个仪式，象征着在本地大家都知道彼此的神，也尊重各个神所守护的村寨地盘边界。

埃期沟中除了有三个寨子之分外，各个寨子内还有些人群与地盘区分。譬如毛老师家所在的北哈寨，里面又分为“北哈”与“梁嘎”两个小寨子，各有各的地盘，各有各的山神。“北哈”小寨内又有措河、木佳、戈巴戈、罗窝等地名，这是更小的地盘，每一地盘内只有两户到五户人家。同一地盘内的几户人家经常是一个“家族”，祭同一个地盘神，这也就是家神。毛老师家的小地名叫措河，家神是“察阿德格母西”。

杜杰对我说，外头的人来到本地，在一个地盘的老地基上盖房子，就归这儿的地盘神管，他就要敬这个神。因此供奉同一个家神的人，关系密切，但大家不一定有血缘关系。相反的，亲兄弟姊妹，由于出嫁或上门而供不同的家神，因此经常属不同家族。如杜杰自己，来自于热务沟，那儿的藏族习俗与这儿相同。他说，老家热务那地方有三十多个家神，他家的神叫“主搭卡哈”，但他来了这里就敬这里的家神了。毛老师对此有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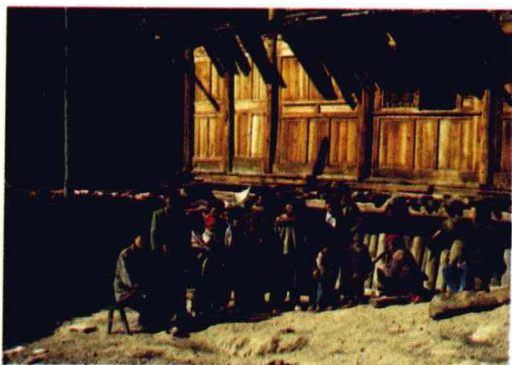


洁沙寨的一家人



每个寨子内还分有许多“地盘”，同一地盘内的各家户便是一个“家族”

种很准确的说法：“我们的家族是跟着地域划圈圈，而不是跟着亲戚划圈圈。”人们常说，远亲不如近邻。但埃期沟的人才是这句话的实践者，在这儿同一“家族”的人永远是近邻。



婚礼中头戴裘帽的是女方的舅舅们，中间站着念请神词的是大舅



背基寨冬天的早晨。这天寨中有户人家办婚礼，埃期沟三个村的人都来庆贺，年轻人放土枪夸耀本寨的势力

既然地盘与亲戚关系分得那么清楚，因此，到别人的地盘上去挖药、打猎是否绝对不可以？事实上，并不尽然。由于同寨的人一般不通婚，或同家族不通婚，所以羌族村寨民众的姻亲常是邻村或邻沟的村民。村寨中一些交游广有领袖气质的人，更经常与外地羌族或甚至邻近藏族人“打老根”。打老根，也就是结拜把兄弟。有时羌族村寨民众挖药、打猎走远了，到了别人的地盘。当地人来找茬的时候，他们便要说，我们寨的某某人与你们寨某某人是亲戚或老根。以此要求宽容、许可，通常便能解除危机，或最多入侵者被训斥、驱离，不致发生严重冲突。

然而这都是过去。现在，大家都认为广大山区是“国家公共财产”，没有哪个地方的人可以据为私有，所以山神愈来愈没人认真地祭了。山神失了势力，地盘界线就模糊了，为了挖药、争草场，各沟各寨民众间的冲突也多了。

松潘城

松潘城是个奇怪的地方。特别是在过去，它充满了混乱、混杂，无论是在社会、政治与宗教方面。在川西，唯一可与它相比拟的城市是灌县。所以过去，在1950年代以前，松潘城内的痞子说，整滥就整滥，整滥了老子下灌县；灌县的痞子则说，整滥就整滥，整滥了老子上松潘。

这是因为松潘为多方政治、经济、文化势力的交汇点，同时也是各方势力与规范的边缘。松潘黄胜关以西及以北称口外、关外，由于大多是草原又称“草地”，黄胜关以东及以南则是口内、关内。以民族来说，松潘草地是说安多语的游牧藏族，有包座、铁部、阿树、麦洼等多个大小部落。松潘城周边农区的藏族更为复杂。城北边有上三寨、阿思峒大寨，东北边有羊峒八部，更往东去是平武的虎牙藏族、色尔藏族；



松潘城是古松州的核心，清代时是受“西番”包围的边陲重镇



松潘人以“关外”称松潘西北的高原。这是关外的一个藏传佛教圣地，也是刻石经的地方



整修前的松潘老城垣。为了推动观光旅游，近年松潘城墙已大幅度整修



关外的色达草原

城东南有大姓部，南边有下坭巴部，更往南是摩尼沟藏族、热务藏族、小黑水藏族等等。每个地区、每个部落，在宗教文化、生活习惯及语言上都有或多或少的差别。在清末民国时，汉人一般称他们为“西番”，后来“西番”都被识别为藏族。现在松潘城内住着汉、藏、回、羌各民族，除了公职干部、企业职工外，多为工匠、商人与来此打工的外地人。现在旅游生意为本地增添了不少生机。七八十年前松潘也繁荣过，那时的松潘是鸦片买卖的天堂，四方帮会毒贩都到这儿来“赶烟场”。汉商会匪与本地土官（村寨部落头人）相勾结，在深山村寨附近种罂粟。

这儿有不同教派的藏传佛教，有回教，有汉式佛教、道教，但对这些宗教的“正统核心”而言松潘都是“边缘”，在这儿大家都不太讲究

正统与地道的规矩。然而就是这样的边缘性与不地道，使得不同民族、不同宗教的民众在此融洽相处。这儿来自各地的族群说不同的语言，但许多人都能说两口话，甚至三口话，更普遍的是大家用“汉话”彼此沟通。这种“汉话”，或是地道的四川话，或是混合本地藏语语音、文法的四川话，所谓“反转话”，无论如何大家都听得懂。

松潘城有今日多元族群、宗教、语言的混融局面，是曾付出过惨烈代价的。近代以来松潘城两度失陷于周遭藏族部落联军，两次均造成大量军民伤亡。最近一次，发生在辛亥革命的那一年。1911年，当川西保路同志军起义时，松潘邻近各部落在一个名叫尤珠的头人号召下要求裁撤本地厘金局、警察局。当时的松潘同知蹇念恒不许，于是各部落土官率部众进驻松潘城外，城中汉、回民众惊惶失措，纷纷逃离，蹇念恒也弃职逃往牟尼沟的瑟波寺躲避。此时村寨部落兵勇进松潘城，大肆掳掠。后来听说清廷已倒，各部落土官又率其部众往南劫掠，直到太平以



旄牛沟的瑟波寺（今称道包寺）。1911年松潘之乱时，清朝官员曾在此避难

下的迭溪，直逼茂县。后来汉军来此平乱，各部落纷纷投降，几个大寺院的主持喇嘛、活佛也出来调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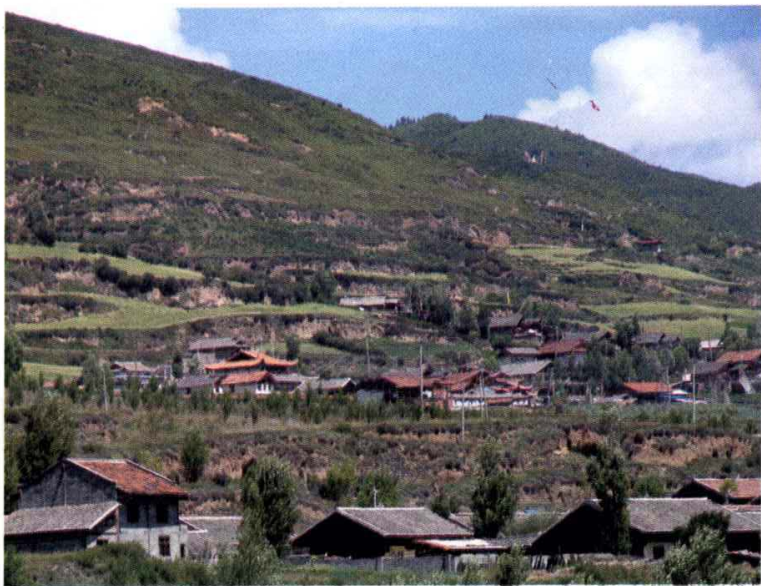
1929年，也就是此事件过后十八年，我所任职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有位年轻的助理员黎光明，与其友人王元辉结伴在松潘一带调查当地民俗。据他在松潘所闻，当年那事件平定后，被处死的多是松潘城中引村寨兵勇攻城的本地汉匪头目，共三十五人，攻城的部落头领只捕杀尤珠一个人。动乱的主要领头分子，如对河寺的郎日喇嘛，以及牟尼沟、热务沟等地土官，只是被罚些银两了事。黎光明给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报告中，有如下生动的描述：

当尤珠临刑于红花屯的时候，刑场里已摆着十几个汉人的尸身，他指尸身向众人说道：“杀这些只当杀狗割草，算不得强，胆大的怎么不杀郎日和牟尼土官？”

热雾不纳罪银，并约众袭入松潘城劫狱，想救出在囚土官。结果逃出几个土官都被官兵追杀了，只尤珠的儿子逃脱。



1929年黎光明所摄的林波寺
活佛旺拉吉



今日松潘对河寺附近村寨

当热雾部众入城劫狱时，其它的土官不敢动，及热雾土官逃走未脱被杀后，官兵割其头置狱中几日，供果似的置于在囚土官之面前。热雾终抗不认罪银，于是官兵又征热雾十八寨，杀一些人，烧几个寨子，西番在这一次初尝机关枪的滋味。

热务沟被平定后，一部分村寨被交给小黑水土官来管辖，因为小黑水的“獐猓子”曾帮着四川来的军队打热务。

更早的一次松潘变乱发生在清咸丰庚申年，也就是1860年。当时英法联军入侵中国，太平军燃起的战火遍及数省，川兵多被调到东边去。在此先前几年，各寨藏民对清帝国缴税粮，松潘官府规定要用尖斗，也就是缴的粮要在斗量器中堆起成尖锥状，这自然是地方官府的贪鄙。各部落头人对此不满，官府又挟其驻军强硬应对。于是各部落间开始传木刻，号召军事联盟，这是本地各部落间结盟的一种传统，应允参战的村寨都要在一块木头上划下刻记。就在此时，小姓沟中传出有一活佛降



原来很少出沟的羌族妇女，如今也经常走出寨子到松潘城来玩玩



传统的黄龙寺庙会结合观光旅游如今更热闹了，四方村寨百姓们聚集来观看“电视上唱歌的那些娃儿”



在黄龙会上附近藏族、羌族竞相夸耀本民族文化。在服饰上康区藏族永远最受瞩目

生，活佛名黑仑来，据说他生来就会说话，满周岁便能诵经说法。诸部落头领以打松潘之事问他，得到他的赞同，于是各部落大举起事。

由于驻军不堪一击，松潘周遭的朝廷边防营堡纷纷被攻下，松潘成为孤城。城内官员、绅商出钱出物资，募城内外百姓为团勇护城。松潘城被围困十个月后，由于城内严重缺粮，终于失守。各藏民部落兵丁入城劫掠焚杀，松潘城内汉回军民死伤无数。守城的总兵联昌躲入林波寺中未受害。这次变乱在地方文献上称“庚申之乱”。后来清朝廷派来大军平乱，联昌也受命戴罪立功。在朝廷之优势兵力下，各部落武力很快地被击败，众“西番”部落又请出活佛喇嘛作调人。后来，联昌在林波寺喇嘛的要求下主张宽抚众番，因此战后只杀了活佛的母亲一个人。不但如此，联昌还对松潘城内的回、汉商人征茶税，来供养林波寺喇嘛，以及付给各村寨土官、兵丁饷银，只希望他们不要再作乱。松潘城内的回、汉居民可不满意，后来在五十年后发生前面提及的“辛亥之变”



旄牛沟瑟波寺的大殿

时，他们认为就是因为联昌的宽厚政策使得变乱一再发生。

2000年至2003年，我年年到松潘、小姓沟、热务沟、牟尼沟等地，寻访各种文献（包括黎光明的考察报告）中的老记忆。在小姓沟，一个三组（洁沙寨）的老人告诉我一个活佛故事，故事中有活佛，有战争变乱，有战后被杀的活佛之母，但我不敢确定他说的便是地方文献中记载的“黑仑来活佛”之事。以下是那老人说的故事：

活佛名叫“阿尼格萨”或“阿尼尼基”，他生下来没多久就不见了。后来，他托梦给他妈妈，要她到山上来看他。活佛的母亲把全寨子的人都带了去，但在山上没看见有人。他们就把柏枝烧起，烟子起来后，出现一只鹰在空中盘旋。于是人们便说，活佛还在，就把他母亲与姊姊装成神的样子。大家都来拜，并说羌族有自己的活佛了，可以出去打仗了。于是大家就出沟去打镇江关，联合其它各沟各部，一直打到太平以下解放村那儿。后来汉兵反攻，本地兵败了，就找彰腊活佛当调人。打仗时，拘泥（指松坪沟或小黑水）那有个土官靠向汉军，所以战后汉军就派他管热务沟的老百姓。战败后，活佛这家子要承担赔偿责任，官府规定他们必须把松潘的仓库填满。后来松潘官府还是把活佛的母亲与姐姐杀了。活佛母亲的头被砍下时，没出血，出的是奶；她姐姐的头被砍了后，肩膀两边长出两条龙来。

这神话故事中，隐约夹杂着清末到民国初两次松潘变乱的相关“史实”。然而在这地方史实并不重要，所有的历史都会成为神话。

黎光明

在牟尼沟，我探访后寺及道波寺（又称瑟波寺、雪布寺），这儿已没有人记得当年那些围攻松潘城的英雄好汉，更忘了曾躲在寺中的松潘官员，当然也没有人记得1929年进入这条沟的黎光明。那几年，为了出版黎光明字迹潦草的考察报告，我将他的手稿反复读了好几遍。由于如此熟悉，后来我每到松潘、镇江关、牟尼沟等地，一景一物都让我仿佛觉得黎光明以及他报告中提及的喇嘛、土官都活在眼前。这也由于黎光明特别的书写手法——在报告中他详细记载当地土官、喇嘛所说的话，描述他们的行为举措，这样深刻描写“个人”的写作与着重描述“社会”的学术书写有很大的不同。

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于1928年，这是国民政府时期集各方学术精英的研究机构。许多中国社会及人文学科的开创者，如考古学家李济、史



旄牛沟内的后寺（扎日寺）。当时旄牛沟之“西番”势力颇大，黎光明在1929年进入此沟是相当大胆的行为

学家傅斯年、语言学者赵元任、人类学者凌纯声，都曾任职于此。黎光明是历史语言研究所最早期的研究人员之一。史语所刚成立，他便受聘为该所助理员，并立即前往岷江上游作民俗考察。1929年他由川西回到史语所，不久便离职他去，也从此离开了学术界。他留在史语所中的，只有一本题为“川康民俗调查报告”的手稿。这本手稿在该所图书馆里尘封了七十四年并未出版，显然因为，以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学术水平与对“学术”的定义来说，这手稿被认为学术价值不高。

然而，对于早已熟悉充满拗口的学术词汇、艰涩的西方理论以及故示客观之人类学论文的我来说，黎光明田野杂记式的报告却是十分清新可人。他从不隐瞒自己的主观偏见，更难得的是在那年头他可能未曾听过“社会结构”，因此他不会以社会结构、模式来忽略个人。相反的，在他文中每个大小人物都活跃纸上。以下是一段他对松潘附近的大寨（阿思岗）土官的描述：

大寨土官但真王吉，是十八年前率部焚掠松潘城的好汉。他的地方扼松潘通平武的大道（接济松潘最重要的粮道）。辛亥之役，城陷后，汉人从东路逃走，他拦路截劫。随后，汉军恢复松城，他久不缴纳罪银，被监禁过五年。庚子年，他进京朝贡，恰逢光绪皇帝被洋人赶走，他走到西安打转身……

末了，他开诚布公地向我们谈一段关于政治问题的话。

“大清皇帝出来不出来还不晓得呵！”

“大清皇帝真好。他每年要给我二十四两饷银；我们三年去朝贡一次，他还赏我们很多的东西。民国不给我们的饷，我们也不去朝贡了。此刻，听说，没有皇帝，官也要拿来选。你选这个，我又去选那个，选来选去，两边打起架来。时而那个

赶走了这个，时而这个又赶走那个，这个说那个的不对，那个又说他自己好。成都的三大宪也就换过不少了！到松潘来的大官小官，一下说是这个放来的，一下又说是那个放来的，有些同是一个人放来的也会打起架来。我们弄不清楚这些那些，也不晓得怎样才好！”

“还是大清皇帝出来要好些。”

我读过许多中国近代史专著，熟悉大小史事及其前因后果，但没有哪一本著作能如黎光明的报告那样给我一种身在历史中的“感觉”。我也读过许多人类学著作，它们中也没有一本如同黎光明的报告那样能有血有肉地描述“人”，包括文中不经意流露的他“自己”，而让我感觉身在当时社会之中。

人类学家经常有意忽略“土著”家中墙角边的可口可乐罐，以此建构一个原始的、未受外界影响且社会结构自成体系的“土著社会”。黎光明的田野杂记却没有这样的弊病；以下是他对一位松潘喇嘛的描述：

杨喇嘛是瘦瘦的一个身材中平的人，口下倒栽着一股花白胡子。他名慈争顿真，但是他已经讲究到使用名片，右方还题“松潘灵宝寺喇嘛”。他递名片给我们的时候，解释道：“林波寺要翻作灵宝寺才恰当，因为壬烹（林波）原是宝贝的意思。”马大爷却很不满意他公然把喇嘛二字印在名片上，因为“他哪里进过藏来？怎么配称喇嘛？不过一般人抬举他，称呼他喇嘛就是了”，这是马大爷早就对我们谈过的。

我们把我们的名片递给杨喇嘛以后，他在袋中掏出一只铅笔，在我们的名字旁边注上西番音；同时，马大爷向我们努一努



旄牛沟内的藏族村落房屋

嘴，使个眼色，意思是：“瞧！这怪物公然玩这般讲究！”杨喇嘛既知道孙中山，并且听说过有蒋介石，但不知有南京也。更可惜的是他问我们道：“三民主义和中华民国到底谁个的本事大？”

这段文字虽充满戏谑，但当时这位喇嘛的作为与黎光明的偏见均跃然纸上。为何那时一位松潘的喇嘛知道使用名片——某种新事物——是可笑的事？为何他不知道三民主义与中华民国——另一些新事物——也是可笑的事？以我自己来说，为何当牟尼沟后寺一位年轻喇嘛在接待我们时不停地接手机，这样的举止也让我觉得荒谬可笑？或者这是因为，我们对“少数民族”、“边疆”的认识都被一些刻板知识所塑造——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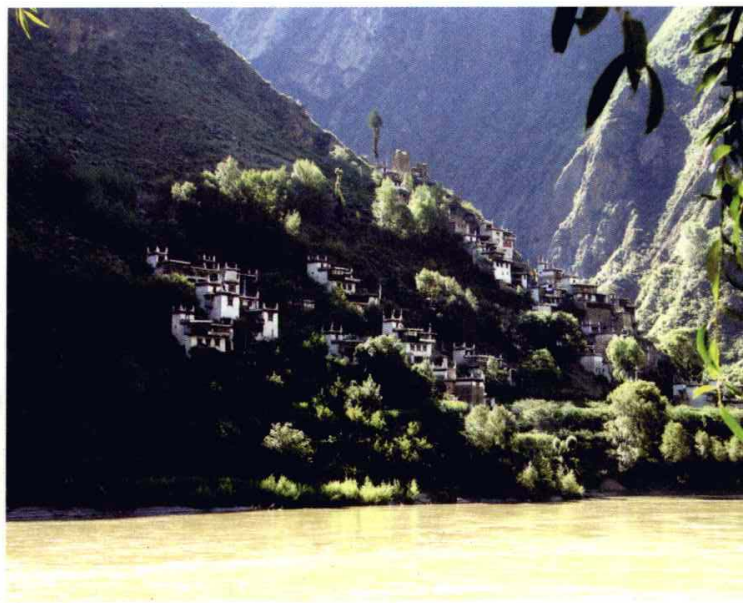
是边远落伍之人，因此与一些新事物不相称，他们又是我国族同胞，所以对一些新事物该有常识。

黎光明离开史语所后，有几年从事教育工作，后来便投身于军政——这才是他以及他周边的朋友们所热衷的革命事业。年轻时黎光明曾与一帮朋友从事反军阀学潮，因此被大学开除，而后他们大都进入黄埔军校。黎光明则因信奉伊斯兰教，难以适应军中生活，所以转入中山大学，毕业后进入历史语言研究所。因此，他身边尽是一些整天谈革命的朋友。1929年与他一同到汶川、松潘考察的王元辉，便是这样一个黄埔军校出身的革命青年。1940年代的先头几年，王元辉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十六区行政督察区专员，负责整顿川康边区军政民政，铲除鸦片是他最主要的任务之一。他的革命同志，黎光明、汪一能，也在这几年分任靖化（今川西金川）与松潘县长。

1942年，王元辉率军铲烟，在懋功（今川西小金）被护烟的会匪、村寨兵勇围困在县城内，赖地方势力出面斡旋才得脱身。1943年，汪一



松潘旄牛沟内的藏族村落



大渡河流域金川（靖化）附近的嘉绒藏族村寨。黎光明死于靖化县长任上

能在松潘铲烟，在安顺关附近被会匪及村寨民兵俘虏，受尽凌虐而死。1946年3月，黎光明刚上任靖化县长才两个月，便设宴伏杀当地掌握鸦片买卖的袍哥头子杜铁樵。以当时的局势来说，黎光明此举几乎是志在杀身成仁。袍哥武装党徒当晚便围攻县府，次日县府被攻下，黎光明受害并遭到曝尸之辱。

读到这些资料时，我想起毛老师的父亲杜杰曾对我说“吃万恶肉”的故事。他说，小时候曾听得大人说，那时松潘有个县长“汪万恶”，到处铲除没收村寨百姓种的鸦片。后来有一天，消息传到热务沟里，说是在安顺关那儿抓到了汪万恶，沟中老少都奔到外头去看热闹。他说，汪万恶是个胖子，他死了后还有许多人去抢着挖“万恶肉”吃。近五年来，我多次打金川过。金川也就是黎光明死于其县长任上的靖化。我想起汪一能，想起黎光明及王元辉。我想起1928年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致电滞留成都的黎光明，催促他赶紧到岷江上游去做调查，并要他“少群居侈谈政治大事”——又仿佛见到在成都的茶坊里，这一帮青年热切地谈论国事。谁料得到，最后他们多以生命来说明“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望着金川街上熙熙攘攘的人，我想，谁还记得黎光明？这儿的人又是怎么说他呢？

北川



沿着陡峭山崖边的山道进入内外沟（北川小坝乡）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我一直急着打听几位羌族朋友的安危。到了6月初，我非常要好的一位北川朋友董正寿仍讯息全无。6月中旬我到了成都，但无法进入北川灾区。王铭铭兄的一位研究生曾穷石来自平武，她父亲在平武、北川熟人都多，所以我托她打探。6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我在北京参加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们的邀宴，正在酒酣耳热之际，我的手机收到穷石发来的简讯。她写道，根据她父亲得知的可靠讯息，董先生是失踪在倒塌的北川县委大楼内的干部之一。看完简讯，我仰头喝下一杯白酒，算是替老友送行。

荞麦的故事

1996年初的冬季，我第三度进入羌族地区。先到北川，同行的有毛老师与北川民族宗教事务局的王泽元。董正寿是泽元的老友。我到北川的第一天，泽元便安排他以及其他几位北川人作我的“报导人”。正寿之外的几位北川朋友都较年长，也都十分熟悉地方掌故与文史资料。相对来说，正寿比他们年轻得多，且对地方文史不是那么的感兴趣。当时在我们的闲聊中，他提到羌族最有特色的食物——荞麦馍馍。他说，他要做点来让我尝尝。当时我并未着意。第二天一大早，他真的带着热腾腾的荞麦馍馍来敲门。想到他可能在天还没亮便起身揉面，我对他的待客热忱十分感动，也因此对荞麦馍馍印象深刻。后来在一些访谈中，我逐渐了解“荞麦”在本地有特殊的社会意义，而且它的意义在近现代有很大的变化。

过去（1950年代以前）由于族群间的歧视，在本地沿溪河的各村落、城镇人群间形成“一截骂一截”的情况。也就是，每一地方的农村民众都被下游村落及更下游的城镇居民喊作“蛮子”或“山蛮子”，但他们都自称是“汉人”，而骂更上游的村落人群为“蛮子”。我在北川青片乡曾听

得一个笑话。当地人说，以前有汉人来本地买猪，他们走进村落中到处问：这是不是蛮子的村子，我要找蛮子买猪。当地人回道：不是，不是，我们是汉人，蛮子还在上头。这些汉商走到上游村落，当地人仍然说蛮子村落还在上游。于是，来找蛮子买猪的汉人就一直往深山去，永远找不到蛮子的村落。

那么，荞麦又怎么和这些有关呢？这是因为，愈往上游去，愈是高寒且土地贫瘠，玉米、水稻都长不好，只有种能耐寒耐贫瘠土壤的荞麦、青稞等，因此愈上游的村落民众平日吃荞麦愈多。就是这样，过去荞麦被当做“蛮子吃的粮食”。还有便是，荞麦磨粉做成的荞麦面或馒头，要比小麦面粉做的颜色暗些。这也符合人们对“上游蛮子”的印象。由于高山上的阳光辐射强，且愈住在上游村寨的人生活愈困苦，人们在烈日下劳动的时间也愈长，因此他们经常看起来皮肤黝黑。这也使得过去本地人们常以“荞麦”影射“上游的人”或“蛮子”。



青片乡的农家普遍都养蜂，蜂筒由木片树皮制成



走入内外沟途中的良田美景



仲夏午后与三两邻人坐在树荫下喝茶聊天，是内外沟村民闲暇时最大的享受。右边第二人便是在地震中遭难的董正寿兄

这一年夏季我再访北川。正寿领着泽元与我，一同到他位于小坝乡内外沟的老家。我们先搭车到小坝，第二天清晨，沿着一条狭窄险峻的山路走入沟中。内外沟是白草河上游的一条支流山沟，正寿的老家位于深入山中的内沟里。内沟有四个村：上沟村、酒厂村、茶关村、茅岭村。正寿老家在茅岭村河坝组。在这儿，我一路上观察是什么样的环境，让人们“一截骂一截”的相互歧视，以及歧视造成的汉化效果。

被视为“蛮子”的人，需努力印证本家族是汉人。我在内外沟经常听到人们告诉我，他们的祖先是“湖广填四川”时来到本地，因此家族本源是汉人。还有些人强调，他们祭祖以及过端午、中秋的习俗是如何地道；同时他们也闲言闲语，说本村某家人的年节习俗不对。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天晚上，我们与几位本地老人喝酒闲聊。一位老人从怀中掏出张皱



白草河流域小坝乡附近的
山田与农家

皱的纸，对我说：王教授，难得有你这样有学问的人来这儿，昨晚我作了首四言绝句，要请您指教。对于粗识李白、杜甫的我来说，当时真是窘得很，我忘了自己是如何借着酒醉将场面撑过去的。后来我才知道，在这些深山村落中，读过古书能作诗为文的老辈子非常多。

北川人的羌族认同，由1980年代中期开始逐渐强化。到了1990年代中期，也就是我初至北川的那几年，许多山间村落百姓都自称羌族，并以此为荣，城里的羌族知识分子更努力强调本地特殊的羌文化。青片、白草等河川上游村落百姓的一些非汉习俗、记忆，现在都成了珍贵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在这气氛下，过去被视为“蛮子粮食”的荞麦，成了本地羌族有代表性的特色食物。那几年，我常与北川朋友餐宴；当荞麦面、荞麦馍馍上桌时，朋友们总强调它们是北川羌族最有特色的食品。在泽元送我的这本《北川羌族资料选集》中，我读到一则有关荞麦的地方民间故事：

（荞子与麦子）：麦子很瞧不起荞子，理由是它的面粉太黑。而荞子却说，我虽黑一点，但一年收两季，还在屋头过年



北川羌族农家的房子完全为汉式，与过去川西乡间汉人的房屋没有差别





沿白草河到小坝途经一个街市。这儿的街市一周一次或两次，附近山区居民都带着自家的农产品、药材来卖，也买些日用品回去

哩，而你麦子一年只收一季，还在坡上过年。把麦子气得肚皮上裂了一道口子。

编者在故事后写道：“这也从另一个侧面，看出羌族视荞麦为本民族谷神，从而存有对其偏爱的心理。”这故事及编者的话，显示了荞麦在北川羌族认同下有特殊意义。或许正寿也是在这样的民族认同与文化情境下，亲手为我做荞麦馍馍。

2000年我再度到小坝内外沟，正寿此时工作较忙，但他还是抽空到老家陪了我几天。记得有一天，正寿的哥哥买了新鲜猪排骨，他问我爱怎么吃。我看到屋前数百上千个大小萝卜堆起半个人高，个个半青半白看来十分可口。我说拣几个萝卜炖排骨罢。正寿的家人听了都笑，说那些萝卜是用来喂猪的。那天我还是吃到了萝卜排骨汤，果不出我所料，那“猪吃的萝卜”可是我吃过最好的。正寿的哥哥是个十分能干的人，除了种田外，



内外沟农家的三代家人。北川乡间百姓的日常穿着已无“少数民族特色”

他在屋边田边还种些核桃、银杏，以及一些我识不得的中药植物。院子一角还放了几筒蜂，家里年年有吃不完的蜂蜜。夏天他还经常到外地打工，赚些现金。有一天，我们在院子里的树下喝茶聊天，他与几个邻人打趣说着有一年他们结伴出去打工的事。那是在甘肃挖矿，最后老板跑了，他们没领到工钱，身上盘缠也用尽。于是他们由甘肃走回来，一路上专从山区走，在山里捡野菜野果填肚子。

2001年我打北川过，特别去看望正寿、泽元，当时正寿已到县委工作，泽元也当上了北川民族宗教事务所局局长。这年，我从正寿口中又听得有关“荞麦”的讯息。他说，他们单位组织一个大型会议，许多“长官”来到北川，他负责后勤支援。正寿得意地告诉我，一天他安排大家在“农家乐”享用以荞麦为主食的餐宴，“长官”们都十分满意，大家对这正宗的“绿色食品”赞不绝口。后来几年，我在北川、松潘、成都，发现将荞麦视为“绿色食品”或“养生食品”的人愈来愈多。没有人因恐



董家二哥自己做的蜂筒

怕被当作“蛮子”而忌吃荞麦，大部分人都以荞麦为本地羌族特色食品为荣，更有少部分人需担忧自己饮食过度的身子而将荞麦视为“养生绿色食品”。这样的时代社会变化，无需深奥的社会变迁理论，便表现在人们对“吃荞麦”这回事的观感上。



青片上五寨的农田。作物看来油绿茂盛，但背后潜藏着时旱时涝的恶劣环境，使得上五寨成为边缘的边缘



白草河、青片河一带山区农家常在屋前植竹及棋盘花为篱，颇为脱俗

白马将军与走马将军

在小坝乡，我到处听得老人们说白马将军与走马将军的故事。我花了好一段时间，仍弄不清楚白马将军、走马将军是同一个人，或是两个不同的人。

小坝乡的山上有一座庙，旧县志上称它是白马庙，但现在有人说那是“走马庙”。按地方文献及朝廷文书记载，明代本地青片河、白草河流域的“白草羌”叛乱，朝廷派著名的将领何卿率军前来征伐。在这战役中，何卿的军队严惩参与起事的土著村寨，一路摧毁他们的碉楼、房屋。最后在走马岭，朝廷军队彻底消灭白草羌的余党，杀了他们的首领白石、李保与黑煞等人。青片、白草土著被平服后，本地汉人从此安居乐业，因此何卿成为当地汉人心目中的英雄。何卿离开北川后，1538年，本地汉人在坝底堡为他盖了个“何公生祠”，里面有何卿的塑像，让大家可以朝夕瞻仰。后来，由于“番羌”受歧视，所以自称汉人并感激何卿的人愈来愈多，何卿庙也出现了好几个。为了纪念那一场伟大战役，其中一个何卿庙就盖在小坝乡的走马岭上。这庙又称做“走马庙”或“白马庙”。

明代白草羌的大本营在今日北川的片口乡，也称白草坝。那一年离开内外沟后，正寿领着泽元与我翻越一座小山，东岳庙梁子，往白草河上游的白草坝去作采访。在山径上偶然路过三两农户，皆以竹林或棋盘花作篱，虽敝扉破牖然亦十分脱俗。越过山脊后，我们一路曝晒在烈阳下。走了五个小时的山路，正当暑热难当、喉干舌燥时，我们抵达一瓜田。田主人笑面迎来，说是今年的瓜这两天刚熟，还未上市。说毕便下田选了三颗西瓜，刀剖开来绿皮红肉瓜香四溢，我们三人捧着瓜直呼痛快。

在片口，我们听得更多关于何卿以及白草羌的故事，与我在文献中读来的略有不同。人们说，何卿常骑着白马，所以被称为“白马将军”。走马将军则是青片、白草四十八寨的总统领，或说是两兄妹。他们率领羌兵去抢盐，与官兵发生冲突，最后败退困守于走马岭。官兵原攻不上来，人们说是



白草河上游是明清时期白草羌的大本营

有一个王家的人替官兵带路，使得羌兵被击溃，走马将军战死。后来每年他遇难那天，六月二十三，冉家杀牛，秦家穿盔甲跳舞，王家要拉三犁地来赎罪。另一个说法是，走马岭原称“宝华石”，后来因庙里的两头石马晚上会出来行走，吃老百姓的庄稼，所以那庙便称走马庙，地名也称走马岭。

走马庙中受祭的究竟是白马将军何卿，还是羌族头领走马将军？老百姓的说法很不一致。一说是，庙中的塑像原是白马将军何卿，庙中碑文也称这是纪念何卿的庙，但本地百姓怀念被官兵杀害的羌人头领“走马将军”，所以故意将神像塑得有些像走马将军。另一说是，小坝乡的庙是走马庙，祭的便是战死的羌族头领；白马将军是残害羌族的刽子手，本地人不可能祭奉他。但有些老年人说，他们从小就只知道这是何卿的庙，他们拜何卿，因为他们祖上便是汉人。这些年来当大家都变成了羌族，这庙究竟祭的是谁才开始有了争议。

汉番边界

我在片口听得一个故事。当时羌人战败了，白马将军就跟羌人重划地界。何卿在治城指着一个石碑对本地人说，我们就以这个碑来当界线。碑以上是羌人的地方，以下是汉人的地方。明天早晨鸡叫之前，碑在哪里，界线就在哪里。那碑约有三百多斤重，羌人认为这下子界线在治城，可以安心了。但何卿当晚就请一个大力士将石碑背起，要他在鸡叫之前能往上游走多远便走多远。于是，石碑被移到了片口上面的垭口。所以，片口以下都成了汉地。

另外，我从北川人编的地方文献上读到一个“刘自元移碑”的故事。据说清朝时，北川的汉番界碑原来在白草河下游距治城只有四十五里的大鱼口。当时有一个白草番民刘自元，从小就好读圣贤书，爱慕华夏文化。他为了参加科举考试，努力习经学诗赋，终于通过了乡试。当时只有汉民可以参加县里的考试。所以当他参加县试时，有人向主考官检举，说刘某是“番民”不得应考。刘自元辩称，自己是归化之民，居住在汉人地界内，并说有碑为证。主考官就与他相约一起去勘界。在半途过夜时，刘自元趁着夜晚赶往大鱼口，将汉番界碑背起，连夜移到北川与松潘交界的崇山峻岭之中。第二天，主考官见界碑还远在上游地方，就许他参加考试了。

在这两则故事中，石碑皆是汉、番的界碑，然而故事中“石碑被迁移，番地成了汉地”，则隐喻着白草羌被打败后本地的族群认同变化。治城位于白草河汇入湍江处，原来治城以北，也就是整个白草河流域，都是羌人村落分布的地方。但明代以后，白草河由上游的片口，到中游的小坝、开平乃至下游，各地村落居民都深度汉化了。以上两则故事中发生在一夜间的“边界迁移”，事实上是一二百年本地族群认同与文化变迁的浓缩版本。有趣的是，在第一个故事中，造成边界变迁的是汉人边官何卿的狡猾。第二个故事，却是羌民刘自元以狡猾手段让自己成为汉民。这故事的另一个隐喻则是，读书应考也是进入汉界、成为汉人的手段之一。

胡耀邦赠送的藏袍

白草河上游是片口，更往西，青片河的最上游则是青片上五寨。过去在白草河流域的村寨居民看来，青片河流域的人都是“蛮子”。然而在青片河流域，仍是“一截骂一截”。譬如，青片河下游坝底堡有最早建立的何卿庙，自然过去当地祭拜何卿的人都自称汉人。他们歧视上游的“蛮子”，同时自己也被下游人群辱骂为“蛮子”。到了青片上五寨，上游再也没有村寨人群可让他们骂了，所以只好承认本地人是“蛮子”，或说“蛮子”还远在西北方的松潘。



白草河上游的羌族农家及山田



青片河上游的农家，房屋仍为汉式

泽元便是青片上五寨人。1996年初的冬季，我与毛老师、泽元一同造访青片。由地方文献资料得知，1950年代初许多青片居民被识别为藏族，另有少部分人成为羌族——他们是最早成为少数民族的北川人。为何当年大多数青片人成为藏族，而非羌族？这是因为，在过去他们被认为是最西北角、最上游的“蛮子”，但青片人认为真正的“蛮子”在翻过几座大山那头的松潘；当时松潘各非汉族群早已被识别为“藏族”，所以青片村落居民也成为“藏族”了。

我们到了青片乡上，由于往上五寨的山道凌冰，车行十分危险，所以我们只得在乡上访问。乡上有许多由上五寨迁来的人，泽元是本地人又是民宗教事务局干部，所以很快便找来几位老先生与我们摆谈。有王姓老人兄弟俩，他们说，王家是由茂县较场那的杨柳沟迁来。当年一伙人到这儿



就是在这样沿溪河的山谷中，过去每个地方的人都自称“汉人”，并辱骂上游村落的人为“蛮子”

打猎，掏烟时从烟袋中落下了些青稞种。第二年再来此打猎，发现去年落下的青稞种子长得比老家的还要好，于是便相约迁来此地。初迁来时没有姓，后来跟着本地汉族分成四大姓，王姓是其中之一。杨柳沟的村寨民众过去被称作“杨柳羌”，因此根据此家族史记忆，这王姓家族应是羌族。但在我们的摆谈中，两兄弟中的大哥口口声声称“我们藏族”，这便是前面说的，当初大多数的上五寨人都认为自己是藏族。

解放之初，胡耀邦曾在四川召开一个各民族会议。当年这王姓老人，两兄弟中的大哥，便以藏族村长身份参加了此会议。他最得意的是，在会议中胡耀邦还送了他一件藏袍。他说，胡耀邦对大家宣布，从此以后不会再有民族歧视。于是他穿起那藏袍，带着兴奋又有几分疑虑地走回去，七天七夜，一路上被别人骂“蛮子”。以下是他回忆此事的一段话：

那时胡耀邦年轻个子不高。几千人开会。就餐时，回族一个食堂，我们跟汉族在一起。他跟大家干杯，他走到我们藏族这一桌，我们敬他的他不喝，他给我们一家敬一杯酒。就这个，贯彻

民族政策。他给我们发了藏族衣服。回去走了七天，衣穿起来一直走路，路上的人有的说阿罗来了，有的说蛮子来了，大人、小孩都在吼。回来过后，把任务分了……就这样才把它划过来，才逐步逐步大家对共产党信任。以前一出去，他们就说蛮子来了，我们就跟他们打架，我们还忌讳吃馒头。

这段话，说明了过去青片人所受的歧视，以及本地族群关系逐渐改善的转捩点。虽然不是一场会议、一个宣告便可以改变一切，但那的确是一个重要的变化象征。

后来，我常思考那件藏袍的意义。许多西方学者常批评近代中国（包括1950年代以前的中华民国及此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政治力创造“中华民族”，以及其内的各个少数民族。五十年前，这位“藏族村长”穿上胡耀邦赠送的藏袍，的确象征着他的藏族身份来自于政治威权的授予。然而这样的身份，以及此后他们逐渐脱离“蛮子”之讥，相对于过去而言都是一种进步、改善。成为“少数民族”不但不会受辱，甚至有些现实利益，因此从1980年代开始，青片上五寨以下各沟、各村都“一截攀一截”地陆续成为羌族。

那件藏袍的另一意义是，它代表着1950年代刚进行民族识别时本地的少数民族认同，它与1980年代北川羌族认同蓬勃发展后的民族现况有相当落差。一件胡耀邦赠送的藏袍，将两位老兄弟的民族认同由1950年代封存至今，以至于现在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在访谈中，那两位老者不断地说“我们藏族……我们藏族”。泽元听了直皱眉头。访谈结束出了王家的门，泽元抱怨着：“跟他们说了好多次了，他们是羌族不是藏族，他们就是记不到！”本地的青片羌、白草羌记忆，以及羌族的悠久历史，都使得1980年代以来本地知识分子热衷于对乡间百姓倡导羌族认同。更重要的，



青片乡上



青片老人与王泽元



青片河上游的小寨子沟自然生态好，目前是熊猫保护区

茂县等地村寨民众早已成为羌族，并在许多方面得到民族政策上的优惠；这对于邻近茂县并与该地羌族有密切祖源、文化关系的青片河流域居民来说，也是让他们愿成为羌族的强烈诱因。1953年羌族只有五十九人，占北川总人口的0.07%。1982年羌族人口增至约两千人，几乎都在青片，因此这儿成立“青片藏族羌族乡”，这是北川第一个被官方认定的羌族社群。从1984年到1987年，由上游及于下游，各地羌族乡纷纷成立。1987年北川羌族已约占当地总人口的35%，2000年时更增至48%。

2003年夏季，北川申请成立羌族自治县得到国务院批准。北川藏族，以及那藏袍所代表的“过去”，此时更容易被人们遗忘了。



青片上五寨的农家及玉麦（玉蜀黍）田。玉麦过去是山区民众的主粮，目前大都只用来喂猪

禹里羌乡

1996年的那个冬天，离开青片后我们到了治城。治城原是县城所在，后来新县城移到东边的曲山镇。下午，泽元领着我们到附近山上看石纽、甘泉，都是和大禹有关的自然遗迹。第二天早晨，泽元又安排我们到禹穴沟参观。

这是一条小得不宜人居的小山沟。进入沟中不久，山壁上便有“禹穴”两个大字，听说这是李白手书。沟里有关大禹的遗迹很多。据本地人



越过白草河的吊桥



禹里乡禹穴沟中的禹母神像

告诉我，有剖儿坪，这是禹母生大禹的地方，山包包上一个人坐过的屁股痕迹都还在。有洗儿池，禹母生下大禹后，下到这儿来洗掉婴儿身上的血污，所以这儿的水终年都呈微红色。采药亭，这是大禹小时候随禹母采药歇息的地方。望崇山，这是大禹之父鲧治水久久不归，禹母每天登上去望夫归的地方。外地人听来，或觉得这些说法十分荒谬，但北川人仍对此津津乐道，因为这与北川人的地方认同有关。下午泽元又领着我们参观治城的大禹纪念馆。至此可以说，我在治城的参访活动一直逃不出大禹的手掌心。

事实上，北川人的生活中处处可见大禹的影子。无论在治城或曲山，城镇中以大禹为名的店招、商标、广告比比皆是，如大禹宾馆、神禹电



北川治城、曲山都有禹王宫



震灾前北川县城所在的曲山镇到处都有以“禹”为名的商店与企业商标，可见大禹记忆在此的重要性

力、禹里花茶、禹乡饭店等等。1980年代至1990年代，北川县政府与民族宗教事务局为了宣扬本地羌族文化，鼓舞羌族认同，出版了许多书籍，其中若干本与大禹有关，如《大禹史料汇集》。

为何北川的羌族会与古圣人大禹有关？这是因为，自战国末以来，汉文献中便有“禹兴于西羌”的记载，其意是指大禹出生在极西之地。到了汉代，住在帝国疆域最西边的蜀郡之人便认为大禹出生在蜀郡，且是出生在蜀郡最西方的边缘，大约是今日北川、平武一带——这是借着大禹出生于此，来强调蜀郡及蜀人的华夏性。至少从宋代以来，移居北川的汉人官员、士大夫也乐于述说本地是“禹兴之地”，并在治城附近修禹庙，以摆脱本地的边远蛮荒性。由清代到民国时期，北川的禹庙愈修愈多。除了治城外，北川边缘的片口、擂谷、通口等地也出现了大禹庙。而且，有些禹庙也是湖广会馆，如此在本地禹庙的象征意义就十分明显了——它是边缘汉人强化汉人认同的符号。当北川山间村落居民受不了“蛮子”之讥而纷纷自称“汉人”时，他们自称祖上在“湖广填四川”时来到本地，于是便



北川旧县城治城的老街



小坝乡内外沟农家庭院中大伙儿摆条、冲壳子（吹牛）。震后照片中的景物、人事皆已全非

如何卿庙一样，湖广会馆、禹庙及大禹信仰逐渐往边远山区扩张。

1980年代以来，当许多北川汉人成为羌族之后，他们仍强调本地是禹兴之地，甚至认为大禹也是羌族。因为华夏古文献中“禹生于西羌”、“禹西夷之人”这样的历史记忆原来便指大禹出生于华夏边缘，这使得大

禹具有双重历史隐喻：华夏圣贤，以及华夏边缘人。两千年来，华夏边缘之人借着“华夏圣贤大禹”来宣称自身为汉人。现在，居于中国边缘的少数民族（许多过去是边缘汉人）则借着“华夏边人大禹”来强调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因此北川人称本地为“禹里羌乡”，这样的地方认同显示，汉与非汉少数民族之间的分野原是十分模糊的。

2001至2003那几年，泽元、正寿等北川朋友格外的忙。特别是当时任民族宗教事务局长的泽元，经常到成都、北京为北川成立羌族自治县的事奔走。2003年夏季，北川羌族自治县终得到国务院的批准。然而就在那之前的一两周，泽元因车祸而整个下半身瘫痪。那年秋天，我到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看他，见到老友的痛苦、沮丧，心中十分不忍。

我们再见面时，竟然已是2008年10月，在绵阳的一栋老旧公寓中。此时，汶川大地震灾后已五个月，北川成为众所关注的重灾区。许多人问道：为何北川是“唯一的羌族自治县”？为何北川人十分重视大禹纪念馆的重建？而此时，北川羌族自治县及禹里羌乡的重要催生者泽元，坐在莲花池批发商场背后的一间小公寓中，对我述说他如何从大地震中逃过一劫。当时他在北川县城的住所中，地震发生时他所住的楼房未倒，但他在轮椅上无法脱逃，两天后才被救出来。他被置于路旁，眼见周遭都是死难、重伤者以及忙碌的救难者，他不忍呼救，过了一天多，他感觉自己快撑不住了，才请求别人将他后送。谈起正寿，泽元苦笑着说：老天开玩笑，让我这肢体不全的人留下，却叫正寿走了。我不知该如何说。想到当年正寿为我做荞麦馍馍的往事，想到我们在片口瓜田中吃西瓜的往事，我心里默念着：老友，一路好走。

茂县



森林边上扎营生火（埃期沟）

周老师与毛老师

1996年2月离开北川后，我到茂县与几位羌族朋友会合，一同到永和沟。永和沟是我的田野重点之一。在羌族地区到处走了两三年后，我以松潘埃期沟作为较“藏化”的田野点，北川小坝乡内外沟为较“汉化”的田野点，而茂县永和沟居于两者之间。威州师范学校的周老师是茂县永和沟人，毛老师则是松潘埃期沟人。他们俩是对我的田野工作帮助最大的羌族朋友，可以说，若没有他们的帮忙，我可能无法完成这些研究。

周老师有个极特殊的人格特质，也就是这特质使得他常能为我解决问题，但也经常让我及其他同行的朋友恼火。这特质便是，他喜欢跟人“摆条”（闲聊），一摆就不肯停，因此他的朋友多，而且到处都有。那几年，我每要到一个没去过的地方，就问周老师在那儿有没有熟人，他都是说没问题，熟人多得很。到了那些地方，果然他到处都是熟人，这对我的田野考察有极大的便利。然而我要担心的倒是，他的熟人太多，到处要停下来“摆”。陪着他走一条不到百米的街，经常要花上两个小时。或者半天找不着他，后来他出现了，只轻描淡写地解释，“遇到几个熟人”。

这都是我熟悉的了。但有一回，周老师仍让我刮目相看。那一次，我们在茂县与松潘交界的地方由一个寨子下来，天色已晚。走了一段路，找不到车，来到一个陌生荒凉的地方。此时，周老师对我说：“你记不记得两年前我们有一次在车上，我跟一个不认得的人在摆。”我不知道此时他说这些做啥，况且，我经常看他与不认得的人“摆”，怎会记得两年前这样的事。他接着说：“我跟一个人摆，后来他下车，就是在这儿下车的。他下车的时候还跟我们说，来耍。”我满腹狐疑，周老师已往附近山上找人去了。等了约莫一小时，周老师与一个中年人热络地相互搂着从山上下来。当晚，我们就住在周老师这两年前的“老朋友”家。

还有一次，他也让我佩服不已。那是1998年夏季，他送我到黑水作调查。他自己还有事需回汶川，与我约好三天后回黑水。他才出发，便连降了半天的滂沱大雨，我心想这下周老师可能到不了汶川。三天后，果然不见他的踪影，到了第六天他才回来。他说，那天他坐的班车遇上几道泥石流，车被困在中间，无法前行也无法后退。困了十多个小时后，周老师决定冒险越过泥石流。十几位大胆的乘客跟着他走。周老师靠着他人头熟，到处动员村寨老百姓帮忙挖泥石流，结果他们一路越过五个泥石流路段才到达茂县。

周老师阅历足、知识丰富，毛老师带着戏谑地说他是：“天上的事知道一半，地上的事全知道。”我们在访问时，最受主人家欢迎的经常是他，家里有养蜂的，他可以教人家如何取蜂王乳，家里种苹果、花椒的，他能教人家如何剪枝改种。后来几年，当电视逐渐在村寨中普及时，主人家电视的锅盖（碟形天线）只要经周老师微调一下，电视影像就能清晰许



周老师（左三）、毛老师（右三）与朋友们



骑马入埃期沟的周老师

多。他又爱摄像，经常背着像机、摄像机到处为乡里亲友的婚礼及各种庆典摄录影像。我们一道攀山上寨子时，他都背着摄像机，这也让他在村寨里十分受欢迎。

毛老师从小生长于偏远的松潘小姓沟，无论在自然或人文方面他的本土知识均十分丰富。每到一条沟，他到处指着田里的作物，地上的花草、菌菇，告诉我它们的羌语及汉语名字，以及植物特性、用途等等。他又特别有语言天赋，因生长于挨着热务藏族的小姓沟，以及长期在松潘工作，所以他能讲几种当地不同的藏语。对于羌语，他更称得是专家了。他不但通晓各地羌语方言变化，更能深究它们间的语言学差异及其意义。

羌语，是一个语言学上的概念范畴，事实上各地各沟的“羌语”——本地人以汉话称“乡谈”——相当多元分歧，各地羌族难以用“乡谈”彼此沟通。因此，出了村寨，“汉话”（四川话）成了人们使用最普遍的语

言。从1980年代末开始，四川省民族委员会语言办公室曾推动一个标准羌语文计划。召集一些知识水平较高的地方老师、干部，授予他们记音与基本语言学知识，然后要他们下乡考察、记录各地羌语，最后商议并选择一个最地道的地方方言作为标准羌语，在各地羌族中推广施行。毛老师、周老师，以及泽元、树全、文发等人，都是这计划中的成员。我十分幸运，1990年代中期一到羌族地区便认得了这帮热心羌族语言文化的羌族朋友。在那约十年的日子里，对我来说，他们并非人类学家所称的“报导人”或“协助田野工作者”，我们一同爬山访寨子，一起工作。他们每个人都对本地文化有些特殊的关怀与兴趣。毛老师最大的兴趣是在语言方面，因此他也是这些朋友中语言学知识与记音基础最好的一个。

毛老师是极风趣的人，尤其是当他和周老师在一起时两个人经常相互打趣，使得原本十分艰辛的登山路途成为愉悦的旅程。



埃期高山草原夜间常常只有四五摄氏度，需生火取暖过夜

老童与寨子里的酒

1996年冬，我与周老师、毛老师，以及树全等人一同到永和沟。在永和沟，我们住在河坝村垮博寨的老童家。老童是周老师的老友，我们相识时他与周老师都年约五十，比我大个四五岁。老童十分精干，我常觉得，他可以代表中国改革开放后得以发挥个人能力的“农村个体户”。他除了种苹果、花椒外，又弄了一部车沟内沟外载人载货。由于他的儿子、女



1996年一般四轮的车还无法到永和沟内，只能乘这种三轮的摩托车进沟



老童的妻子，绣花围腰的手艺极佳



老革命与新农村个体户



过年前几天在老童家做客

婿都住在家里，所以他的房子特别大。童家大院建在一大片平地上，这儿当地人称“童家坝子”。童家还有一特色是，柴房内及屋外柴火堆积得特别多，屋内挂着的猪膘也多。过去典型的羌族农村富户便是如此，除了柴火、猪膘、酒储存得多些之外，并无其它奢侈享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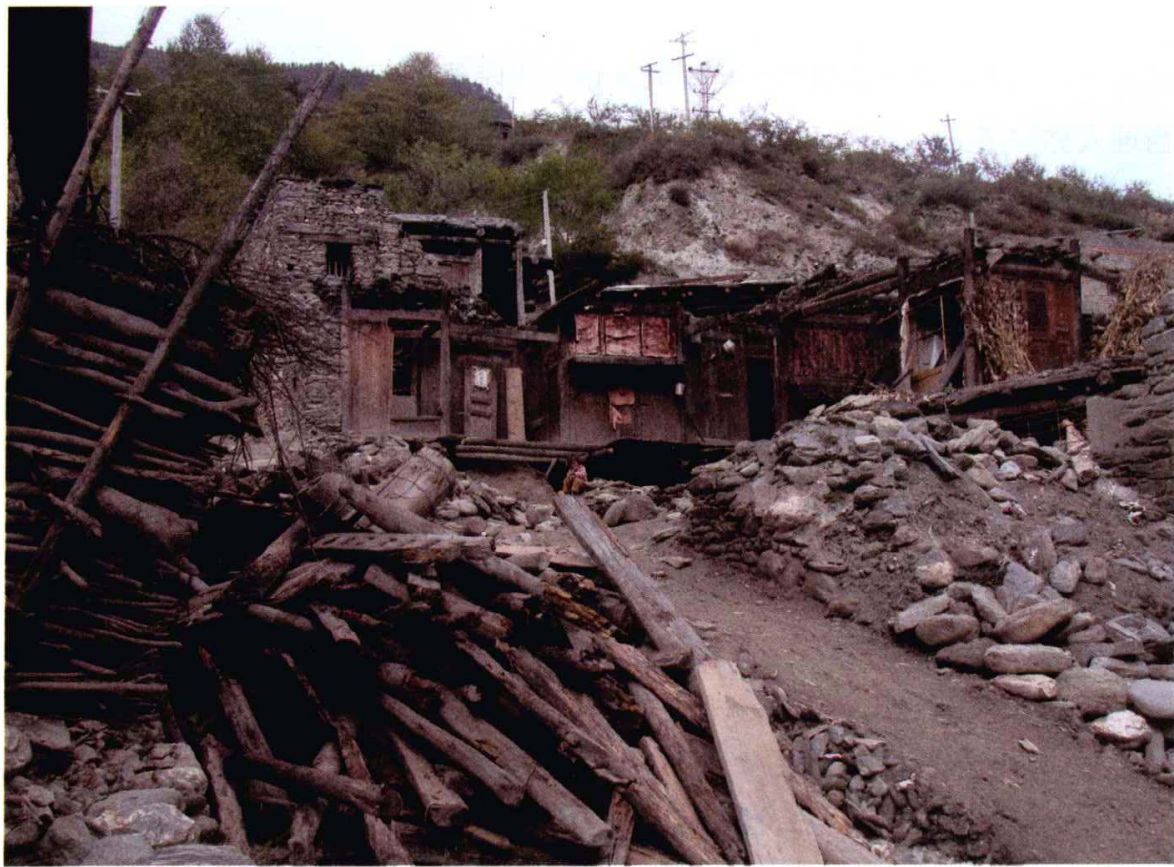
那一晚，老童找了一个年轻酒师傅陪我们喝酒。酒师傅带来自家烧的上好白酒。喝到午夜时分，我们四五个人都醉得不像话，那酒师傅却毫无醉意。我们问他有多大酒量。这九岁起便在酒坊里学制酒的师傅答道：

“我只知喝饱，不知喝醉。”我们只好都甘拜下风。在老童家，我们可以喝到最好的酒，吃到最好的腊肉。后来几年，我又去了永和沟三四趟，有时只为了想喝童家的酒。

在永和沟我得出一个结论：村寨里最好的酒就是本地酒师傅酿的酒。羌族亲朋好友间常以“瓶瓶酒”相互馈赠，所谓“瓶瓶酒”便是酒厂生产装在玻璃瓶中的酒。这种有品牌的酒，在本地杂货铺中较多的是一斤装约二三十或最多五六十元一瓶的那些。然而村寨中自酿的白酒只卖三四元钱

一斤（1990年代的价格），因此许多人家都将“瓶瓶酒”留着招待客人。后来，每当主人要开“瓶瓶酒”招待我时，我都急着制止，并厚着脸要求喝本地白酒。当然，主人也非常高兴，因为每个地方的羌族人都认为本地的酒最好。

那一年老童家娶媳妇，在早几个月前老童便拉一千斤粮食到酒坊，办喜事拉回来约五六百斤的酒以飧亲朋贺客。寨子里的酒，过去都是以自然酒曲酿造；听说，在羌族地区这种酒曲仅只理县某些有“臭草草”的寨子能制造，后来，有些寨子里的酒师傅也用化学酒曲来酿酒，因为这样能多酿出两三成的酒。2000年以后，粮食价格逐年增高，外头酒厂出品的大坛酒低价销售，各个寨子里的小酒坊逐渐消失。



震后的河坝村（永和沟）



倒屋间夹着顶顶帐篷，这是灾区普遍景象 在灾后搭建的塑料棚内见到老童

最近一次与老童喝酒，是在汶川地震之后的2008年10月。我趁着到川西作研究之便，走了永和沟一趟。我先在汶川住了一晚，第二天与周老师往永和沟去。震后塌坏的路尚未恢复，我们约花了三个小时才抵达童家。老童顶着一头蓬松的花白乱发，一面招呼我们，一面指挥家人在震毁的房子废墟中清理地基。他说，真对不住，这下子，上面限时要把屋子地基清出来，县里人照了像才能得到重建补助。老童领我们看“童家坝子”上的主屋，未倒塌，但到处都是裂墙斜柱。他说，你看这屋子多结实，但震成这样子，住不能住，拆也难得拆。老童要留我们吃饭。我说，不麻烦吃午饭了，我们坐坐就走，晚上成都还有事。老童板起脸来说，哪儿的话，已喊人杀鸡了，无论如何吃了中饭才能走。所以，那天中午，我们坐在童家临时搭盖的帐篷里，吃着烹煮得还不够扒软的鸡肉，只有那酒以及主人家与酒一样醇厚的待客热忱没有变。

永和河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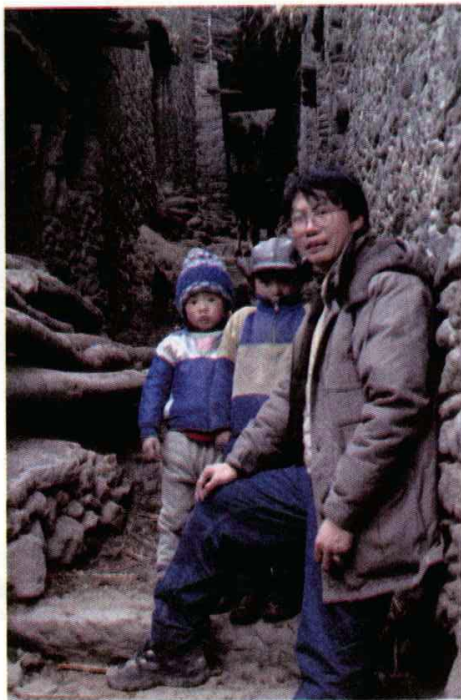
永和沟河坝三村，指的是永和村的两个组，一组“垮伯”与二组上寨“瓦达”、二组下寨“嘎劳”。河坝三村的人都说是从“渡基”来的。他们说，渡基那儿闹猩猩，白天人们耕地种作物，它们就躲着看。晚上猩猩就来学着耕地，把地都耙乱。人在山上遇上它，它就抓住人的手不放，还仰着头咧着嘴笑，到了晚上就要把人吃了。所以过去上山做事的人都要在



高山上的勒窝寨（永和沟）



永和沟羌族家中经常养着几头羊，放羊一般是老年人干的活



两位小向导领着我上勒窝寨

腕上戴着斑竹筒筒，当猩猩的手握在竹筒上时，人们可以把自己的手抽回来，赶紧逃跑。后来人斗不过猩猩，于是翻过真阔梁子到这儿来。永和人说，过去孩子都不会说话，过真阔梁子时孩子听到老鸦叫就学老鸦叫，听到狗叫就学狗叫，就这样会说话了。羌语叫“辜”或“斯辜”的动物，听他们说像人一样，但比人高大，全身是毛。他们用汉话称这是猩猩。每个地方的羌族民众对它们的描述都一样，说它们逮到人就仰头笑，听起来像是猩猩或猿类常有的翻上唇的表情。由此看来，这儿可能真的有某种大型的猿科动物。小姓沟的老人说，他们小时候有人将打死的猩猩拖到松潘街上，很多人都看到过。

永和河坝的村民还说，他们的祖先从渡基过来时是三个兄弟。来到这儿后，三兄弟分家。一位八十多岁的一组老人告诉我，这三兄弟分一头牛，分到牛头的老大到二组上寨那地方建寨子，分到牛身子的老二建立二组下寨，老三分到牛尾巴并到一组去建寨子。后来，我年年到永和村，问起这三兄弟故事，总从村民那儿得到些不同的说法。有人告诉我，得到牛



冬天马在田里寻些干禾秆吃（甘木若寨）

头的兄弟到了二组上寨，得牛身子的兄弟到一组去，得到牛尾巴的兄弟到了四组，也就是勒窝寨，或说到了三组甘木若寨。或说，还有一位兄弟，分得牛皮的第四位兄弟，到“道材主”去建寨子。这是最邻近永和村的另一个村子，也是周老师的家乡。

后来，我在其他羌族沟中也听过类似的“弟兄祖先故事”。同样的，分家时有人分到牛头，有人分到牛尾巴，或说有人分到金盔甲，有人分到银盔甲。同样的，在地方上人们对此各有各的说法。事实上，所有的“历史”似乎也都是如此。“历史”常被人们用来强调谁分得（或争得、抢得）好家产、好地盘，人们也永远会争论“历史”。

周老师的爱人，白大姐，也是永和沟人。娘家在甘木若寨，在永和河坝村对面的山上。1998年的除夕及1999年新年，我在甘木若寨白大姐的哥哥家做客。甘木若只有两个寨子，大寨子与小寨子，有白、谢、李、徐四姓人家。一个小寨子李家的人告诉我，这儿的谢、李、徐三姓人家都是湖

广填四川那时候来的。当时四川人烟稀少，所以这三姓人便从湖广移来。走到大午都，那儿天干，连着三年鸡都喂不成。而且在那儿他们受一个麻儿寨头人欺侮，所以大家就到外面去找地。到了这儿，撒下青稞种子，第二年来看，发现青稞长得很好。后来他们再受到麻儿寨头人欺侮时，就背起枪躲在林子里，一枪毙了那头人，然后大家结伙到这儿来开荒定居。白家来得较晚，说是由松坪沟迁来。



甘木若寨俯瞰永和沟



甘木若寨石砌的村寨房屋



大人小孩一起坐在干草堆上晒太阳、摆条



永和沟河坝村村民在冬阳下聊天、绣鞋、逗孩子玩

大年初一，我与白大哥一同出门拜年。早晨十点多，太阳已照暖了大地。在一个高过人头的草料堆边，十多位村民在草堆上坐着、躺着，一边嗑着瓜子，一边晒太阳闲聊。我也跟大伙儿一起坐在草堆上，听他们话家常。门外堆着柴火，屋内挂着猪膘，一家饱暖便得到保障。再有些饭前饭后酒，闲时得与邻人围聚晒太阳、摆条，这便是山间村寨百姓的神仙生活。

毒药猫

村寨生活也不是那样的怡然舒适。毕竟这是高海拔山区，气候变化无常，田里的收成极不稳定，因此村寨百姓还得到高山上去放牧、挖药、捡柴来补贴家计，这使得生活中的意外与危险更多。由于资源竞争过于激烈，各个村寨间彼此打得很凶，所以过去村寨民众对外界十分畏惧。然而最让他们恐惧的倒不是这些外在的灾祸与敌人，而是内在的“毒药猫”，最初几年这让我有些困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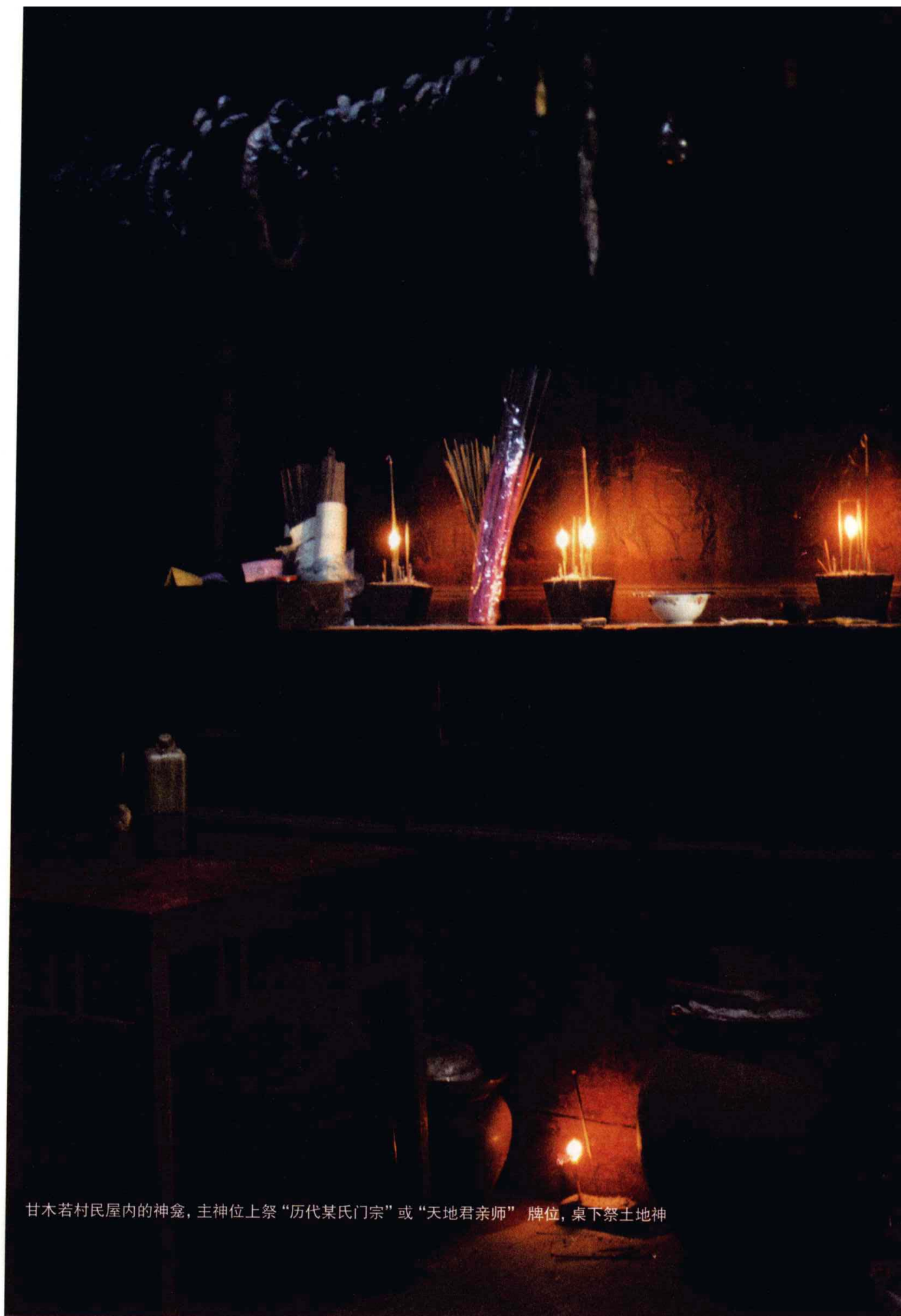
一个羌族寨子经常又分成两个寨，或称大寨子、小寨子，或称上寨、下寨。这是由甘木若大寨子远望小寨子；小寨子上方的树林便是永不得砍伐的神树林



永和沟的一对老夫妇坐在铁三脚前烤火取暖。铁三脚代表三种神，天神、祖先神与媳妇神，因此置铁三脚的地方是羌族屋内神圣的区域

在永和河坝三村，在甘木若，以及其他羌族深沟村寨中，我都常听人们说“毒药猫”的事。深山村寨里的老百姓，若非十分必要，晚上都不太出门，听多了有关“毒药猫”的传说，大家都怕遇上毒药猫。我最早听到“毒药猫”这个词是在松潘小姓的埃期村，当时我还不太注意。后来在永和河坝，一天晚上我们围坐聊天、喝酒。一个本地老人提起过去“毒药猫”闹得多凶时，同行的毛老师、周老师，以及来自茂县赤不苏的树全，都纷纷谈起他们家乡毒药猫的事。那天晚上便成了毒药猫之夜。

根据他们的说法，毒药猫是一种有毒、有巫术的人，通常是女人。她们就在寨子里，白天与一般人无异，但到了晚上就会变成各种动物，外出害人、吃人。毒药猫女人有个小口袋，藏在火塘上铁三脚的下面。铁三脚，是一个有三支脚架起的圆铁框，放在火塘上，上面可以放个锅炒菜，



甘木若村民屋内的神龛，主神位上祭“历代某氏门宗”或“天地君亲师”牌位，桌下祭土地神

放个壶烧水。在羌族屋里，铁三脚是个神圣的东西，它代表家里的火神或灶神。毒药猫女人将她的魔袋藏在铁三脚下，所以有的羌族老人说，毒药猫和家里的灶神是勾在一起的。毒药猫的口袋里装着各种动物的毛，到了晚上，她把手伸到口袋里去，摸到什么毛就变成什么动物。一般我听说的都是变成牛或马，把走夜路的人吓得摔下悬崖。人们又说，毒药猫女人格外漂亮，尤其是她的一双眼睛飘呀飘的，特别勾引人。

还有一种说法是，村寨里的某个毒药猫老婆婆，有人到她家里，她端食物来招待客人时，将有毒的指甲浸在盘碗边的汤里，人们吃了就会胀肚子死掉。更夸张的传说是，晚上毒药猫会成群聚在一起宴乐、吃人肉，她们轮流做东，轮到的人就要把自己的丈夫或儿子拿来让大家吃掉。一个寨子中，哪个女人是毒药猫，似乎大家心里都有数，但我从来打听不出来。因为说哪个女人是毒药猫，这是很严重的事——让人夫妻失和，女儿嫁不出去，甚至跳河——所以大家都不愿说也不敢说。



山坡上的甘木若寨，一出家门便是前一户人家的屋顶，羌族村寨聚落通常如此

女人会成为毒药猫，听说是由于母亲遗传，她母亲还要从小教她法术。刚学会走路或刚会说话时，她母亲就要偷偷地教她。趁着没人的时候，把火笼烧起来，做馍馍的大铁盘搁在上面，把小女孩与动物的毛都放在盘上面，要她打滚然后变各种动物。由于相信毒药猫会遗传，所以若母亲被村子里的人怀疑是毒药猫，那么她女儿在本地附近就很难嫁得出去。

毒药猫母女关系深，但婆婆却无法将毒药猫法术传给媳妇。不但如此，在许多毒药猫故事中婆媳都是对立的，如下面这一则。一个妇人有一天晚上无意间发现她婆婆是个毒药猫。她吓得躲进厨房的面柜子里，却不知面柜子是毒药猫的乘骑。她婆婆变的毒药猫骑上面柜子，飞到一片森林中。各地来的毒药猫都聚在那儿，跳舞、宴乐、赌博。那婆婆赌输了，要赔偿。那婆婆对其他毒药猫说：“既然赌输了，我明天就把我儿子抓来给大家吃罢。明天，我到田里去给他送饭时，我要背牛草去，当他喂牛吃草时，我就钻到牛肚子里，牛眼睛就会红，就会用角把他触死。”媳妇躲在面柜子里听到这话，吓得要命。天亮前，她婆婆骑着柜子飞回来，躲在柜子里的媳妇也跟着回到家中。第二天，他们夫妻俩在田里劳作。休息时，她躲着落泪。她丈夫发现了，在他催促下，媳妇只好将婆婆是毒药猫的事说出。就在这时，婆婆给他们送饭来，并拿了牛草要她儿子去喂牛。牛吃了草，果然眼睛变红。那儿子就用力拉牛鼻索，把牛扯到崖边，将它推下崖去。牛死了后，他母亲回到家里，没进屋就死在门坎上。

黑虎沟、三龙、赤不苏一带流传一个毒药猫故事，这毒药猫，像是今日所有毒药猫的祖宗。这故事说，寨子里有个女人是毒药猫，她丈夫知道。一天晚上她从外面回来，先甩了一只人手进来，她丈夫就把那手藏起来。那毒药猫从窗子爬进来，找不到那手，又怕天亮她变不回来，只好算了。第二天这丈夫就准备一桌酒菜，把她妻子的兄弟们请来。吃到一半，他把那手臂拿出来，说，你们的姐姐是毒药猫，我不要她了，你们领回去吧。这几个兄弟就只好把姐姐带回去。他们走在半路遇到一条河，这几个

兄弟对那毒药猫说，姐姐你这么厉害，能不能将这条大河拦腰截断，让我们过河呢？那姐姐就用手对着河水向左右各推拍了三次，两头的河水就被阻隔，中间让出一条通路。他们过了河以后，兄弟们又问姐姐，你可不可以把你身上的毒在这条河中洗干净？那毒药猫说，可以，只不过我如果把毒彻底洗干净的话，那人类每天就会死三次、活三次。因此她下了河去，但没把毒完全洗掉。所以现在毒药猫还是有毒，人也每天只死一次、活一次，就是晚上睡觉、早晨起床。

一个永和沟老人对我说，男子也有毒药猫，他年轻时就遇上过。那时村上有个老头，人人都说他会变毒药猫。有一回，他与这老头一同上山打猎，晚上生堆火，两个人就睡在一个崖窝子里。晚上他怕，不敢入睡。他听说，那毒药猫若睡着了，灵魂便会出来变成动物害人。所以他一直跟那老头说话，让老头不要睡，但后来那老头还是睡着了。他一急，就把一根炭火踢到那老头的脚下，让他的脚被烧到而醒过来。结果那老头的脚被烧得焦臭，人还是没醒。那永和老人说，那时他年轻，胆子大，就硬把那老头摇起来，不让他的灵魂出去害人。那老头醒来后，才嗬嗬嗬嗬地抱着脚喊痛。



围坐在铁三脚前喝酒、摆条（永和沟）



河坝垮博寨的老人（永和沟）



包着头帕的永和沟老人，过去羌族男子都包头帕，目前已不兴如此了



坐在铁三脚前听老人说故事

多年来，我也听说过许多对付毒药猫的秘诀。最简单的，晚上出门时在口袋里揣着两个白石头，人们说，对付毒药猫只有用白石头打。还有就是，冬天晚上外出不要戴帽子压住前额印堂，人的印堂，尤其是年轻男子的印堂，会冒火花克毒药猫。一个水磨坪水若寨的老人，教了我一句制服毒药猫的口诀：“黑龙虎豹、恶龙虎豹、平地虎豹、金钱马、银钱马，躲得见，看得见，画不可许地无魂，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更难的是一个理县水塘寨中年人教我的法术：将一个古钱立在铁刀上，然后盖上筒盆浇上油烧，若钱不倒，就能破毒药猫的法术。

羌族村寨中有个谚语，“无毒不成寨”。前面那毒药猫不把毒洗干净的传说，似乎表现人世间没有“毒药猫”还不行。由此可见，毒药猫只是人们的想象与创造——创造一个内部敌人作为代罪羔羊，来化解群体内部的紧张关系，这是人类凝聚“我群”的惯用伎俩。

翻越史家山梁子

1996年冬我们离开永和沟后，要到邻近的另一条沟水磨坪去。主人老童说，为啥需要出沟口、找车、再由渭门进水磨坪？直接从我们永和这儿翻山过去就行了。周老师也说：“正是，半天就拢了！”毛老师还取笑他，“半天就拢了，这是封建时期的距离观念”。

这天我们尝到了苦头。先是，一行人登上海拔近三千米的雪山，史家山梁子，初登时太阳炽热，大家一身的行囊、大衣登山行走十分难受。翻山越梁子时，山顶附近是尺余深的积雪。主人童德成送我们到这儿，便折返回去。我们走完森林雪地，开始下山，此时更恼人的旅程才开始。上头顶着烈阳，脚下是恼人的塘灰。塘灰，指的是如火塘中烧余的灰烬那样轻



由甘木若下到永和河坝的环山险道



主人老童送我们上史家山梁子

细的一种灰土。夏天，一下大雨，塘灰便和着雨水成为泥石流滚滚而下。冬天，在干旱及极大的昼夜温差下，新的塘灰形成。每一步踩下去，整个鞋子都没入松软的灰土中。下山坡度陡，加上这样的塘灰，真个是举足艰辛，更不用说，我们每个人都弄得灰头土脸。就是如此，由山梁上下来走了三个多小时，下降约一千米。终于到了水磨坪二木若寨最上面的一户人家，此时我的腿已酸软得几乎难以站立。

这一家的主人出来招呼我们，摆上长凳子及茶水。主人及旁边几个小孩几乎都是“灰人”；不用照镜子，我们知道自己也是这模样。我仍记得的一个景象是：一个小孩在我们前面追赶一只鸡，小孩与鸡跑过的地面竟扬起如车子开过时卷起的巨大灰尘。坐在长凳子上喝茶的毛老师满脸惊恐，连连挥着手喝着：“不要吆鸡！不要吆鸡！”

这天爬山共六个多小时，而且上下都是陡坡。晚上，毛老师还在取笑着埋怨周老师：“说什么半天就拢了，我倒忘了你们这儿的人过去到松潘缴粮，七天就拢了！”

水磨坪与巴卓沟

水磨坪有五个寨子，它们分别是二木若、水若、二里、里鱼、赖子。这儿的人都说，很久以前他们的祖先从高山上一个告盘寨迁下来。我们住在水若寨。这儿有两个大家族，吴家与何家。吴家主人说，最早从告盘寨到水若来的是两弟兄，姓何的是哥哥的后代，姓吴的是弟弟的后代。

一天晚上，我们围在铁三脚边聊天。周老师提到，一个威州师范学校的老师久病厌世，此前不久跳入岷江自杀。在这时，我们的主人家似乎感到很困惑。就在大家谈这事时，他突然插话说：一个人为啥子要把自己杀死？没有人回答他的问题。我想到白天，我在山上见到一个背着粪筒的少



水磨坪：（左）一对新人（中）站在柴堆前的老夫妻（右）村落与庙子



铁索木桥前背水的女孩（水磨坪）

女，边走边啃着苹果。周老师刚把像机取出来，她边笑边嚷着，莫照！莫照！并加快脚步往山上奔。周老师开玩笑地在后面说，不照！不照！别把粪筒打翻了。我非常惊讶，在这样陡的山坡上她还能背着粪筒奔跑。伴着我们的一位村民说，因为生活条件差，这儿的女孩都很能吃苦，做父母的看了不忍，所以都想把她们嫁到生活条件较好的地方去。

那晚上床后，我一时睡不着，心里想着那问题：人为啥子要把自己杀死？我熟读过法国社会学者涂尔干的《自杀论》，但那晚，学术似乎离这问题很远。这屋子中，包括我睡的这间房，屋梁上到处架满了一叠叠的大小木板。白天我问过主人家，他说他有两个儿子，儿子结婚时他要为他们准备房子。因此从二十多年前开始他就经常从山上拉木头下来，去皮，将木桩片成一片片的板子存着。为一家人温饱，为儿子娶媳妇盖房子，将女儿嫁到生活较宽的地方，若这就是生活、生命，人为何要脱逃？或为何会想到要由此脱逃？



溪涧里淘洗金沙的男子（水磨坪）



上山放羊的女孩背个竹篓，好摘些野菜、猪草、菌子回来

水磨坪有些媳妇由生活更艰苦的巴卓沟嫁过来。巴卓沟还在更深的山沟里。在我的印象中，巴卓沟的人几乎都离不开木桩子。在那几年，巴卓沟的青年男女“找钱”最普遍的办法便是背木桩子到沟外去卖。在水磨坪经常看到他们的身影，三五成群，背着约一百五十至二百斤重的长条形木桩，或在山道上倮着背缓步前行，或在树荫下歇着。听说，砍木桩子的人天未亮便要起身，往深山老林中去。砍下的树木，稍做些处理后背回村子里，回到家里天色已黑。背木桩子出沟也是一早出发，木桩子拴上铁环，穿上旄牛毛搓成的绳子，便可背起走。经水磨坪背到沟口，大概刚时过正午。在这儿将木桩子卖给商人后，再由沟口走回巴卓沟。这样辛苦两天卖得木桩子的钱，大约是三十元左右。



背木桩子走在山道上的巴卓沟少女

我听一位巴卓沟迁来水磨坪的人说，1950年代以前巴卓沟的人难得出来。那时，他们走到水磨坪就被当地人喊“蛮子”，走到沟口更被沟口的人喊“蛮子”。他说：现在的年轻人走得远了，这些背木桩子的还算是没办法的，有办法的走得远了。他骄傲地谈起自己在成都的儿子。但最后他叹口气说：人走出去，烦恼比在沟里时还要多些！

射蟒英雄的故事

水磨坪吴家一位老人跟我说起一个故事。基本上这是一个英雄射蟒的故事，后来我在沟口与两河口一带也听人说过。但这老人说的重点却不是射蟒英雄，而是他家里的一个汉人娃子。以下是他所说的故事。

以前羌族爱习武，过去这寨子抢那寨子，所以能武的人多。当时在两河口出了一条大蟒，往松潘的路都被它堵了。官府出榜，找人治大蟒。那时，吴家出了个很能射箭的好汉。他家里有个放羊娃娃，是汉族。那个放羊娃娃看了榜，就想，我主人一身好功夫，一定能制服那大蟒。他就替主人把榜撕了。后来他主人，吴家那英雄射手，便下山去射杀了大蟒。官府听说有人杀了大蟒，为民除了大害，就召他来受赏。这吴家的英雄箭手能屠蟒，却不敢去官府。他对那放羊娃娃说，你惹的祸你去，人家若问你主人家为何不来，你就说，我主人家个子高得很，雁门走不过去。那放羊娃娃去了成都，别人问他，他说我只是那射蟒的吴爷家的娃子。成都的官说，听说你要当个瓦寺将军。他说，就是就是。官府问，那你要服哪里管呢。那时汶川县官是他的舅舅，那放羊娃娃便说，我服汶川管。所以他就成了汶川瓦寺土司的祖先。所以过去那按时跟皇帝领饷银的索土司，跟这里吴家婚丧喜庆还有来往。

在20世纪上半叶，汶川的索姓瓦寺家族是相当汉化的土司家族，该家族又与理县、马尔康一带的嘉绒藏族关系密切。民国元年，松潘的村寨土官率兵打茂县，也靠瓦寺土司出面斡旋才得让他们退兵。这家族就像故事

中那放羊娃娃一样，到处都敢走，到处都吃得开。相反的，沟里的英雄好汉能射杀大蟒，却走不出雁门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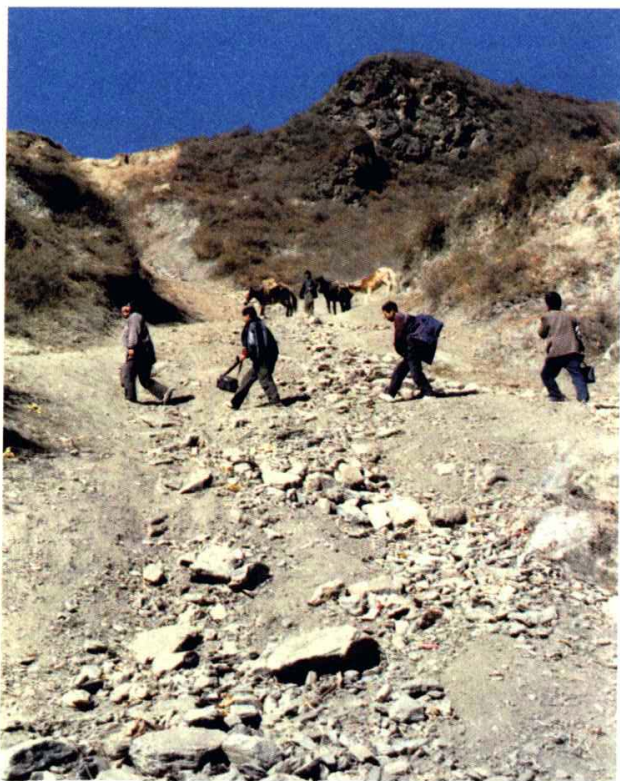
三龙沟

1996年冬，我们一行人出了水磨坪后，在沟口搭本地班车到三龙乡。树全的姐姐嫁在三龙的诺窝寨，他的一个老根也在这儿当乡书记。由于乡上没有饭馆，余书记在一个烧酒师傅家里请我们吃饭。当然，这样又免不了要多喝点酒。近午夜时分，我们才回到乡招待所住宿。那晚我们都喝多了，一时胃翻得难受，于是大家坐在一个残坏的八角碉底下看星星、摆谈，等着酒意退去。据说，过去红军打这儿过，曾住在这个碉里。

三龙沟乡政府附近及以下，都是较汉化的村寨。这儿流传一个英雄



由高山上俯视三龙沟



由于三龙沟陡坡多，上山经常要走之字形往上爬升

王特的故事。据说，他是清乾隆时代的人。当时本地归土司、喇嘛管，而土司暴虐，喇嘛无道。过去在川西的岷江及大渡河上游地区，土司与大喇嘛经常是兄弟，两人分别掌理本地政治、宗教；或者政教合一，两人共治。本地人王特在“议话坪”召开会议，大家决定不要让土司管，并把坏喇嘛赶走。“议话坪”是河边较开阔的一块平地，沟中重要的大事，过去均由各个家庭或家族派代表在此商议。几乎每个羌族山沟都有此习俗。据说，当时一家丢一个石头，将石头堆起，算是大家都同意参加王特领导的造反。

撵走了土司、喇嘛，事情还未了。为了怕土司向清廷告状说百姓反了，他们还要到京城说明原委，并要求本地归朝廷管。当时一大房去一个人，共去了十个人。他们在旅途中走了半年多，病的病，死的死，到达京城时只剩下王特与另一个村民。他们进不了京城，就在城边卖口弦（一种本地乐器）、扯口弦。过了三年，皇后才听得这件事，便召他们来问，并让他们见到皇帝。这样，本地才归“大朝”管。但王特还未及还乡，便死在京城里。皇帝送了他一个红漆柩子，差人直接将他的棺材



石砌房墙上的T字形窗孔（三龙沟诺窝寨）。这样的窗孔是为了便于从内向上下左右放枪，显示过去这儿由于资源匮乏，人群间相互争夺劫掠很频繁

抬到三龙，埋在花桥那儿，送葬时还替他放了三个铁炮。

讲这故事的人告诉我，现在本地老人死了还要用红漆棺木，用明火枪打三炮，因为这是皇帝给他们赐的。“我父亲八十多岁了，他说，我啥都不要，但抬起走时要给我放三炮。这是我们的民族英雄王特给我们要来的。”本地过去归“大朝”管，这是让岷江上游许多老一辈村寨民众仍感到自豪的，特别是在较汉化的村寨中此种地方认同尤为清楚。如在三龙沟，较汉化的村寨民众瞧不起诺窝、勒依等高山村寨的人，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他们不属官府而是受土司管辖。

无论归哪里管，最重要的还是地方上的老规矩。譬如，孝顺父母，这在羌族村寨里普遍都是最重要的规矩。在三龙乡政府，我注意到墙上有一条鞭子。我问乡政府的人那是做啥用的。他们都笑，说这不知是哪个人想到的馊主意，让乡上可自行鞭打处罚一些小治安罪犯。他们笑着说，我们怎么可能鞭打老百姓。据他们说，只有一次，而且是在乡亲们的要求下，他们鞭打了一个年轻人。那年轻人平常便不孝顺母亲，后来母亲病重他又不把她送去医院，结果被舅舅及乡亲们揪到乡政府来。在群众要求下乡政府的人鞭打了那年轻人，并要他背着他母亲下山就医。



三龙乡政府（1990年代）

三龙诺窝寨

第二天，我们先在乡上作了些访问，然后往诺窝寨去。诺窝是岷江西岸的高山村寨，比我前面访问过的永和沟、水磨坪等地村寨要高得多。岷江东岸的永和沟、水磨坪等地村寨，由沟底上去寨子少则三五分钟，最多也不超过一小时。然而以我的体力与脚程，由乡政府上到诺窝寨大约要花上三小时，而且一路都是陡坡。看我走得艰辛，同行的树全说，这还不算什么，你们应该到我家乡曲谷去体验一下那儿的山路，“爬坡时，人的鼻子都快要触着前面的地面了”。虽然形容得有点夸张，但我相信树全家乡的生活条件应比这儿还要差。因为他的姐姐嫁到这儿的诺窝寨，而羌族总



几乎与对面雪山一样高的诺窝寨



雪山前的诺窝寨



村民修路改善本地交通

是将女儿嫁到生活条件比本家乡好的地方。树全说，他小时候每天上学、放学都要走单程两小时的山路，晚上睡着了，脚筋还在抽。他说，现在有时他还梦见自己的脚在抽动。

爬了一个多小时山路，我们来到勒依寨。三龙沟的诺窝、勒依、新基等高山寨子，跟上游曲谷的村寨较接近，两地村寨民众在同一个大山上打猎。相反的，这儿的村寨民众过去与三龙沟中、下游的村寨民众较有隔阂。大寨子、何兴坝等村寨民众认为上头的人都是“赤部”，也就是“蛮子”，而诺窝、勒依等高山村寨的人则认为何兴坝及其以下的人都是“而”，汉人。现在人们都承认这是过去的无知，事实上大家都是一个民族，羌族。我们在勒依寨暂时歇脚，被一位威州师范学校的学生家长拉进他家里吃午饭，少不得又饱食一顿酒。

下午我们来到诺窝寨，这儿村寨位置高，因此视野开阔。树全的姐夫过去是本地最好的猎人。年轻时有一天他外出打猎，失足坠崖。紧急间，他以手臂勾住一根崖边的粗树枝，未让自己落入崖下。就这样，他悬在山崖边两天。这两天里，他以最坚决的意志对自己下指令——手臂不能打开。后来他被救回，但手臂就永远打不开了。十多年前我遇见他时，屈着一只左臂的他仍是当地最好的猎手。晚上，我们吃着野鸡和他去年打来的野羊肉。树全的姐夫说，他背着野羊走了一天半才回到家里。刚躺下来休



主人以咂酒待客（三龙沟诺窝寨）

息没多久，有人传话来，说新来的乡书记喊他去。他心想，这新书记厉害了，我才刚到家，他就知道我打猎……他忐忑不安地来到乡上见书记，原来是树全请余书记带两条烟给他姐夫。大家听了大笑。但就在这时，余书记推门进来。一屁股坐下便夹了块野羊肉放在口中，边嚼边说：“这是啥子肉，味道好！”

离开诺窝寨那天，我们先与余书记约好，一起在卖豆腐的人家吃晚饭。我们到了乡上，卖豆腐的人家说书记刚离开，上山救火去了。失火的地方比诺窝寨还要远一两倍，我们估计他无法赶回来共餐，所以我们吃了晚饭便回招待所休息。晚上十一点左右，我们刚睡下去就被人摇醒。余书记带着几个村长，每个人身上、脸上都还带着火场上的黑灰，以及浓厚的汗味。他们笑嘻嘻地站在我们铺榻前，把人一个个喊起，说：“起来！起来喝酒！”于是这晚我们喝了人情浓郁的一场酒。

黑虎五族

1998年初的冬季，我到永和沟过年之前先到了茂县黑虎沟。这是岷江西岸一条支流造成的深长沟谷，里面原有“五族”，目前分作四个大队（村）。黑虎五族，原来是五个村寨群：二给米、阴嘴河、蔼紫关、耕读百计、爬地五坡。后来二给米与阴嘴河并为一个大队，所以只有四个大队。还有一种说法是黑虎七族，指本地张、王、杨、徐、任、何、余，七个大姓。

那一年，周老师陪我到黑虎。我们到了乡上（乡政府），他便往村里



黑虎沟的碉楼



黑虎沟建在山脊上的碉楼

去找熟人。我一个人爬到附近山上，想找个好角度拍照。这时一个年轻人走来对我说，你照像吗？缴五块钱！我正在犹豫是否要接受他的勒索，周老师远远走回来，并看出那年轻人来意不善。他快步趋前，问明原委后，将那年轻人痛斥一顿，并提及好几个黑虎本地的老辈子。最后，那年轻人悻悻离开。

羌族每一条沟里，人们的生活资源都十分匮乏，而黑虎又是其中资源最匮乏的地方之一，这表现在许多方面。清代文献上有关“黑虎羌番”造反的记载特别多。资源少，容易造成官逼民反。黑虎各村为应付战争而建的碉楼特别多，为了争夺资源，对内对外战争不断。而我被索取“摄影费”那事，我的理解是，那年轻人只是不轻易放过任何资源而已。

为了分配及保护资源，本地人的族群认同与区分非常强烈。年岁较长的民众常认为“黑虎族”便是一个民族，或认为黑虎五族是五个民族，甚至认为本家族的人也是一个民族。这并不荒谬，事实上几乎所有人类都凝聚为一个个的“族”，如部族、族群、民族，以垄断与保护共同资源，并

排除外人。只是近代以来我们习于（或被教导）以“民族”来称各个国家所承认的“族”，并认为这是唯一合理、合法垄断与保护共同资源的人群单位，同时将“部族”视为落后的部落时代的产物，将“族群”视为民族内不必要的或非理性的人群区分。然而在黑虎沟，在这样一个资源匮乏的小世界里，由大队、小队到各个寨子以及寨内的各家族的成员，都是共有、共享本地资源并排除“外人”的群体。他们称这些人群为“民族”，只是强调其合理、合法性。

在过去，各庙一年一度的赶庙会活动，也是强调本地各“民族”区分的一种习俗。当地老人告诉我，黑虎五族中每一“族”都有自己的庙子：阴嘴河人拜的是川主庙，二给米人拜的是黑虎将军庙，葛紫关人拜的是龙王庙，耕读百计民众拜的是王爷庙，爬地五坡人拜马王庙。各庙办庙会的时间都不同，这一天民众聚集，在庙会活动中增进彼此情感与团结。同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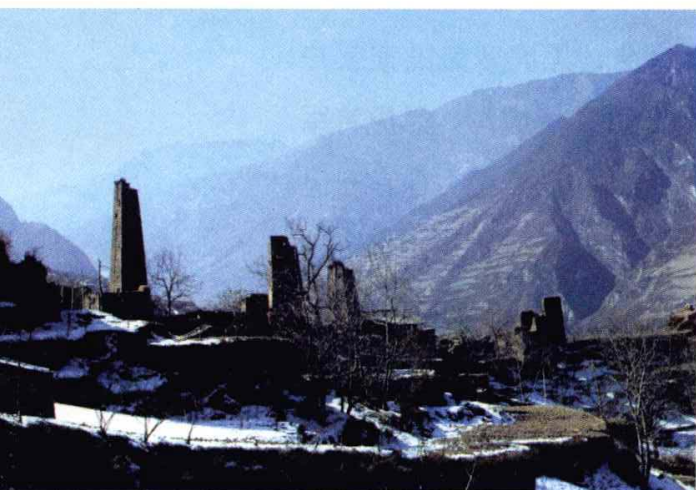
黑虎沟的碉楼群,显示过去本地人们深受战争暴力威胁



走在山道上的妇女



黑虎沟妇女在一起晒太阳、绣鞋、聊家常



黑虎沟的碉楼



在外头织布的黑虎妇女

个庙子内，同村各家族拜的神还有区分。如在二给米的黑虎将军庙，据一个老人告诉我，过去这庙子内有三尊神——龙王、黑虎将军、土主。二给米上寨人拜土主，中寨民众主要拜龙王，下寨拜的是黑虎将军。更有趣的是，他说，各个菩萨的位置都与各寨地盘有关。龙王菩萨背后对着中寨的地盘，土主菩萨背后对着上寨的地盘，黑虎将军背后对着的则是下寨的地盘。各寨有各寨的地盘，放羊、砍草都不能随便越界；各大队间的边界，就更不能随便跨越了。

黑虎将军

无论如何彼此区分，在黑虎沟，黑虎将军倒是人人都承认的本地英雄。据说，黑虎将军是清代中期人，出于本地阴嘴河“窝里窝夺”寨杨家，所以又称作杨氏将军。较神奇的说法是，他身高一丈二，腰大十围，脚穿尺多长的草鞋。原来黑虎一带百姓常受外来人欺侮，自从出了这么一位英雄，本地人的安全便得到了保障。

他最有名的一场保乡卫土战，说是在一年除夕，黑虎寨羌民家家户户都买了火炮准备过新年时燃放。这时，几路外敌进入黑虎沟。黑虎将军将全寨各家户过新年用的火炮收缴来，并准备了无数的铁油桶。他在自己的寨子——窝里窝夺设下第一关。当敌人进到这儿时，黑虎将军指挥本地战士将火炮放在铁油桶里燃放，并将铁桶滚下山去。于是一时炮火声响震天，黑虎战士也乘机杀下山来。这阵仗吓得敌人魂飞魄散，纷纷弃甲奔逃。后来，敌人又召集更多部众来袭。黑虎将军令部众准备许多树木枝



黑虎沟的山田与村寨

干，在离第一关不远的五林池，每隔几尺就埋下一根，如此满山遍野地蜿蜒到第二个守备关口。晚上他差人在每个枝干上点上一炷粗香。夜晚敌人来袭，看到遍山的小火光，以为是数量惊人的黑虎战士躲在林子里吸兰花烟。于是，这下子又把敌人吓退了。

黑虎将军最后是如何死的，各人说法不同。一般说是，黑水人来进犯，黑虎将军披着皮盔甲与敌人战于松鸡堡。在这场战斗中，他中了敌人的暗箭，抬回寨子后不久便死了。黑虎将军死后，百姓在二给米修了个黑虎将军庙纪念他。今日黑虎一带的羌族妇女都包白帕，据说，这是为黑虎将军戴孝。

黑虎沟的老端公

1998年在黑虎沟，我访问了一位老端公。“端公”便是羌语称“释比”的羌族巫师。老人十一岁时父母双亡，跟着爷爷住。他爷爷是个端公，到哪儿作法都把他带上，所以他十一岁就开始学法术。先学叫魂、招魂，再学驱鬼去邪。学了十二年，到了二十三岁还未学全，本乡就解放了。后来他有三十多年没有作法，然而“文革”时还是由于曾行“封建迷信”而戴高帽子。到了1980年代后期，才又有人找他作法事。他说，那时有些经文、仪式都忘了，慢慢地又想起一些来。我问他能不能替我做个祈平安的法，他说可以，但要花三天准备材料。后来因为我要先离开而此事作罢。

后来几年，我又三度到黑虎沟，最后一次是在2002年。那一年夏季，北京某学术文化机构在茂县举办大规模的羌族文化国际学术会议，会议的重头戏是在黑虎沟举办羌族祭山会。我有幸参加了此活动。我的角色并非与会学者，而是周老师的助手。为了这次会议，阿坝州羌族各县都动员了



在屋内烧茶水的妇女



黑虎沟二给米村附近的山田

不少工作人员。周老师也是大会工作人员之一，负责会议活动的摄影。那是个艳阳高照的早晨，黑虎河坝的一块约篮球场大的地被清理出来作为祭山会场。会场的一端竖起了一个祭台，另一端安放了数排坐椅，这是为学者嘉宾、各级地方领导准备的。祭典开始前，场地周边早就挤满了看热闹的附近村寨民众，以及消息灵通的观光客。近祭台处，更挤满了手持各种摄影、录音设备的记者、学者与民众，我也凑在中间。待重要学者、领导干部寒暄握手接着纷纷坐定后，锣鼓号乐声响起，一队端公边跳边走地往祭台走来。

此时，我望见四年前的那老端公被其他端公簇拥着，显然他是主祭者。端公队伍渐渐移近时，场中骚动起来。原来被围在外面的民众为了能更切近地看热闹而往内挤，场内的媒体记者更是纷纷移动他们的重摄影装备往祭台靠。锣鼓声，工作人员的喝斥声，观众兴奋的呼叫声。在众声喧哗中，我引颈望去，希望知道那老端公在做什么。我看到的只是一张表情木然的脸，此时我想知道的是，他究竟在想什么？他跪下身子，周边所有的摄影机都围上去，闪光灯此起彼落。我已见不到埋在记者堆中的他。这可能是所有端公从未能企及的光荣时刻。他站起身来，我再度看到他。他



黑虎沟的老端公



2002年夏季在黑虎沟举办的羌族祭山会

口中念念有词，此时一个带茸毛的录音头由一根长金属杆递过来，几乎要触到他嘴边。他会不会忘了词？当然这时没有人在乎他在念什么。他再度跪下前，我惊觉自己忘了拍照，立即按下我的相机快门。迟了一步，我只照到一堆几乎是叠在一起的摄影记者。十一岁的孤儿学端公，谁料得到，端公年老时还有这样的际遇？

“全给我退到线后头去！”我正想得失神，突然发现身边的摄影者都在往后撤退。同时，一个粗暴的声音从麦克风传来：“所有场内的人都给我退出去！”我急忙收拾自己的摄影机。窘得是，此时似乎只有我一人还站在场中。麦克风的聲音又传来了，场边一个中年人手持麦克风对着我大声喊：“王教授，对不住，我不是在说你！”原来维持秩序的也是我的



老端公被埋在摄影记者堆中

老朋友，汶川县县志办公室的老何。经他这一吼，可能大家都注意到了，一个冒充记者的教授正呆头呆脑地站在这场中。

牛尾巴寨“人过年”

那次在永和沟过了除夕与新年。年初四，我与周老师到松潘小姓沟去找毛老师。在毛老师家只留了两日，我们便要往茂县牛尾巴寨去。毛老师的父亲杜杰说，牛尾巴吗？从朱尔边那儿翻山过去，一下子就拢了。我不再接受这样的点子了。在此之前几年，我要从这儿去黑水，也是他的建

议：“从海子那骑马过去，半天就拢了。”那天我听他的，骑马上山，花了五个小时尚未越过主要山梁。最后牵着马走回埃期村，因为我的臀部已疼得无法再坐在马鞍上了。

我们花了一天才到茂县太平乡，牛尾巴寨便在对面岷江西岸的高山上。牛尾巴，这名字在羌族地区我听得颇多。通常是，若一地有三个寨子，人们说这三个寨子的祖先原是一个兄弟。兄弟分家时，一个分到牛头，一个分到牛身子，一个分到牛尾巴。若有四兄弟，另一个兄弟分到的便是牛皮子。分到牛尾巴与牛皮子的，一般是较弱势的寨子。但这牛尾巴寨，看来一点也不弱。本地人对这村名有个说法。他们说，过去藏族往南打，将本地人一直撵到茂县石达关对门子的牛角村那儿。后来茂县一带的羌族团结起来，打转来到牛尾巴就打胜了。所以这个“民族”就是从牛角村到牛尾巴之间的人。

我们到达那天是年初六。一抵达山脚下，一位威州师范学校的学生和他的大舅已牵着马等在那儿了。初七，当地习俗是“人过年”，有盛大活动。这儿的习俗是，大年初一到初六依序是鸡、狗、猪、羊、牛、马过年，初七才轮到人过年。这习俗在汉代便出现在中原地区，无疑牛尾巴羌族这习俗是受汉文化影响。我们受这位学生之邀，到这儿来看看“人”如何过年。他的大舅是这儿的村长，何村长。由于牛尾巴寨就在岷江岸边的山上，所以我们一行人骑马直接上山，不需要进沟。这寨子不算太高，本地人约半小时便能上去，但我可能要花上一个半小时才到得了。

牛尾巴的村寨房屋，与永和沟、黑虎沟等地的有些不同。首先，这儿的屋顶是以块状石片铺成鱼鳞状，我在其他羌族地区没见过这样的屋顶。还有便是，村寨房子并未紧紧靠在一起，这情况，与茂县、汶川、理县大多数的羌族村寨不同，而与松潘小姓沟等地村寨类似。通常是，过去经常遭抢或常打仗的村寨，房子就必须紧紧靠在一起。不需担心遭抢或战争威胁不大的村寨，房子就建得分散些。不担心遭抢，有时是因为它本身就是



茂县太平乡牛尾巴塞的冬景



牛尾巴寨的冬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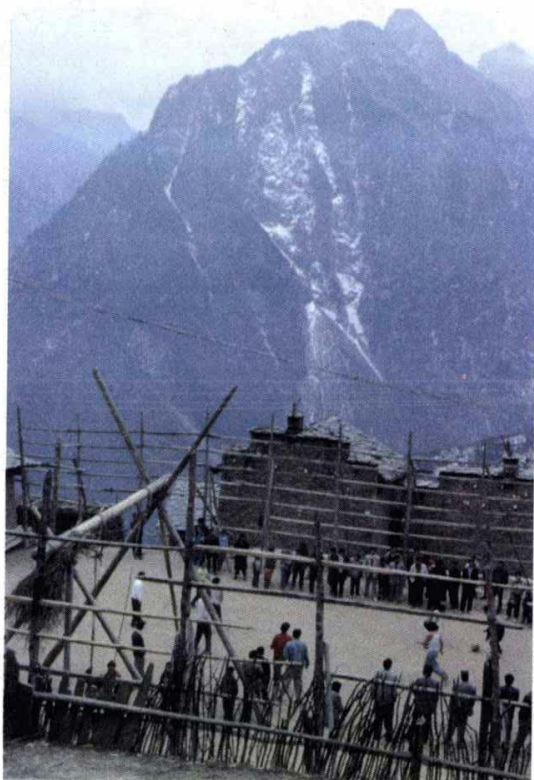
骑马上牛尾巴寨



大家围坐在铁三脚前喝咂酒、聊天

“会抢人的”寨子，也就是“獐猓子”村寨。

本地汉话以“獐猓子”称呼会杀人、抢劫的野蛮人。在岷江上游羌族心目中，最典型的“獐猓子”便是黑水人。毛老师家的小姓沟埃期村与黑水一山之隔，两地村寨民众还打亲家，因此他们也算是“獐猓子”。埃期村的房子便是分散的。1929年甘军南下侵扰松潘，当时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黎光明正在那儿。他记录了当时一些松潘附近村寨头人间的谈话。有人建议引松潘南路六关村寨的民众来抵挡甘军，这建议立刻遭到反对。原因是，据当时的大寨土司旦真王吉说：“南路人打仗是好角色，要晓得他们尽是一些穷鬼，他们走过的地方比甘军走过的地方还干净些，抢得更光。”南路人，指的便是松潘城以南由安顺关、镇江关到太平一带的藏族、羌族，包括大姓、小姓、牟尼沟、热务沟、杨柳沟、牛尾巴、松坪沟等地村寨民众。



人过年仪式前年轻女子玩秋千



人过年的前一晚龙神到各家祝福去秽



仪式中的战争场面



仪式中的世代与性别区分：年轻女子玩秋千，年轻男子舞龙，长老念开坛词请各方神明，青壮男子手持武器绕场表现保家卫土情境

第二天一早，村子中间一块平地作为祭场，场中、场边都是人群，有本村人，也有邻近村寨来看热闹的人。年轻女子打秋千，年轻男子舞龙，热闹了一两个小时祭典正式开始。首先，十多位年长者在场中间排好的椅子上坐定，场中燃烧柏枝香烟袅袅。一位长老站在大酒坛前，口念开坛请神词。这是依顺序请各方山神或地方神明来受享。先请上游的神，再请本地山神，而后从松坪沟等地一直请到成都，这一路请的都是岷江西岸的神。接着，由岷江东岸往上，一路将汶川、茂县等地的神都请来，一直请到松潘，最后是一段祷词。整个羌族地区几乎都有此习俗，附近的黑水及松潘藏族也一样。



人过年仪式后一家人合影

在这之后，进行的仪式是男人持刀枪出征，妇女则在一旁敬酒送行。这一年，枪还未被收缴，各家的土枪皆拿出来；年轻男子持枪，年长的则持刀或只拿一个树枝作为象征性武器。绕了几圈后，整个武装队伍转到另一片更大的田地上绕行。然后队伍一分为二，象征着两个敌对的群体。接着演示的是外敌入侵及本地战士保家卫土的战争场面，战士们一边呼啸，一边放枪。最后是男人出征归来，年轻妇女在路边敬酒，到此正式仪式大致结束。

敬山神或地方神，有强调及巩固本村寨地盘的意思；请所有邻近的山神、地方神，表示本地人知道并尊重他人的地盘。保家卫土之战，则表示一旦地盘受侵犯，村寨民众将矢志护土。这样的“人过年”仪式忠实地反映了本地“人”的社会。



羌族女子的绣花围腰，每一地区、村寨都有其特点

沙朗与尼萨

仪式结束，但热闹才刚开始。许多青年男女等待的歌庄舞，就在这时上场。歌庄舞，也叫作“沙朗”，这是一种大家围成圈子边唱边跳的歌舞。先由几个善歌舞的壮年男女起头，其它人纷纷加入接成人龙，队伍长了便环成圈子。在跳舞的圈子中，不但男女不相杂，不同世代的人大致也是分开来的：中年妇女与中年妇女在一起，青年男女各自成群。此时鞭炮声，扩声器播放的歌庄乐曲声，年轻人狂放的叫啸嘻笑声，将场面弄得沸沸扬扬。

我在场边观看、摄像，过了一阵子，我回头在人群间寻找毛老师等人的踪影。却见到场边一个角落上，七八个老年妇女围着半圈以简单的脚步



牛尾巴寨的少女



—牛尾巴寨家庭的三代人

缓慢绕行，同时她们分成两组人如对歌似的轮流唱着。没有歌庄复杂的舞步，也没有热闹的歌乐。毛老师在一旁专心观看。我走到他身边，还未等我开口，毛老师便若如自言自语地说：“没想到这儿也有尼萨。”说着他的目光仍在那群妇女身上。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尼萨”这个名称。在1990年代，我未在任何有关羌族的文献资料中看过这个名称，也未曾听得人说过它。文字记载的，人们谈论的，节日中表演的羌族歌舞都是“沙朗”歌庄。

后来在与牛尾巴老人们闲聊中，我听得他们说，以前这儿没有歌庄。在各种节日中跳的便是尼萨，或称尼萨日北。这种歌舞，不跳脚，只是转圈圈，你唱一段我唱一段，像对诗一样。一个老人说：“沙朗原来不是羌族舞，解放过后，到外面参加工作的人带回来，后来大家就都跳沙朗歌庄

了”；“现在进化了，一些文人编出来这歌庄，以前不兴跳”。但是，沙朗的歌词在唱些什么，大家都不晓得。尼萨歌词的意思老人们是知道的：过年唱的有过年的内容，结婚唱的又有结婚的内容。1998年我又去了一趟牛尾巴寨。后来听说约在2000年前后，整个牛尾巴村落由高山上迁于河坝。

后来，我在毛老师的家乡小姓沟找到一位很能唱尼萨的老婆婆，当时她已有九十岁。我请毛老师回家乡为她唱的尼萨作录音，每录一段，便请她说明歌词内容。尼萨内容多含本地古语，所以非要唱者讲解不可。后来由于毛老师单位上的工作忙，这工作断断续续地进行了三四年，直到那老婆婆过世。

让我感慨的是，再听见尼萨，竟是川震过后抢救羌族文化的工作场合。2008年下半年，许多保护、抢救羌族文化的大型计划逐渐成型。据我所见，羌族沙朗歌庄是最受重视的项目之一，相对的，尼萨很少被提及。我早就听毛老师说，大尔边沟还有位老人能唱尼萨。因此2008年12月我走了一趟松潘，进行对尼萨唱词的录音。那几天一同工作的，除了来自大尔边沟的两位歌者外，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羌语专家孙宏开教授，四川音乐学院音乐人类学者杨晓博士，以及我的羌族老友毛老师。

在一个三星级观光饭店的房间里，来自大尔边的老人与为他和声的中年人，以当地羌语唱着：

那代的地壳用什么安装了？

那代的地壳以石头安装了。

地壳以石头安装后就怎么了？

地壳以石头安装后就稳住了。

地壳稳住后又变得怎么样了？

地壳稳住后人就活下来了。



灾后为尼萨演唱录像、录音（松潘城内）

对小姓沟及整个松潘的藏、羌族来说，这回地壳虽有些不稳，但人是活下来了。但尼萨能够在观光饭店的房间里演唱，这近十年来的社会变化也算是翻天覆地吧！

汶川



汶川花椒、水果的批发市场



邻近汶川县城的羌族早晨挑着自家产的苹果、花椒到城内贩卖

在我进行羌族田野研究的那些年，汶川是我进入羌族地区的第一站。县城古称威州镇，横竖只有四五条街，这是羌族地区的行政与文教中心。从一条沟到另一条沟的中间，我也经常到汶川住上一两天，休息、洗澡、洗衣服，找个小馆子与朋友一起打牙祭。汶川县城也是我的“讯息中心”，四面八方各沟的民众常来县城办事、购物，做点小买卖，因此我可以打听到各地路况，以及我要找的人在不在沟里。

汶川县的南半部，由漩口、映秀、三江口直到绵虬，清末民国时期这儿的居民已大多自称汉人，分不清谁是汉移民后裔，谁是汉化的本地人。由于下游都是汉人，当前绵虬的羌锋村，一个其村民在家中仍说羌语的村寨，号称是“西羌第一村”。虽然如此，绵虬附近有涂禹山、剗儿坪等与大禹有关的古迹，说明这还是受汉化影响很深的地方。只是在当前羌族认同下，村民们认为大禹也是羌族。不仅是绵虬及其以南，事实上整个汶川的西部、北部都是汉化很深的地方。



汶川花椒、水果的批发市场



灾后汶川到处都是如此路断桥毁景象。

周仓背石塞雁门

我在汶川经常听得人们说“周仓背石塞雁门”的故事。他们说，三国时的周仓是一个本地羌族，他力气大，但却有勇无谋。他见到进入岷江上游这儿的汉人愈来愈多，本地人的势力受到威胁。于是他就想把汶川城外的雁门关堵住，让汉人无法进来。

雁门关是一个狭窄的隘口，周仓想用个大岩石把这隘口堵起来。周仓是个阴间的神，像鬼一样，只能在夜间行动。一天夜里，他把一块大岩石背到岷江边上，这时，关羽——汉人的神——知道他的计谋，便学鸡叫。周仓是个又笨又老实的人，听到鸡叫，他以为天就要亮了，匆匆地把岩石丢下就跑。就这样，雁门关没堵上，所以现在这儿汉人多。人们说，雁门“周仓坪”那儿有个大岩石，上面当年周仓手扣着的地方，背背着的地方，都还留有印痕。

这故事，本身也是一种过去的印痕。在汉民俗文化中，周仓的形象是个有力气无头脑的粗汉，忠心耿耿地站在关羽身后，手中持着关羽的大刀。因此，本地人说周仓是本民族的神，这多少表达着过去本地人被视为“蛮子”而产生的自我意象。然而这个“周仓背石塞雁门”故事，也流露着过去本地人对“汉人”的观感：他们就如故事中汉族的神关羽一样，聪明、狡猾。

雁门关塞不住，进入岷江上游的汉人愈来愈多。这多少还是一种隐喻。真实的情况是，岷江上游，特别是汶川一带，村寨民众成为汉人的愈来愈多——他们自称祖上是“湖广填四川”时来此，认真践行汉人年节习俗，并嘲弄上游的“蛮子”。

十多年来我经过雁门无数次，都没有进沟，第一次进沟却是在2008年地震后，秋10月的一天。那天，我与周老师到雁门沟去探望他的朋友。见到沟中满目疮痍的灾后景象，我心想，谁管他周仓是正神还是阴鬼，谁管

他是汉是羌，在这样的地方人们只求能好好地活下去罢了。出了沟，在途中我问周老师周仓石还在不在。他说，那巨石好像已被泥石流冲走了。是吧，我心想，反正雁门关是塞不住的。我想到，水磨坪那射蟒的吴爷不敢过雁门关的故事。这些故事反映的是，过去对本地人而言，雁门关有双重阻隔意义——他们希望雁门关能挡住不断移入的汉人，但同时雁门关也象征着他们向外发展的心理阻碍。现在雁门关早已失去这两重意义了。

瓦寺土司

汶川不只是深受汉文化、汉移民影响，也曾受康藏文化及其移民的影响，特别是在瓦寺土司驻此之后。

明清时期瓦寺土司的驻地，主要便在汶川的棉虎至映秀一带。瓦寺土司的官寨修在棉虎，他所领的寨子分为两群，一群在棉虎附近，另一群在映秀的三江口、耿达。两个村寨群，正好控制着由大渡河流域进入岷江流域的两个出口。明代中期，大渡河流域的董卜韩胡土司势力强大，他想由宝兴将其势力扩张到岷江流域。于是他借口要走杂谷脑（理县杂谷脑河）向明朝廷进贡，说是当地土司挡了他的路，所以要明廷允许他出兵打杂谷脑。朝廷一道道的命令，要地方官府制止董卜韩胡土司出兵杂谷脑。后来，这场战争被挡住了。但不久，跟随董卜韩胡土司来向明帝国进贡的队伍中便有了“加渴瓦寺”的代表。当时大土司来进贡时，所属大小土司、头人都跟着一道来，以分得皇帝的恩赏。

在中国文献中，还有“加渴瓦寺”这样的记载，可见“加渴瓦”是地名或寺院名。后来在棉虎民间讹传为，最早是外地来了个僧人，百姓捐钱给他盖了个以“瓦”作屋顶的寺庙，所以称“瓦寺”。在信奉藏传佛教的大渡河、岷江流域等地，过去土司除了任命头人分治各地外，以寺院统治



末代瓦寺土司索国光老先生（摄于2000年）

一地也是有的，寺院住持一般是土司的弟弟或亲信。瓦寺土司的村寨，正坐落在两个由大渡河流域进入岷江上游的口子上，这位置也印证了前面那段历史。然而有趣的是，到了清末民国时期，当时的瓦寺土司似乎完全忘了土司家族本源为宝兴的董卜韩胡土司。这就是我所认识的岷江上游人类生态：所有的雄图野心、英雄豪杰，以及所有的历史，都很容易被遗忘。

土司家汉姓为“索”，有一种说法是，过去土司的势力很大。有一天皇帝做梦，梦见一根树枝由外伸入宫墙内。他问别人这是何征兆。臣下对他说，今天有个可能对你有威胁的人将来觐见。结果这一天正是瓦寺土司来朝。于是皇帝赐他姓“索”，也就是要他“缩一缩”的意思。所以，经皇上这么一缩，瓦寺家族就逐渐没落了。我在2000年左右认得“末代瓦寺土司”索国光老先生，后来我每年到汶川都要找他吃饭聊天。索国光有一



卓克基土司索观瀛（摄于1941年）

位叔叔，索观瀛，到马尔康附近的卓克基继承土司。有一回，我从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老档案中找到卓克基土司索观瀛的照片，与索国光老先生十分神似。

1929年，黎光明曾到涂禹山上的土司衙门拜访瓦寺土司。以下是一段他当年记下的所见所闻。

索土司的衙门比县衙门小一点，但是照壁、东辕门、西辕门、大堂、二堂都是全的。前门额上竖着一块火焰牌，上书“瓦寺宣慰使司宣慰使”数字。

土司的儿子索海璠君领了我们到一间书房里安歇着……索土司大概是在午后四点钟离床的，我们游览一过回到他的衙门，他才出来和我们相见。土司名索季皋，是前土司索怀仁的兄弟。索怀仁的儿子索海环早就做了卓克基（理番四土之一）的土司，所以遗职只好让索季皋承继。索季皋不但做了瓦寺土司，而且还兼领梭磨（也是理番四土之一）土司，不过因为一部分人的不服，而今还正打着仗呢。此外，他又是汶川县团练局长，又是金川江防军总司令部下的一个区司令官（仅次于总司令），所以大家都不称他土司或局长，只称他做司令官。听说，他有好几百枝快枪。

黎光明还夸赞这位土司谈吐不凡，所言“辄引报章杂志”，对于现实政治很有见地。黎光明离开后不久，索土司便死于和黑水人的战事里。在这新旧社会交替的时代，索土司努力跻身于新社会，却死在旧社会的战争中。

马端公

汶川附近村寨的端公文化最发达。城北的雁门、萝卜寨，城西的龙溪沟，城南的棉鹿，都出过法力高强的端公。我曾访问过几位老端公，抄录他们如“雪山冰尸咒”这般听来恐怖的咒语、经文，听他们说过去端公法力是如何如何高强。最让出门时常遗漏东西的我十分羡慕的一个端公法术是，许多故事都说，端公出门作法常忘了带鼓，此时他们念个咒家中的鼓就自己飞出，直飞入端公手中。过去棉鹿有位马端公十分厉害，以下是我听说的关于他的故事。

羌族端公就是一般农民，不离生产，马端公也不例外。农闲时，岷江上游村寨中的青壮年男人一般都要外出工作。有一年夏天，马端公与他的徒弟一起到灌县一个人家打工赚钱。当时那家正在作道场，杀鸡宰羊，招待宾客。马端公是岷江上游来的工人，被安置在猪圈牛栏的角角上。马端公生气，便使了个定根法。吹两口气，咒一念，这时酒席上大家的筷子有如千斤重，没有人拿得起来。席上请来作道场的汉人端公知道主人得罪了高人，便问主人家还有没有其他客人。主人答道，没有，只有两个山里来这儿干活的工人。汉人端公说，你赶紧把他们请过来。

他们把马端公跟他徒弟请到席上，果然，筷子就拿得起了。饭吃了后，汉人端公不服气，要跟马端公比本事。汉人端公要主人逮一只公鸡来。马端公见了就对徒弟说，今晚你无论如何不能打瞌睡。主人把鸡拿来，汉人端公把咒语一念，一刀就把鸡头割脱。这时，马端公的徒弟打瞌睡，因此他的颈子就被割了。马端公死了徒弟，他动怒地跟主人说，主人家你替我找一些瓜子，今天我要谢这位师傅。瓜子拿来，马端公拿一壶水淋下去，瓜子就两瓣两瓣地长起叶子，接着开花结瓜。他摘下瓜，用刀把瓜剖了，问汉人端公敢不敢吃。汉人端公知道，吃了肚子就会被剖开，所以他不敢吃。汉人端公撒米变蜂子来对付马端公，但马端公撒青稞，变成



端公作法事（摄于1941年）

大野蜂子，就这样每一次都赢汉人端公。

回来路途上，马端公遇到几个挖石头的人，他跟他们要米，他们不肯给。马端公指着千斤重的石板说，如果我能将这石板运起走，你们给我米好不好。那些人不相信他移得动石板，就答应他。马端公使了个法，把石板移了几丈远。那些人只好给他米，但故意不给他锅子与柴，看他要如何煮饭。马端公在地上堆了三个石头，把自己的帽子放上去，倒水加米进去。又将自己的脚杆放在锅子下，点起火来烧。那些人看到他的脚放在帽子下烧得熊熊的，吓得直道歉。马端公吃了饭后，继续上路。他走了后，那些人才发现自己的锅被用过，桌椅板凳的脚也烧了。马端公独自回家，他的徒弟死在外面，所以端公的法术没传下来。

羌族马端公虽赢了汉人端公，但他的徒弟死在外地，死在汉人端公之手。



当代结合观光、学术与民族文化的端公法事（摄于2002年）



当代动员数十位端公的法事演出场面

释比经文：羌戈大战

端公经文有上坛、中坛、下坛经，各有十二段经文。各坛经文也有相互借用，如中坛经的内容经常也见于上坛、下坛经。端公以下坛经来替人撵污鬼、做丧事，以中坛经为人除病去灾，以上坛经来祭天、还愿、祈雨。经文中包括许多故事，各地端公经文不同。以下是最普遍见于各地经文的一则故事。

很早以前，天神木比塔要他儿子赶着天上的神牛，找一个没有夏季没有冬季的地方去放。他儿子就把牛放在羌族这地方。过



羌族端公经书《刷勒日》，只有图绘无文字，故又称无字天书。这图绘应是端公念经时提醒自己经文内容的符号



羌族端公经书《刷勒日》图绘。此种图绘经书现在非常罕见

了几天，天神要他儿子去数牛。初一去数，牛没少。初二去，花鼻子的牛不见了。初三，断尾巴的牛也不见了。初四，跛脚的牛也不见了。初五，没角角的牛也失了。天神木比塔就来查分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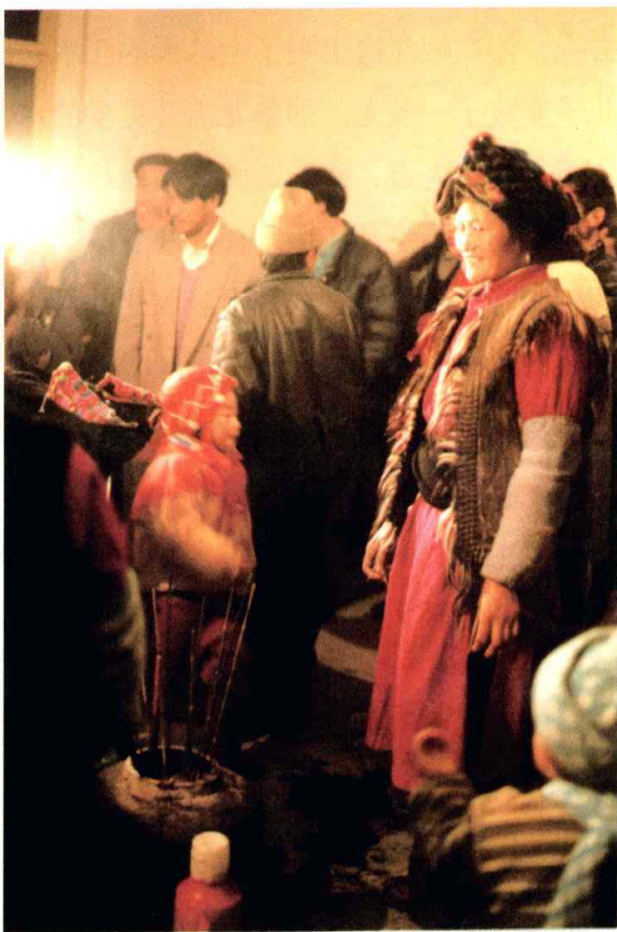
当时这儿住了两种人，一是羌人，一是戈基人。羌人是从外地来的，很受戈基人欺侮，所以羌人想借机除掉戈基人。羌人跟戈基人说，我们把神牛杀了吃吧。他们以酸菜煮牛肉，羌人专捡酸菜吃，戈基人吃牛肉、牛筋。天神下来查的时候，羌人说，你看，我牙缝里都是酸菜。天神看了，又查看戈基人的牙，牙缝里夹的都是牛筋。因此他对戈基人有了不满。天神木比塔又问羌人、戈基人，他们如何敬神。羌人说，我先敬神，再喂猪狗，剩下的自己吃。戈基人说，我自己先吃饱，再喂猪狗，猪狗不吃的再敬神。于是，天神心里就有了准备，要帮羌人来消灭戈基人。后来，当羌人与戈基人打起来的时候，天神教戈基人以馍馍来打羌人，但教羌人用白石头打戈基人。他又教戈基人用麻杆打羌人，教羌人用黑刺棒棒打戈基人。因此戈基人节节败退，终于被羌人消灭。

我到处听得人们说戈基人的故事，特别是在汶川、茂县一带。本地人在耕地时常挖到一种石棺墓葬，里面有随葬陶罐，他们认为这便是戈基人的墓。他们告诉我，那些墓葬里戈基人的腿骨好长一截，当时的人肯定非常高大。有的人说，戈基人有尾巴，当他们尾巴脱落时就会死。无论如何，当羌族人在说戈基人时，没有仇恨、没有崇拜，只带着一点揶揄，却又为戈基人的绝种表露一丝感伤。戈基人似代表着一种“过去”，那时的人较鲁直、粗暴、没文化，然而却又不失纯真。羌人以其聪明、诡诈得到天神帮助，然而从此也屈服在天神的管辖下，需时时乞求天神的恩典。

孝子与孽龙

汶川一带流传一个孝子变孽龙的故事。这故事说，汶川有个瞎眼的老婆婆，死了丈夫，跟一个儿子相依为命。这个儿子对母亲十分孝顺，他天天上山割草，到城里卖。老婆婆对他儿子说，儿呀，你真辛苦，每天要上山割草。那儿子答说，不辛苦，山上那丛草今天割了明天还长，好像永远割不完似的。老婆婆说，你干脆把那草挖回来栽在我们院里，免得再费力气上山割草。那儿子就去把草挖回来。他挖的时候，看到草根底下有一个珠珠，就把珠珠带回来，草移种在屋前。

他把珠珠埋在米缸里，第二天米缸里的米满出来，外头的草却死了。



城镇中举行的婚礼，贺客来自各方。
从头帕可见这位女客来自赤不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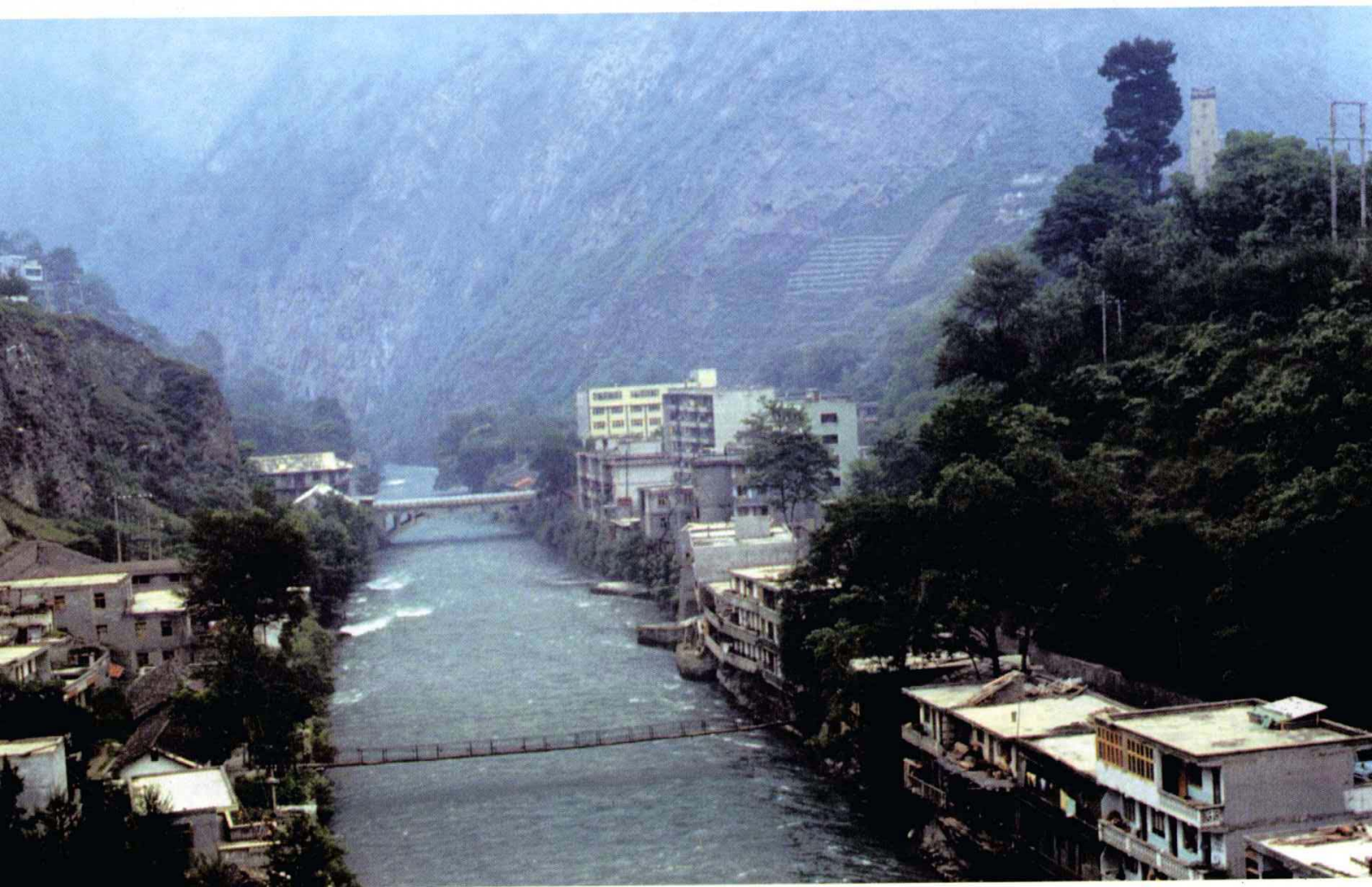


汶川县城附近的布瓦寨。布瓦寨的黄泥碉楼（右图），据称已半毁于此次大地震

米缸里的米愈掏愈多，那儿子就发放米给寨子里的人，整个寨子的人都去吃那米还是吃不完。一个有钱人知道了，就仗势来抢米缸。那孝子心一急，把那宝珠挖出来含在嘴里，但一不小心却将珠子吞入肚里。富人抢了米缸离开后，那儿子感到口渴，但怎么喝水还是渴。他妈妈就要他到河边去喝，他在岷江边上喝了七八天的江水，他妈妈再去看他时，发现自己的儿子变成了一条龙。那条龙需要更多的水，于是便沿着岷江往下游去。他舍不得离开老母，边走边回头望他母亲，所以造成岷江一个个的回湾。孝子变成的龙到了都江堰，在这儿变成一条孽龙到处害人。后来被这儿的二郎神制服，把他锁在铁链上。汶川的人说，以后在都江堰淘沙（疏浚），都要淘到那锁龙的铁链子才行。

渴，渴望，对富足生活的渴望让一代代无数的岷江上游年轻人离开母亲，顺着岷江进入成都平原。在我多年来进出羌族地区后，有时身在台湾，闭上眼，岷江上游每一个熟悉的回湾都宛如在眼前，更何况是那些离乡的羌族年轻人。然而岷江上游的孝子，来到成都平原却成了一条被二郎神以铁链锁在江底的孽龙，这是否意味着在外面他们曾受到多少的冤屈与有志难申？

理县



紧沿着杂谷脑河的理县县城

1995年夏，我前往理县，在龙溪大桥前遇上泥石流，无功而返。1996年夏季我到汶川，那时正好有些乡村小学老师在威州师范学校参加一项训练。在与他们的闲聊中，几位来自蒲溪沟的老师邀我到他们家乡耍耍，我欣然接受邀请。于是几天后我到了理县，然而一到就感冒发烧。我在县城养病四天，访问了来自桃坪东山、曾头、薛城水塘、通化卡子等地的村寨民众。而后，我与周老师，以及另一位搜集羌族民歌的年轻威州师范学校老师，一同到蒲溪沟去。



走入蒲溪沟的羊肠小道



蒲溪沟休溪寨的山田与村落



苧麻

尔玛尼（黑羌族）

走入蒲溪沟，特别是由乡政府到休溪寨，是一段令人感到愉悦的路途。没有累人的上坡路，一路伴着的是脚下各种的野花，清澈的溪水，以及诡异多变的山岩。然而这样的地方，在理县其他地方的人看来却是穷山恶水。就因为蒲溪沟山穷、人穷，过去本地村寨民众很受外面人的歧视。理县羌族自称“尔玛”，但他们称蒲溪沟的人为“尔玛尼”，也就是黑羌族的意思。本地嘉绒藏族称羌族为“达味”，称蒲溪沟人为“达味尼”，也是称他们黑羌族。理县羌族过去常以“五屯的人”自称。五屯是指，杂谷、甘堡、上孟、下孟、九子等清代在此所设屯营，其中只有九子屯的人为羌族，其他各屯都是嘉绒藏族。在改土归流后，清政府将本地村寨民众变成成为大清帝国打仗的屯兵，本地人也以此为荣。他们瞧不起蒲溪沟人的一个理由是：“过去打仗时，蒲溪沟的人只够格背背子、背粮食。”因此过去理县薛城等乡羌族可与邻近的嘉绒藏族打亲家，而不愿与蒲溪沟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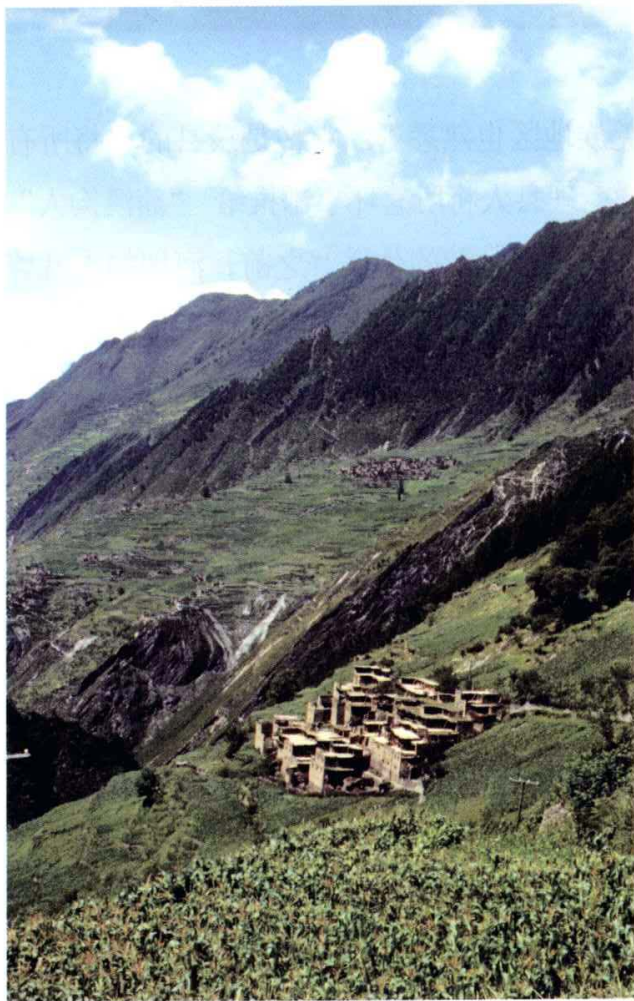
休溪寨中残破的房子；已无人住的房子不会被清除，因地盘神永远在那儿

结亲。

走完沿溪的山路到了休溪寨的山脚下，由此上寨子一路都是陡坡，我花了一个多小时才攀上去。这寨子，屋前路旁到处都是藿麻，在我看来，这是个完全沦陷在藿麻中的寨子。藿麻是一种叶面上带毛刺的植物，被它刺到，痛楚感传来有如触电般的快速、强烈。幸好我在小姓沟吃过几次亏，所以走在休溪寨我十分小心谨慎。我们到达时，徐老师正在给一班学生上课，学生全部都是十六七岁的少女，原来这是乡村小学在暑期进行的“扫盲课程”。这也显示羌族农村社会的一般现象——女孩子从小便投入

家内与田里的工作，而无法好好入学读书，因此到最后需要被扫除的文盲几乎都是她们。

蒲溪沟里头森林宽，还有个景色绝佳的海子。过去本地人除了种地外，也靠着在山上捡菌子、挖药与打猎来补充家计。我在羌族许多村寨中都听过“黑山法”的传说。这是一种打猎用的法术，据说，过去“做索子”（放陷阱猎野兽）的人经常要拜师学黑山，但没有人能说得出“黑山法”具体是如何施作的。根据外面人的说法，蒲溪沟还有人会黑山法。人们认为施黑山法要绝子绝孙，所以只有最穷的人才会去学黑山、行黑山。但我在蒲溪沟问这事，村民们坚决否认本地有用黑山法打猎的人。这现



由休溪寨遥望对面山上的大蒲溪寨



休溪上寨

象，多年来我在羌族地区也熟悉了。就像是茂县的人将所有不好的事都推给“黑水人”一样，理县人将所有坏事都推给“蒲溪沟人”。在蒲溪沟内也一样。我要到蒲溪沟最上游的休溪寨之前，河坝的人就警告我，到了上面不能喝他们的水，说上面寨子的水有毒。到了休溪，我要由休溪下寨到上寨去，下寨人仍然这样说，上去那儿不要喝他们的水。

无论如何，将我所听得的拼凑起来，黑山法这法术大概是它祭起后遍山的野兽会觉得天一下子全黑了，只有一个地方有光。于是它们都往那儿奔，事实上那就是猎人安陷阱的地方。祭黑山做索子的前几天，要先敬搜山菩萨，或说是武猖神。那晚，菩萨会在梦里指示要在哪里安索子；若梦到烧房子、女子，梦到落入茅坑，梦到打死蛇，就不行了。施法那天一早起身，净脸后，要保持安静，水不能撒在火里，饭不能撒，然后才念咒施黑山法。一位薛城水塘老人说，他年轻时曾跟一个下孟（薛城下孟乡）人学过黑山。他念了一小段咒语给我听，我要他念下去，他不肯。根据他的说法，施黑山法也有些规矩，譬如猎到约十到十二只野兽时就要休息两个月，所有的索子都要收掉。



休溪少女展现她们精致的绣花上衣围裙 屋内土灶及梁上挂着的猪膘

蒲溪沟与羌族其它山沟比起来并不特别落后、穷困。只是，沿杂谷脑河的大道是过去汉藏贸易的重要孔道，本地各沟村寨深受汉藏文化影响。相对来说，蒲溪沟深入山间，与外界接触少，所以在一些文化传统及观念上比其它理县羌族要保守些。1998年夏季我再到蒲溪沟采访，此行另一任务是为博物馆买些羌族妇女服饰。我在休溪寨，选好了几件绣工精致的衣服正要购买，老年人出来大声斥责，说是再穷家里的东西也不能卖。试了几家都一样，就是不肯出卖衣服。后来我下山回到乡政府，跟乡上的人谈起此事。乡政府的干部说，这儿的人便是如此，前些年，这儿有些超生户，乡政府不忍心要他们罚钱，就没收他们家里的陈年猪膘来抵，但没料到后来他们还是到处借钱把猪膘赎了回去。

弟兄祖先故事

蒲溪沟的人，喜欢以一种“弟兄祖先故事”来说明所有人的来历。譬如，蒲溪沟内有五个寨子，老鸦、蒲溪、色尔、休溪、奎寨。老人们说，蒲溪五寨中老鸦寨、蒲溪寨、色尔寨是最早有人的。当时三兄弟从黑水逃来这儿，来了后，三个人射箭分地盘，箭射到哪儿就在哪儿建寨子，于是就有了这三个寨子。又如休溪寨的人说，本地的徐、孟、余三姓家族，刚来时原是三兄弟，一个姓。来到这儿后分家，就分成三个姓，因此到现在这三姓家族都不准打亲家。休溪寨的王家也说，从前王家有五个兄弟，来到这儿分家成为目前王家的五大房。

不只是蒲溪沟的人，我所访问过的理县其他地方各家族，如上孟杨家、水塘杨家、曾头邹家，都有几个兄弟祖先分成几支人的说法。不只是各地人群，连各地菩萨也是兄弟。理县羌族地区过去有三个主要寺庙：通化西山寨的白空寺（白哈哈）、桃坪增头寨的铁林寺、牛山寨的天元寺。据说，这三个寺庙的菩萨原来是三个兄弟。他们出生于富户，悲悯世间许多人都吃不饱饭，于是散尽家产，到处济贫救急。后来他们分别在三个地方出家，死后成为三个菩萨。大哥白哈哈在白空寺，二哥白西西在铁林寺，老三白郎郎在天元寺。

在更广大的范围里，现在理县以及汶川、北川等地许多羌族，都以一个“九弟兄祖先故事”来解释所有羌族的来源。这“九弟兄祖先故事”，也就是前面提及的“羌戈大战”的一个版本，原出自雁门端公的经文唱词。在这故事中，率领羌人打败戈基人的英雄叫“阿爸白苟”。战胜戈基人后，他分派自己的九个儿子到各地建寨。其中的老四“楚立基”到理县薛城来，所以理县羌族常说，我们是老四的后代。“阿爸白苟”其他八个儿子分派的地方是，茂县、松潘、汶川、黑水、绵虬、映秀、灌县、北川。这“历史”所蕴含的意义是，相信这“历史”的人将当前羌族集中分



本地传说最早来此地的是三个兄弟，其中之一到大蒲溪建立寨子



休溪寨的乡村小学前

布的茂县、松潘、汶川、理县、北川等五县羌族，以及附近藏化的黑水，汉化的棉鹿、映秀、灌县等地人群，皆视为“兄弟民族”。

这“历史”及其意义可让我们省思的是：我们汉族，或在汉文化及历史记忆中的人们，常称少数民族为我们的“兄弟民族”。然而若我们仍坚信、强调“我的祖先曾打败你的祖先”那样的历史，那么少数民族便不可能变成真正的“兄弟民族”。

黑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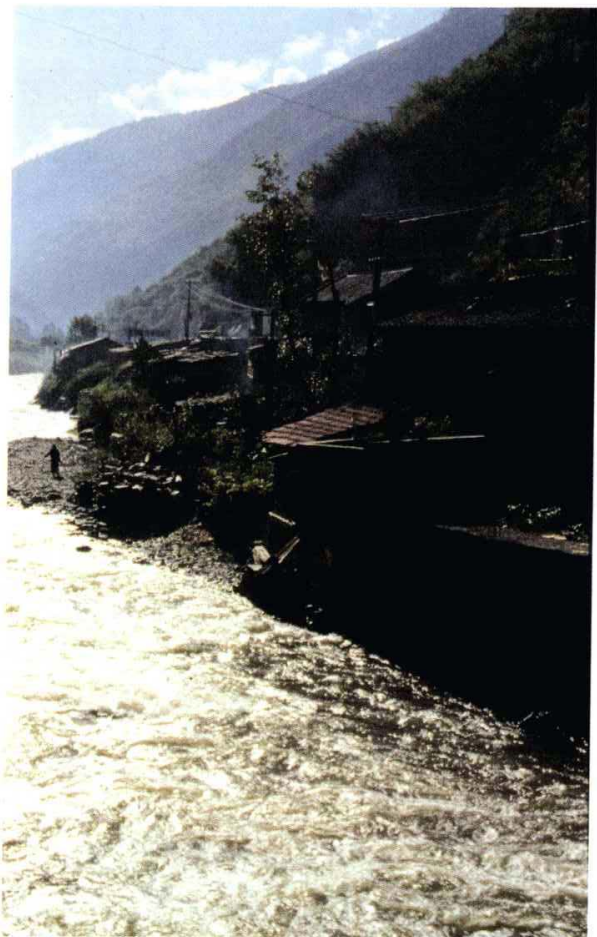
斜阳下的黑水河



黑水县城芦花镇

在羌族地区游历的那几年，我到处听到“黑水人”的名声。大部分，不是什么好名声，但又带些玩世不恭的幽默。那几年，大陆电视台播放一部有关黑水解放历史的电视连续剧，根据一本名为《陆上台湾覆灭记》的书，因此当时黑水又有“陆上台湾”之称。因此到黑水之前，我一直对这地方带着几分戒惧、几分亲切。临行前，我一直嘱咐周老师不可透露我的台胞身份。

1996年夏，结束理县附近的采访后，我回汶川休息了两天，再度打点行装往黑水去。7月至8月是岷江上游地区的雨季，山上崩下的土石经常阻断山路，甚至将人车卷入滚滚溪流中。我们出发的那一天，正是路断两天后交通恢复的头一天，因此往黑水的班车非常拥挤。周老师替我在驾驶座旁的引擎盖上争得一小块座位。不忍拂其好意，我只好坐在温度至少高达七十度的钢板上。更让我不舒服的是，我身旁有两位黑水小伙子将腰刀拿在手上把玩，随着车子颠簸，刀尖就在我眼前晃着。



芦花镇旁的猛河



芦花镇的清晨

山路崎岖，谷深水急，这是我早已熟悉的了。但这一天，班车司机不时抹脸拧腿对抗睡意的动作仍让我们十分心惊。我们频频递烟给他，也无法让他清醒一些。危急间，周老师出卖了我。他对开车的师傅说：“师傅，小心开车，你后面坐的可是台湾来的教授！”这一来司机果然精神大振，全车人也都精神大振。于是在我还未访问黑水前，车上的黑水人已对我作了数百个问题的访问。这也是为何我到达的第一天，许多黑水芦花镇上的人都知道来了一位台胞。

大黑水

大黑水，指的是赤不苏以上的黑水县。位于猛河、黑水河汇流处的芦花镇是县政府所在。一进入芦花镇，黑水的粗犷不拘便随处可见。猪、牛满街游荡，寻觅任何可吃的果皮、垃圾，因此地上除了偶有些猪牛的排泄物外倒是十分干净。当时没有一家宾馆或招待所可供洗澡，但这里高寒干燥、空气清新，似乎人也不常需要洗澡。晚上，我们在一家小饭馆吃饭，邻桌坐了四五位本地年轻人。由于饭店生意好，他们等不到人前来招呼。于是在大喊几声“服务员”仍无人回应后，几个人掀了桌子离去。

入夜后，街上经常可见争吵打架，听说很少闹出人命来。黑水人嗜酒。路边常蹲着几位妇女，一个盛酒的大玻璃瓶加上两个碗，就卖起酒来。到任何人家中做客，不喝上两大碗酒必定是走不出来。较正式的待客，少不了要开一坛纯粮食酿造的咂酒。主客围坐，年长者手持细竹竿在酒坛中沾点酒，向三方挥洒三次，口念开坛词敬各方菩萨、山神。敬完了菩萨，大家便依年龄、辈分、男女以竹竿轮流吸食。这些习俗都与松潘小姓沟一样。



知木林人念开坛词请各方神明



喝咂酒



河坝边上的村落

第二天，我经过芦花一个主要街口时，见到茂县三龙乡一个认得的羌族人，正站在路边四处张望。我上前打招呼，问他在这儿做什么。他说，他的车子被一个黑水人的车撞了，那人要他到黑水来谈赔偿的事，但留下的地址不对，所以他站在街上希望能找到那个人。后来接着几天，他天天都来到那街口，希望找到人赔他车子。羌族人常这样谈论黑水人。偷来的牛被原主人找到了，还要对方付照管牛的钱才准赎回去。拿一些廉价民族小刀、假药材，在路上拦着人强买。在小食铺里借酒装疯，砸店或白吃白喝更是常见。所以过去黑水人是所有邻近藏族、羌族心目中的“獐獐子”。当时我想，这三龙人可能遇上了“獐獐子”。

在松潘小姓沟，由于这儿的村寨民众跟黑水人住得接近，双方又常

结亲，所以他们对黑水人便不那么觉得恐惧。反倒是，他们爱谈黑水人的笑话，他们说黑水人爱吹牛，汉话（川西方言）讲不好常闹笑话。我听得的一个故事说，两个黑水人遇在一起，相互吹牛皮。先一个人说，我昨天上山，一只豹子追一只獐子，獐子逃到我面前时撞上了树，就撞死在我跟前。我白捡了一只獐子，低头感谢菩萨，结果帽子掉下来又盖住了一只金鸡，你说我运气怎么样。另一个人说，这算什么，我前天去打猎，枪里六颗子弹一齐放出去，打到五只獐子。头一个人说，你还是白费了一颗子弹。那人答道，我还没说完，那颗子弹现在还在追一只獐子。



小黑水老人摆故事



知木林的妇女

苏永和

我在黑水访问期间，到处都听得人们谈“苏永和”。有一天，白天本地人领我去看苏永和的官寨遗址，晚上又播放有关苏永和的电视剧影带给我看。苏永和，原来的名字叫“落兹巴荣”，苏永和这个名字来自于黑水话“司尼胡”，原意是豹子与老虎。他出身于黑水地方上的一个小头人



重修过的苏永和官寨

家，十五岁便开始他的马上刀枪生涯。他骁勇善战，二十岁时便曾率村寨战士打败国民政府的川军。到了1940年代，正当壮年的苏永和将其势力向北扩张到松潘草地，往西南进入嘉绒藏族之中，因此为黑水人博得悍勇善战的名声。

1949年国民政府在大陆全面溃败之时，部分军官率着残部逃往川藏边缘山区。其中，国民政府一〇四师师长傅秉勋行前还曾夜访王元辉——那位黎光明的老革命伙伴。王元辉那时正要撤到台湾，于是竟夜将川康边区情况告诉傅秉勋。第二天早晨，傅秉勋请王元辉带话给他已撤至台湾的妻子，要她自己抚养孩子长大。辞别后，傅即率部入山。

这时刚掌控大局的中国共产党也派代表到川藏边境，向各大小头人、土司招安。苏永和一面与共产党谈接受解放的事，一方面庇护着一些投靠他的国民党残军。退踞台湾的“国民政府”得知黑水局势紧张微妙，便希望利用苏永和与“国民政府”留在川康的军队，将黑水建立为另一个“反共复兴基地”。1952年，苏永和决定倒向“国民政府”。关键可能是，在台湾的“国民政府”颁授苏永和“梭磨宣慰使”这头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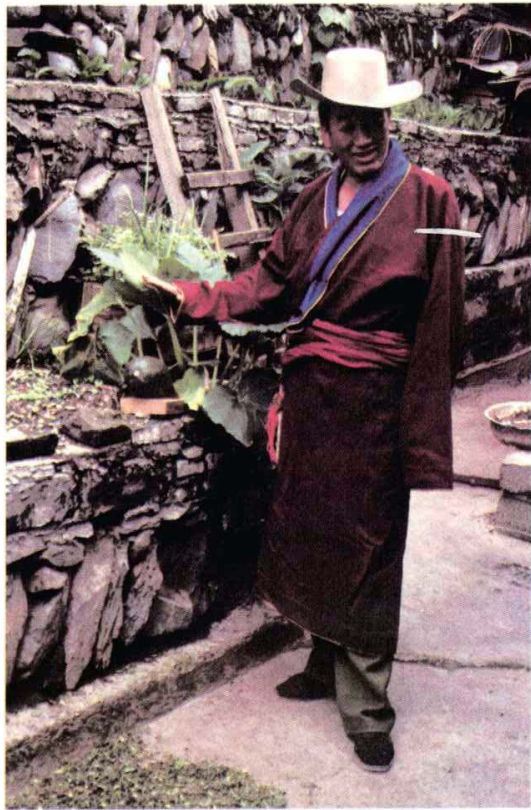
原来清代在川藏边缘的雪山草地共封了十多个土司，其中最高等级的宣慰司有三个，“梭磨宣慰使”便是其中之一。此后，这个头衔便成为各个头人你争我夺的对象。传闻中乾隆皇帝颁的“梭磨宣慰使”成为本地最高权力象征，即使朝廷不承认这些叛逆篡夺的结果也无所谓。苏永和二十岁之前已得到这颗金印，但与许多得到此金印的土豪一样，其宣慰使地位并未得到“大朝”认可。所以，颁授苏永和“梭磨宣慰使”并造成他“反共”，显示当时“国民政府”虽已迁到台湾，但其军事情报部门对川西康藏之历史、民情了解得十分精准。当年曾与黎光明一起游历川康边区的王元辉，应是提供这方面情报的重要人物。

1952年，台湾支持苏永和的武器弹药、通讯器材、人员，在美国空

军协助下空投黑水地区。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黑水虽是弹丸之地，但这时西藏局势尚不明确，康区的西番（嘉绒藏族）与松潘、阿坝的草地人（安多藏族），都抱着隔岸观火的心情，准备借着黑水人的胜负来决定是否接受解放。这样险恶的局势，加上清初乾隆打金川的历史教训，让解放军不敢对此役掉以轻心。最后，解放军取得胜利。国民党军官郑戈夫等七人写下一封愧对校长（蒋中正）重托的绝笔信后，在一个山洞中按军阶高下一一枪自尽。苏永和逃到山上，与来劝降的嘉绒老红军天宝歃血结盟而后归降。其他“汉匪”多被击毙，本地“匪首”则为了民族团结而被宽恕。这结局，与近代松潘城两次遭到劫屠——清咸丰“庚申之乱”以及民国元年“辛亥之变”——的结局没有什么不同。



小黑水四个大村落的妇女服饰皆有差别



着藏袍的小黑水男子



墙上有牛头标志的小黑水废房子。过去本地“羊头部”与“牛头部”村落经常相互仇杀

投降后的苏永和没有受到处罚，还被请到北京与全国各地参观了一段时日，目的似乎在让这位黑水“夜郎”知道中国有多大。1959年，苏永和见西藏与川边局势不稳，恐受波及，便计划出走。我曾在台北市最繁华



小黑水的木桥

的天母访问一位黑水老人。过去他是苏永和家的“娃子”，曾随苏逃亡。那天我们坐在靠路边的咖啡屋内，老人戴着墨色眼镜，谈话间他不准我录音。他说，当时苏永和带了十余名亲信，分乘三辆车出发，名义上是到拉萨朝圣。到了拉萨，正值西藏发生暴乱。拉萨方面希望他以黑水号召康区，他不肯，但也不敢回黑水，于是随众人逃入北印度。在印期间，他曾受蒋中正遥授“川康甘青反攻大陆总指挥”，达赖喇嘛也授其“汉藏反共同盟副主席”之位。后来因卷入西藏流亡政权之流血内斗，他被迫辗转流亡加拿大。流亡期间他曾两度来台湾，但台湾对他冷淡，让他颇为不满。20世纪80年代初，苏永和回到大陆，受到热烈欢迎与招待。没多久，他病死在成都。据黑水人说，苏永和病重时曾坐一架直升机在黑水上空绕了几圈，这是他最后的请求。由此可见他对黑水以及黑水人对他的深厚情感。

我离开芦花镇时，那位三龙人还站在街头寻找应该赔他车的人。已经一星期了，我看了十分不忍，就对陪着我的一位黑水乡村小学老师说，你看有没有办法帮他个忙，把人找出来。那黑水老师笑答道：我们黑水人不帮着外人整自己人。

小黑水的獐猓子

说大黑水人是“獐猓子”，他们不会承认，他们说，小黑水人才是真正的“獐猓子”。麻窝附近一条支流从北方汇入黑水河，这条支流所流经的山谷便是小黑水。当苏永和凭着枪杆子打下号称“雪山草地三十三沟半”这样大的地盘时，近在卧榻之旁只有四个部落的小黑水他却吃不下。由此可见小黑水地之险峻、人之强悍。20世纪上半叶，当民族观念刚进入中国时，岷江上游各地族群纷纷被视为羌族或藏族。但此时，若问起小黑水人是藏还是羌，邻近小黑水的藏族、羌族都会断然否认小黑水人与他们是同一个民族。因为小黑水人太野蛮，没有人会认为他们是“本民族”。所以民国时有些地方文献还把他們当作一独立民族，“獐猓子民族”。

1928年至1929年，黎光明与王元辉结伴到汶川、松潘一带作民俗调查。他们在羌民、西番各村寨中到处采访，但就是不敢到小黑水去。在归来后写给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报告中，他们承认其中所有对小黑水的记述都只是根据耳闻。报告中有一段对当地人的生动描述：

在他们的区域内，几乎每个成年男子都能以抢劫为其副业。他们常在挖地的时候，砍材的时候，或是打猎的时候，只要有目标发现顺便就抢劫起来。他们衣服的颜色很容易利用岩隙石缝的掩护，所以他们容易出奇制胜。有时往往一个带镰刀的獐猓子，可以收拾三四个有枪的旅客。间或他们也三五成群携带武器，离开本土出外行劫，松潘东路上的雪岭便时常有这土匪民族的踪迹。但是西番有时穿着獐衫短裤，利用獐猓子的招牌在各地行劫的也不少。獐猓子之行劫，殊不必问其目的物有无被抢的价值，多半先把人弄死之后再说下文！就是只有一把镰刀、一条麻索的

樵子，也有被他光顾的资格。

我在羌族地区游历的那几年，经常听到小黑水人的声名。譬如，牛尾巴的人说，过去獐猱子常来偷牛盗马。有一次，村上几十个青壮年带了武器上山去护牛，准备与獐猱子大干一场。结果因为晚上一个守夜的村民睡着了，一夜间四、五十个小伙子都被杀死在山上。

这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在那几年，羌族人仍爱谈黑水人的霸道与不讲理。一个三龙人当时跟我说，不久前他遇到獐猱子的倒霉事。他到小黑水知木林去运木材，三个小黑水人强搭他的车，坐在车后堆起的木材顶上，其中一个老头至少有七十多岁。结果车过木桥时重心不稳，翻到桥下去。他挣扎着从倒在溪中的车里爬出来，心中还想，那老头莫要摔死了。上了岸，没想到那三个知木林人已坐在岸上抽烟了。那老头还威胁他赔钱，因为翻车把他们吓到了。

据说，黑水人对于他们“爱抢人”这样的特色有一种解释。说是，清初大将岳锺琪打金川时带来一些猱猱兵（指川西南的彝族）。战事完毕后，岳锺琪命他们留居当地。但这儿的生产环境实在很差，于是这些猱猱兵问道，你教我们在这儿吃啥呢？岳锺琪说，你们可以打枪为生。意思是要他们以打猎为生。但他们听成是“打抢”为生，因此小黑水人说自己是“奉旨抢人”。

1996年夏天，趁着去黑水之便，我到小黑水走了一趟，周老师陪着我。过去他走到哪里，都到处跟人摆谈聊天。但在小黑水的第一天，他大多数时间都十分沉默、小心。直到晚上，几杯烈酒下肚，他才渐渐正常起来。他对同桌吃饭的小黑水朋友们说：“我们小时候，如果娃儿哭不停，家里的大人就会喊说，猱猱子来了，小孩就不敢哭了。”同桌一个小黑水老人听了，幽默说：“那才奇怪呢，那才叫做解放翻身呢！我们小时候，如果娃儿哭不停，家里的大人就会说，再哭汉人就要来了。小孩听了就

不敢哭了。”他们口中的“汉人”，事实上包括茂县周老师老家一带的羌族。

在小黑水知木林，有一天，村长找了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来念开坛请神词。结果，可能他很久未念这些词，当时结结巴巴念不出来。他离开后，我与村长聊了一会儿，此时外面传来吵架的声音，村长便出去劝。原来是那老头出去后，一个年轻小伙子讥笑他，他就跟那小伙子打了起来。到了晚上，我与村长一同吃饭时，我问起那老头是否还好。村长跟我说，那老头的事解决了——老头五十几岁的儿子下午回来后，把那年轻人狠打了一顿。

我离开小黑水时，半路上看到一起车祸。一辆运木材的车辗死了一位老妇人，许多人聚在那儿，等乡长、书记前来处理。有些人在哭，有些人在谈论，有些人只是呆呆地坐在那儿。我乘的车停了下来，师傅下车瞧了一下热闹。回到车上，再发动车子时，他回头对我说：这事好解决，那些运木材的老板有的是钱，“保证赔得巴巴实实的！”此时，我竟怀念起过去那些以一把镰刀拦路打劫的獐獐子了。

后 记

我的寻羌之旅有一个学术名称，叫“田野考察”，它的学术成果便是我的著作《羌在汉藏之间》。多年来我常问自己：在得到博士学位后的十年间，我没有精心修改博士论文在西方知名学术机构出版，没有经常穿西服结领带出席国际学术会议，而是拖着已届中年之躯到处翻山越梁子探访羌族村寨，难道就只为了出版一本期望对“学术”有贡献的著作？即使为了完成一本学术著作，为何我不在一个典型的羌族村寨中作长时间的深入参与观察？为何研究进行了十年还不会说羌语？为何不钻研西方人类学家所探索的问题以和世界学术接轨？事实上是，我从羌族那儿受到再教育：没有一个典型的羌族村落，没有一种各地羌族能用来彼此沟通的羌语，也没有一种共同的羌族文化。羌族似乎以一种幽默的方式，嘲弄着刻板学术方法与知识的虚妄。

在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之后，我担心着灾区朋友及深山村寨民众的安危。灾后几天，我联系上松潘的毛老师，知道松潘大体上受灾不严重。约在6月初我才与汶川城内的周老师通上电话，当时他已忙着到处拍摄各界救灾行动及灾民安置情况。我问



灾后映秀往汶川途中所见折倒桥墩

他需要些什么，他说只要送些空白的DV录像带给他。末代瓦寺土司索老先生，听说地震发生时正在都江堰看病，所以也未受灾。永和沟、水磨坪、三龙沟、黑虎沟、蒲溪沟等地受灾情况陆续传出来。几乎过去我所熟悉的这些羌族高山深沟村寨都成了重灾区，房屋严重受损，所幸地震发生时的5月是出外打工、上山采药的季节，留在寨子里的人中午时分也多在田里，所以村寨民众死伤并不严重。

灾后半年，作为“羌族研究专家学者”，我接触到许多热心救灾及灾后羌族社会文化重建的专业人士。对他们的工作感到敬佩之余，我问自己，一个从事社会科学与人文研究的学者能为社会做些



灾后的汶川到处可见毁断的桥梁路面

什么？特别是在这样的大灾难之后，我们的知识除了“学术贡献”外，到底还能贡献些什么？

于是我着手整理过去的一些笔记、照片与自己的记忆。十几年来，我在羌族地区记录的点点滴滴，那些人、事与人们所传述的故事，他们的背景是自20世纪上半叶以来便逐渐变化消逝的本地社会文化。山神信仰表现人们对本地资源的竞争与划分，毒药猫传说反映村寨民众对外界的恐惧。周仓背石塞雁门的故事，表达人们对本地逐渐汉化感到的无奈。射蟒英雄不愿出雁门关的故事，述说山里的人即使有能力也只能窝在山里。孝子到成都平原变孽龙的故事，

则表现他们渴望到外面去寻求较好的生活，却又怕在外受困受辱。然而这些都逐渐成为过去。人们愈来愈不在意山神所守护的地盘，毒药猫传说成为真正的神话。山里的人到成都、深圳、北京打天下已是稀松平常的事。因此，周仓故事、孝子故事失去它们流传的社会背景与动力，成为“只有老年人摆”的故事。

近五十年来的社会变化，特别是成为“少数民族”这样的变化，更鲜明地表现在北川羌族记忆中。当走马庙的信徒由“汉人”成为“羌族”，人们开始对庙中祭的是走马将军还是白马将军有了混淆与争议。同样的变化，让荞麦由“蛮子的粮食”成为“羌民族特色食物”，让过去常被供在湖广会馆中的大禹也成了羌族。这个



中国国族边缘的变化过程，其中的丑恶、良善、悲壮、幽默、暴力，都具体而微地表现在黎光明的言谈、书写与行动上。他先是参与边疆民族文化考察，后来不耐学术而直接投身于边疆军政事业，结果不得全尸地死于地方匪帮之手。然而便是这样的变化以及许多人的死，让“黑虎将军”所代表的村寨战争暴力与“小黑水的獐獐子”成为过去。

汶川大地震以及灾后各种复建工作，势必为羌族社会带来另一波大变化。在此之际我整理这些老记忆出版，并非为了建构一个“传统羌族社会”以作为重建的参考模型——我认为即使没有这次地震，灾前的羌族社会文化也将成为过去。我十余年的“寻羌”之旅所找到的并非传统，而是变迁。深刻了解岷江上游高山深沟民众曾走过的艰辛岁月，贴近地感触他们的忧惧与爱憎情感，或许人们对于灾后羌族社会文化重建会有些新的想法。或许，也是我的希望，这重建不是复旧而是蜕变，而且羌族的蜕变可能为整体中国民族关系与构成带来新局面。

寻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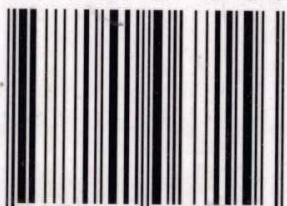
羌乡田野杂记

我的寻羌之旅始于1994年夏季。我一路跟随文献记载中的历史记忆，追寻羌人来到汶川。然而便是在此，突然，前面那些历史臆想以及我二十年来的羌族研究成为一场空幻梦境。面对真真实实的羌族，我觉得自己对人、社会、民族、历史等等的知识贫乏得可笑。只是我十余年的“寻羌”之旅找到的并非传统，而是变迁。

我以这本配合照片的田野杂记，来呈现过去我的寻羌之旅中所见、所闻，介绍各地羌村民众生活与沟中的文化、传说。这不只为了纪念一些骤然消逝的过去，而更希望借着它来呈现羌族的独特之处——它们如一面诚实的镜子，映照出人们难以察觉的自我本相。



ISBN 978-7-101-06715-6



9 787101 067156 >

定价：30.00元